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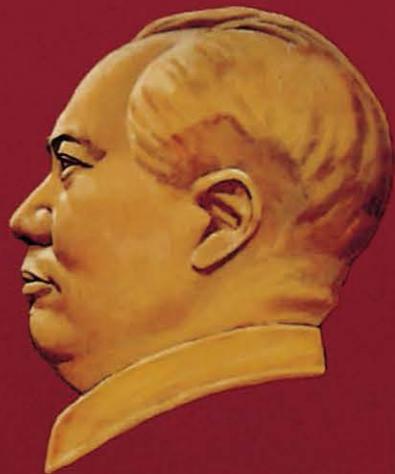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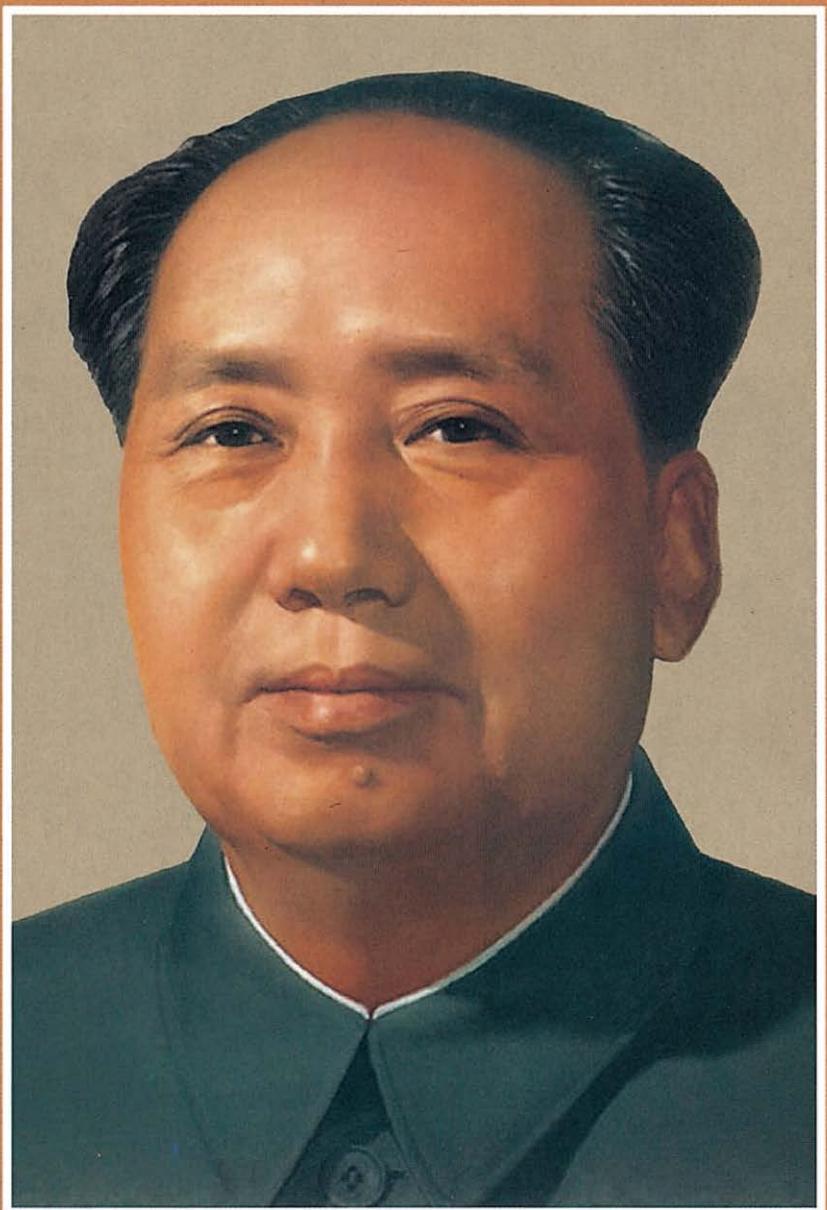
9 789881 290700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 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	1
(1958年2月13日)	
对北京实验中学学生王桂芹《暑假归乡散记》的批语	14
(1958年2月16日)	
关于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给刘少奇的信	16
(1958年2月17日)	
对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稿的批语	17
(1958年2月17日)	
我们的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二百万	18
(1958年2月18日)	
军队要打掉老爷气	19
(1958年2月18日)	
给杨开英的信	20
(1958年2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的电报	22
(1958年2月21日)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24
(1958年2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胜利十周年的电报	25
(1958年2月24日)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27
(1958年2月)	
关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致苏共中央电	32
(1958年2月27日)	
给黄炎培的信	34
(1958年2月29日)	
中央转发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	37
(1958年3月2日)	
在陈正人来信上的批语	39
(1958年3月2日)	
关于同意陈毅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批语	40
(1958年3月4日)	
对福建省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41
(1958年3月4日)	
关于了解山东灾情给邓小平的批语	42
(1958年3月5日)	
祝贺柬埔寨王国国庆的电报	43
(1958年3月5日)	
对彭德怀关于空军进入福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44
(1958年3月8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45
(1958年3月)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	62
(1958年3月9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67
(1958年3月10日)	

祝贺丹麦王国国庆的电报	73
(1958年3月10日)	
对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的批语和修改	74
(1958年3月11日)	
对浙江省委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76
(1958年3月13日)	
对陕西省委关于组织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 的通知的批语	77
(1958年3月15日)	
对《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	78
(1958年3月15日)	
对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的批语	79
(1958年3月16日)	
对《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批语	80
(1958年3月16日)	
一批按语	81
(1958年3月19日)	
祝贺突尼斯独立二周年的电报	83
(1958年3月19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三)	84
(1958年3月20日)	
关于推广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经验的批语	92
(1958年3月21日)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	101
(1958年3月21日)	
给滕代远的信	102
(1958年3月22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105
(1958年3月22日)	
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113
(1958年3月22日)	
对彭涛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报告的批语	115
(1958年3月22日)	
对《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16
(1958年3月22日)	
给田家英的信	118
(1958年3月22日)	
对《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的批语	119
(1958年3月25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121
(1958年3月25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	129
(1958年3月26日)	
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	132
(1958年3月26日)	
在介绍一种有灭蝇蚊作用植物的材料上写的说明	134
(1958年3月)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任职的电报	143
(1958年3月28日)	
对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的修改	144
(1958年3月)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145
(1958年3月)	

在廖鲁言《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上加写的话	165
(1958年3月)	
为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写的标题和批语	166
(1958年3月)	
为编印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写的标题和批语	168
(1958年3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马克思和毛泽东文章拟的标题	169
(1958年3月)	
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	170
(1958年3月)	
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话	172
(1958年3月)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181
(1958年4月2日)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三周年的电报	183
(1958年4月3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一)	185
(1958年4月6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189
(1958年4月6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193
(1958年4月1日至6日)	
关于不派代表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给赫鲁晓夫的信	204
(1958年4月8日)	
对江苏省委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206
(1958年4月8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208
(1958年4月10日)	
介绍一个合作社	212
(1958年4月15日)	
临时通信	227
(1958年4月23日)	
给周恩来等的信	229
(1958年4月25日)	
对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语	231
(1958年4月25日)	
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232
(1958年4月27日)	
对一封反映广东潮汕地区整风情况的来信的批语	233
(1958年4月27日)	
给田家英的信	241
(1958年4月27日)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	242
(1958年4月)	
给纳赛尔的信	248
(1958年5月4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批语	250
(1958年5月4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251
(1958年5月)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	267
(1958年5月8日)	

给张闻天的信	277
(1958年5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279
(1958年5月8日)	
关于中共准备派代表团参加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给赫鲁晓夫的电报	281
(1958年5月9日、13日)	
对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的批语	284
(1958年5月12日)	
对罗瑞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286
(1958年5月12日)	
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287
(1958年5月13日、24日)	
对陈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293
(1958年5月15日)	
在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上的批语	295
(1958年5月15日)	
四海之内皆兄弟	296
(1958年5月16日)	
对滕代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298
(1958年5月16日)	
祝贺挪威王国国庆的电报	299
(1958年5月16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300
(1958年5月17日)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315
(1958年5月18日、20日)	

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拖拉机成功题词	318
(1958年5月18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319
(1958年5月18日)	
对《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的批语	324
(1958年5月19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	326
(1958年5月20日)	
关于印发四百个科技创造发明家小传资料(初稿)的批语	336
(1958年5月21日)	
给张治中的信	338
(1958年5月22日)	
关于印发沈鸿给毛泽东信的批语	340
(1958年5月22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341
(1958年5月23日)	
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写的题下说明	345
(1958年5月)	
对《红旗》杂志发刊词的批语	346
(1958年5月24日)	
为《红旗》杂志题名的批语	347
(1958年5月24日)	
关于注意粮食供应问题的批语	350
(1958年5月24日、27日)	

对赵尔陆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建议的批语	352
(1958年5月25日)	
为十三陵水库题名	354
(1958年5月25日)	
对刘少奇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362
(1958年5月)	
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的信	363
(1958年5月26日)	
关于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座谈会写给邓小平的信	364
(1958年5月29日)	
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365
(1958年5月)	
纠正《红旗》杂志第一期中错别字的批语	366
(1958年6月4日)	
为购买《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给林克的批语	367
(1958年6月4日)	
在方强对军委扩大会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语	368
(1958年6月5日)	
关于做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布局和开好军委会议问题给邓小平的信	371
(1958年6月7日)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	372
(1958年6月7日)	
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	374
(1958年6月7日)	

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 稿的批语和修改	375
(1958年6月8日)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批语	377
(1958年6月12日)	
关于中央各部委干部参加劳动的批语	378
(1958年6月15日)	
人民不要战争但要有战争准备	379
(1958年6月16日)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383
(1958年6月17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先念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批语	385
(1958年6月18日)	
给高智的信	387
(1958年6月19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88
(1958年6月21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	399
(1958年6月22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 规划的批语	400
(1958年6月22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	401
(1958年6月22日)	
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批语	402
(1958年6月22日)	

对《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的批语	404
(1958年6月23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406
(1958年6月23日)	
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411
(1958年6月24日)	
在中国驻苏使馆关于苏联积极筹备庆祝我国国庆的报告上的批语	413
(1958年6月24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邓子恢夏收增产统计报告的批语	414
(1958年6月25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机械工业问题的几个报告的批语	416
(1958年6月26日)	
关于应对国民党军火力袭击的批语	417
(1958年6月26日)	
对《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的批语和批注	418
(1958年6月27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422
(1958年6月29日)	
在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宣言》上的批语	427
(1958年6月)	
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	428
(1958年6月)	
七律二首·送瘟神	429
(1958年7月1日)	
《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	434
(1958年7月1日)	

给胡乔木的信	435
(1958年7月1日)	
为索要一批图书杂志开列的清单	437
(1958年7月1日)	
介绍一封信	438
(1958年7月3日、30日)	
为罗哲烈士墓题字	441
(1958年7月)	
为曹云芳题词	443
(1958年7月4日)	
对谭震林关于华东五省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总结的批语	445
(1958年7月7日)	
接受锡兰新任驻华大使高伯拉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46
(1958年7月7日)	
关于注意暴雨冲毁水库问题的批语	447
(1958年7月8日)	
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	449
(1958年7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450
(1958年7月10日)	
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452
(1958年7月12日)	
对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的批语	455
(1958年7月14日)	
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	457
(1958年)	

对肖向荣关于几件外事安排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460
(1958年7月17日)	
在董必武关于乌布利希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上的批语	461
(1958年7月20日)	
为《跃进》杂志题名	462
(1958年7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464
(1958年7月21日)	
关于延期报送各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发展工农业规划的批语	466
(1958年7月22日)	
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467
(1958年7月22日)	
祝贺突尼斯共和国成立日的电报	479
(1958年7月25日)	
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	480
(1958年7月27日)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82
(1958年7月28日)	
给周谷城的信	483
(1958年7月28日)	
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的批语	486
(1958年7月28日)	
关于相机透露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给宦乡的电报	487
(1958年7月31日)	
在黄镇关于印尼寻求贷款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	489
(1958年7月31日)	

要采取追击的战略	490
(1958年7月)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	492
(1958年8月4日)	
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	496
(1958年8月9日)	
和陈昌奉的谈话	505
(1958年8月9日)	

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

(1958年2月13日)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地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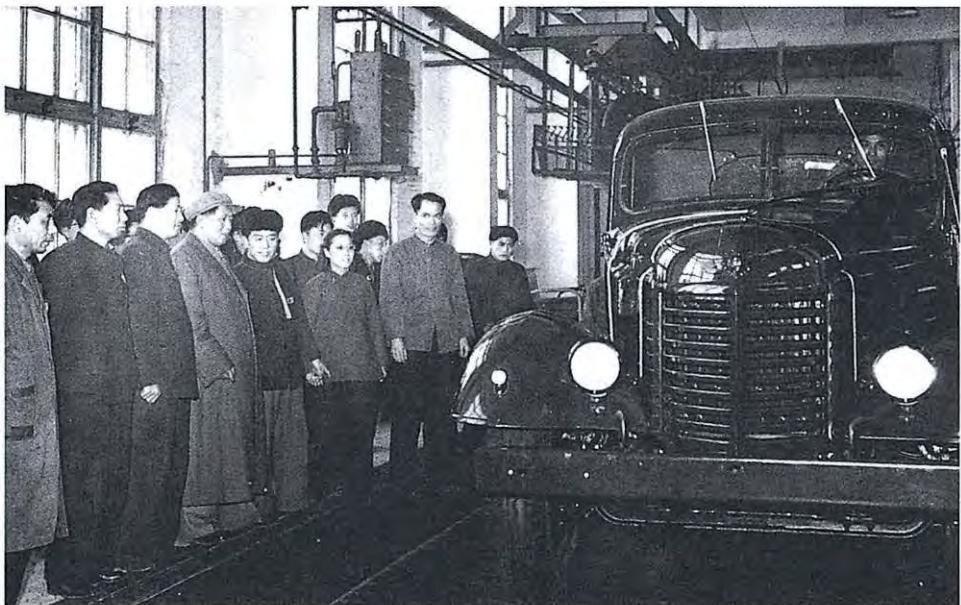
1958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沈阳黎明机械厂装配车间观看涡轮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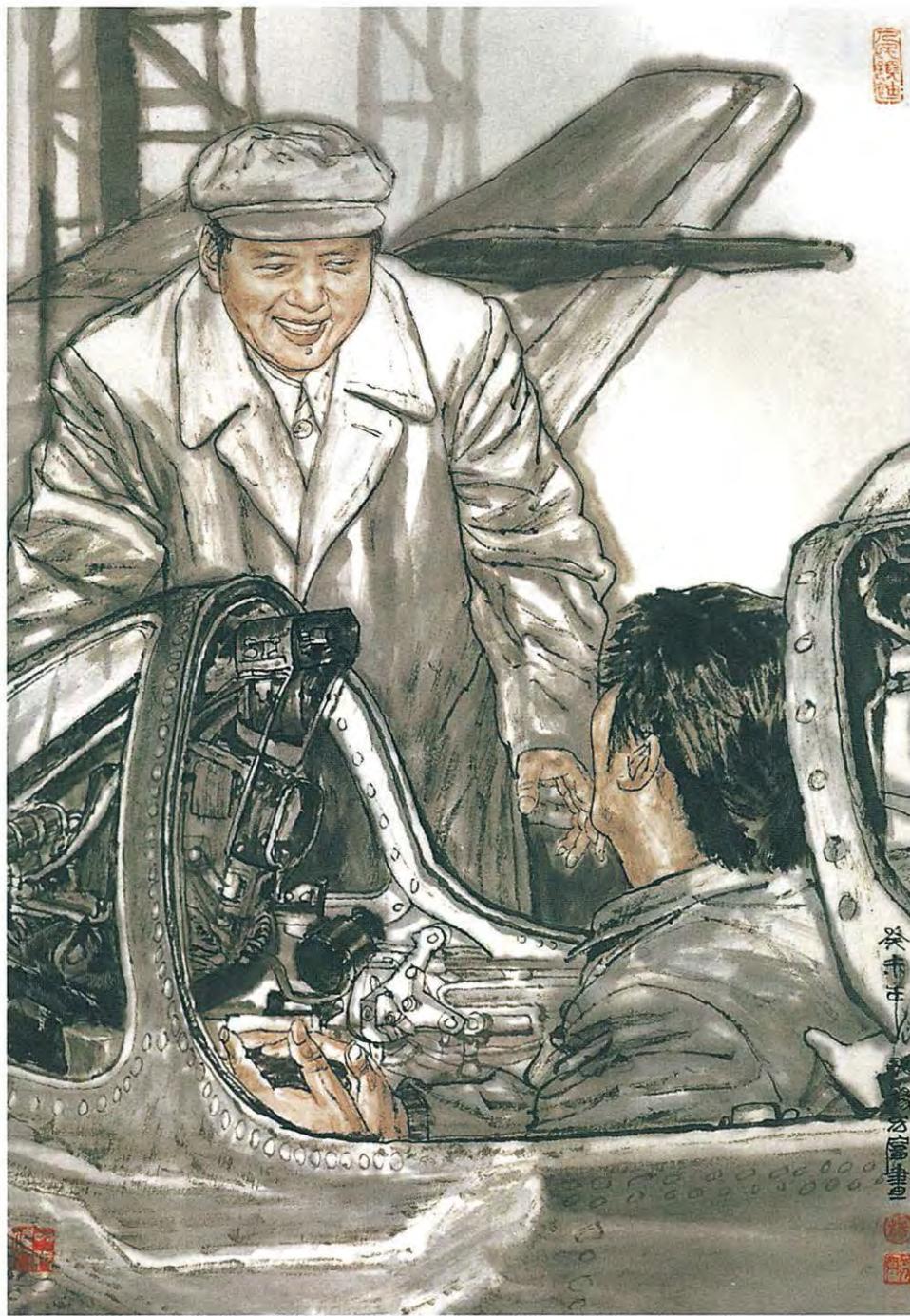
1958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沈阳黎明机械厂和工人交谈。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沈阳参观国产喷气式歼击机。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时，观看国产解放牌汽车。



《观看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中国画)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参观松陵机械厂总装配车间。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高坎镇。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西露天矿。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西露天矿。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西露天矿。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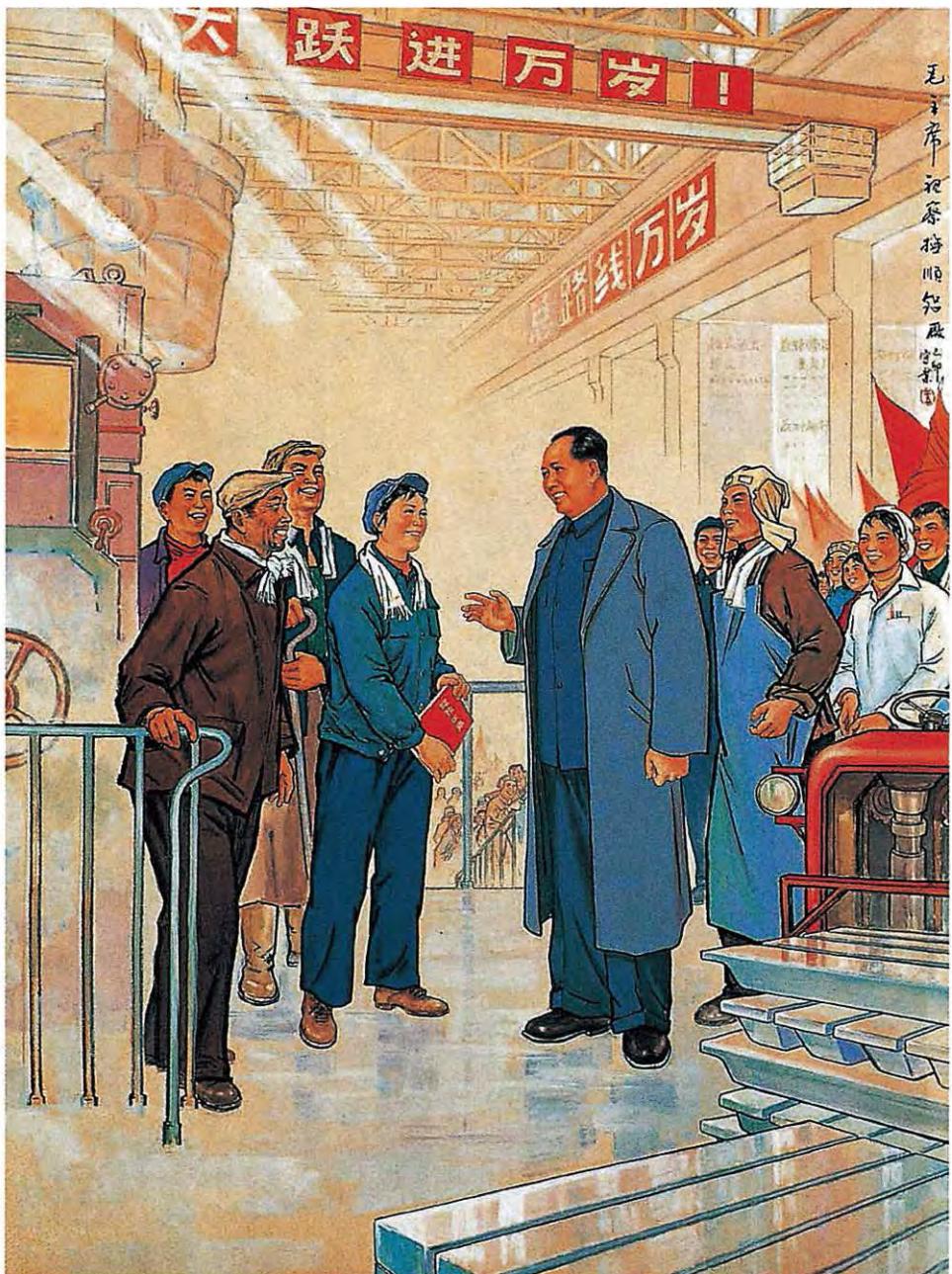
《毛主席视察抚顺》（油画）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沈阳市二一三机床电器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小演员亲切交谈。



《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水粉)

对北京实验中学学生王桂芹 《暑假归乡散记》的批语^[1]

(1958年2月16日)

—

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

二

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

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

[1] 毛泽东这三个批语写在北京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王桂芹的《暑假归乡散记》上。其一写在《暑假归乡散记》的篇头；其二写在《暑假归乡散记》的篇尾；其三是写给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敏的批语。《暑假归乡散记》是王桂芹的十四篇日记，记叙了她1957年8月4日至8月17日暑假期间回到家乡河北省阜平县的所见所闻所感。1958年2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四期发表了王桂芹的这十四篇日记，题为《假期回乡日记》，同时发表了毛泽东写在《暑假归乡散记》篇尾的批语手迹。1958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予以转载。毛泽东批语的时间待考，本篇所署时间是《中国青年》发表的时间。

三

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1958年，毛泽东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师生在一起。

关于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给刘少奇的信

(1958年2月17日)

少奇同志：

想了一下，我想在今日或明日召集一『一』次政治局会议，谈一下“工作方法六十条”如何分组研究征求意见的问题（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你以参加这一次会议再出去为宜。如何，请酌定。陈云^[1]同志可能在会议上讲他的意见。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上午七时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稿的批语

(1958年2月17日)

即送章汉夫^[1]同志：

在《声明》^[2]第四页上改了一个字^[3]，请你即转告总理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半

[1] 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于1958年2月19日签署的联合声明。

[3] 毛泽东在审阅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时，将“不久前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对于加强和发展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团结起了莫大作用”一句中的“莫”字改为“很”字。

我们的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二百万^[1]

(1958年2月18日)

有一天，我找了几个军委方面的同志（彭德怀、谭政、粟裕、黄克诚^[2]）谈了一下。我出了一个题目，请他们研究一下，我们的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二百万？现在有三百万，再减少一百万。其办法是这样的，我们只要三十个师是满员的，学美国的办法，每个师有二万人，非常之满员，而不是现在的一万三四千人，搞大师。其他那些架子，都可以保存，但是官多兵少，骨瘦如柴，一个师有两个小团。人数缩小到只有二百万，腾出钱来，搞一套常规装备。一百个师的常规装备要十亿元左右，分五年，每年拿两亿元，五年搞起来，五年不行再加两年，七年，一年一亿多元。另外再拿出一笔钱，搞中程导弹，打一千五百公里、二千多公里。将来打仗，就是要禁止原子弹、导弹，还是枪对枪、炮对炮。就是要打那个东西。假如我们能够造一种炮，隔一千五百公里、二千多公里能打到敌人那多好。步枪名为打二千米远，实际上是八百米远有效。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讲话的一部分。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粟裕，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军队要打掉老爷气^[1]

(1958年2月18日)

军队方面现在有进步，整风了。我问了一下，是不是也跟党、政、民有相同的情形，就是老爷气多了一点？无非是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军队大概没有那个娇滴滴的气吧？那三个气总是有的。也有娇娇嫩嫩的情况，南方暑季他要歇暑，不能演习；冬季北方不能演习，怕冷。在川西跟少数民族的叛乱分子作战的时候，一时手忙脚乱，不得下地。所以，我们的军队，真正打起仗来，开头两三个月可能要打一些败仗的。有小姐气，有骄傲之气，有暮气，有官气。据一些同志讲，确实有，军以上比较多，师以下比较活泼。由此观之，党、政、军、民，现在是下面比较活泼，而我们这个党、政、军、民（党是党中央，政是国务院，军是军委会，民就是工青妇）这几种气就多。你们回去以后，如果嗅不出来，就请个鼻子灵的看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同时，我们党内关系要更正常化，庸俗的空气要打掉。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讲话的一部分。

给杨开英^[1]的信

(1958年2月20日)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一九五六年，听了胡觉民^[2]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3]，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4]同志好！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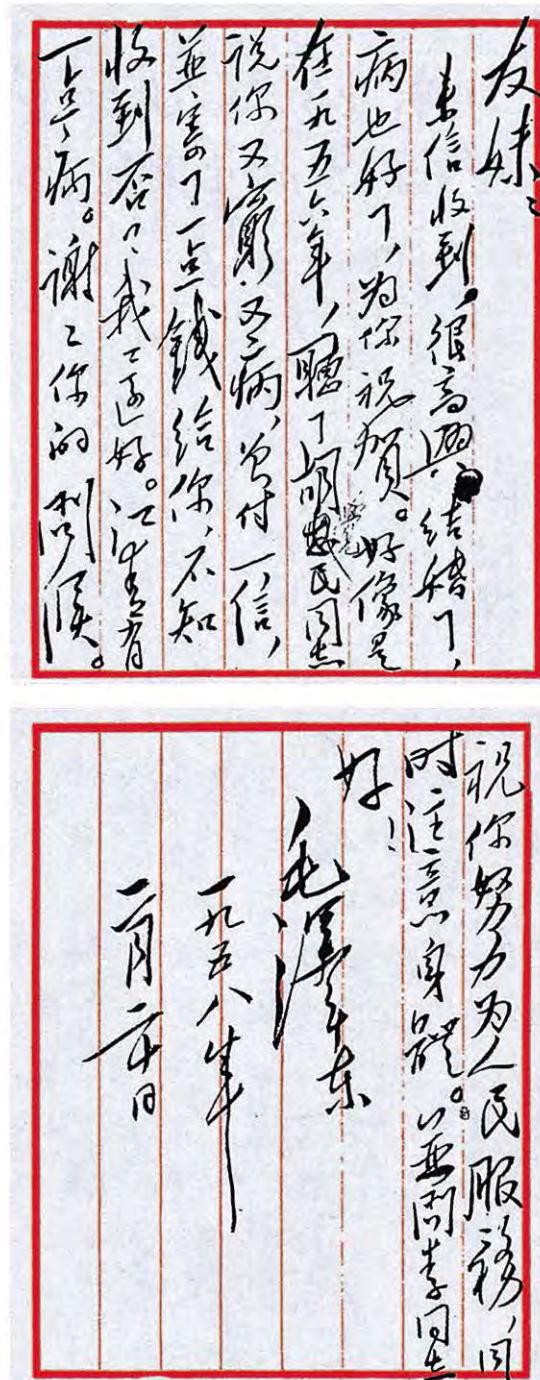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

[1] 杨开英，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堂妹。

[2] 胡觉民，毛泽东的侄媳。

[3] 指毛泽东1956年12月16日给杨开英的信。

[4] 指李辉，杨开英的丈夫。



毛泽东致杨开英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 建军四十周年的电报

(1958年2月21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欣逢英雄的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谨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光荣的苏联军队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世界上第一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军队。四十年来，这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军队，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之下，经历了光辉灿烂的战斗道路。英勇的苏联军队，曾经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消灭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主力，从而保卫了各国的独立，拯救了人类的文明。战后时期，苏联军队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不懈，并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事实证明苏联军队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忠实朋友。

由于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军队中不断地加强政治工作，由于苏联军队拥有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苏联军队已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有战斗威力的革命军队。我们相信，在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苏联军队定将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学习了苏联建军的基本经验；今后，苏联军队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的榜样。我们高兴地看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团结正在日益发展，中苏两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正在不断加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永远坚定不移地同苏联人民和英勇的苏联军队在一起，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成立的电报

(1958年2月23日)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值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式成立和阁下当选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繁荣昌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1]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的。1958年2月1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在开罗签署宣言，宣布成立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接着，两国议会分别通过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临时宪法。2月21日，两国公民投票，选举纳赛尔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1961年9月28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地区大马士革军区的陆军部队发动政变，随后宣布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年12月14日，纳齐姆·库德西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埃及也在1971年9月1日改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胜利十周年的电报

(1958年2月24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当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胜利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的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周围，彻底地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恢复资本主义统治的阴谋活动，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为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将继续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2月)

—

默涵同志：

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2]。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根据他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写成的。文章分三部分：大风浪中的考验；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文章写成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先后两次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写的批语；二、三是毛泽东第二次修改时写的批语。四至九是毛泽东对周扬文章修改的六段文字，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后来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3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五期。

二

退林默涵同志：

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

三

“文学”下加“艺术”二字。^[1]

四

一时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的风正在向右刮。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左”的教条主义者着慌了，想用简单粗暴的压服方法镇压这股歪风。当然教条主义和压服方法是克服不了修正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害怕鸣放，是由于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所以他们表面上的“左”正是反映了他们骨子里的“右”。

党坚决地采取了放手让他们鸣放的方针，因为他们力争鸣放，

[1] 周扬文章的原稿说：“我们的文学应当以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而不应当再向人们灌输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在“我们的文学”之后加了“艺术”二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党早就公开说明，我们不怕毒草，要把毒草锄翻，变成肥料；我们不怕牛鬼蛇神，要请牛鬼蛇神做人民的反面教师。我们看到毒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党相信群众有识别毒草，克服毒草的力量。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级敌人的。就是这样，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张牙舞爪地乘机活动起来，形成了两军对垒。两方面都高兴。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笼，有机会灭掉它们了。

五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

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六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就体现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阶级消灭以后则体现为新旧斗争。

七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

八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鼓励作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密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

九

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变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

关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 致苏共中央电

(1958年2月2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并且讨论了苏共中央1958年1月31日的来信^[1]。

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月刊，作为参加这一刊物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也同意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关于刊物的基本原则和出版经费的分担办法。

[1]. 指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8年1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许多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建议。当时约定，愿意参加出版杂志的各国党，在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准备工作以后，即着手实现这个建议。苏共中央认为，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需要了解哪些党打算参加出版这个理论刊物，并且就出版这个刊物有关的具体问题开始交换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它不应当成为发号施令的刊物；它将从事宣传、研究马列主义问题，并且是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的国际讲坛。1957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将是这个杂志的基础。1958年8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

关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致苏共中央电

中共中央准备派出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1]同志出席将于三月七日至八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创办杂志的各党的代表会议。

此致
同志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宁一、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给黄炎培^[1]的信

(1958年2月29日)

黄任老：

惠书^[2]敬悉。目前形势，确实是好的，如能予以适当的指导，定将产生很大的力量。一个月前赐书^[3]中论及深葬事，适获我心，将来适当时机，可能推广实行。

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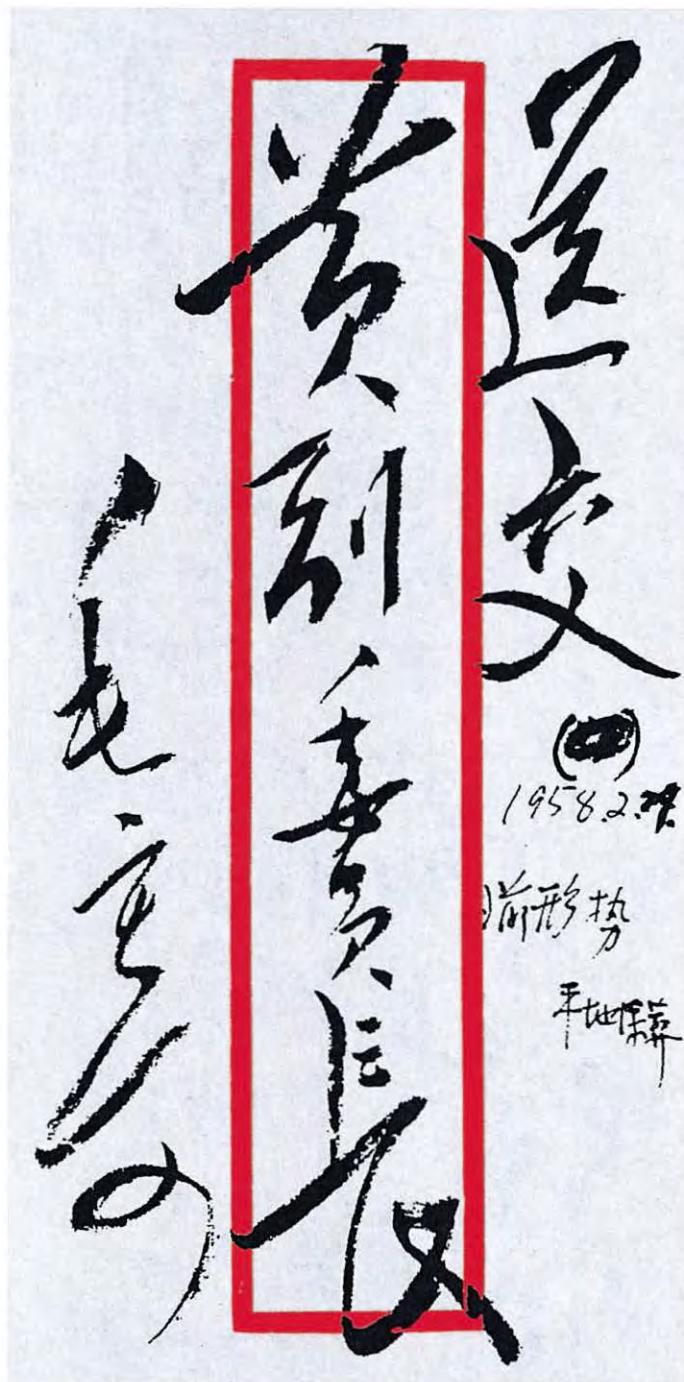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九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1958年2月2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在农历除夕同民建中央小组到北京市参观商业时看到的情况：商场中没有过去出现的拥挤现象，许多商店的售货员春节加班应市；一些公私合营企业互送挑战书、保证书，提出开展比思想、比学习、比卫生、比朴素、比干劲、比钻劲活动，说明私方人员包括民建会员决心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了。

[3] 指黄炎培1958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信封。

黄先生好。
近来如何。用字
有努力，研究是好的，如
能于适当方面努力，
这是很大的力量。
不日去赐教中诵及
深谢耳。一言复我以

收事变的时机，万勿
推度审慎！
此致
毛泽东
一月九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中央转发团中央机关召开 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8年3月2日)

—

上海局，各省、各直属市、各自治区党委：

附在后面的这个文件^[1]，可以一阅。

各地应当召集右派分子开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去做报告，争取他们和分化他们。会可以是几十人的，几百人的，几千人的，都应

[1]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简报说，团中央机关于1958年2月14日、1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右派分子会议（一次是原处长级以上的，一次是一般干部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不杀不关，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来日方长，只要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还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少人还可能变成好干部。这两次会的效果都很好。

由该单位（例如一个大学，一个部门），该系统（例如文教系统）或该地区（例如一个区，一个市，市的右派人数很多时，则选择若干人，例如二千至三千人）最有威信的主要负责人去作讲演。这样，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中央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日

—

朱、陈、邓、彭真^[1]阅后发。

[1] 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陈正人^[1]来信上的批语

(1958年3月2日)

电话告知陈正人同志：

文件^[2]收到。因我即日出巡，不能谈话了。

毛泽东

三月二日

[1]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2] 指陈正人1958年2月26日向毛泽东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稿。

关于同意陈毅辞去 上海市市长职务的批语^[1]

(1958年3月4日)

退陈毅同志：

同意辞去上海市长，因为现在兼任外交工作了。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陈毅1958年3月2日关于请求批准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给毛泽东的信上。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上海市市长。

对福建省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8年3月4日)

吴冷西^[1]同志：

此件^[2]可发表，广播。退叶子龙^[3]。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委1958年1月29日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给中央、国务院并各地、市委的报告。报告说，我省自1957年10月以来，结合冬季生产运动，先后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1月2日又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收听的除四害广播动员大会，会后运动进展迅速，已从城镇向农村深入开展。开展运动的体会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二）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三）要有具体规划，并使突击运动与运动经常化结合起来。（四）培养先进典型，组织观摩，推动运动前进。

[3]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了解山东灾情给邓小平^[1]的批语^[2]

(1958年3月5日)

小平同志：

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3]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

毛泽东

三月五日上午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8年2月26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二九期的封面上。该期《内部参考》刊载了《山东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报道。

[3]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祝贺柬埔寨王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3月5日)

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陛下：

值此陛下寿辰和柬埔寨王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诚的祝贺。祝柬埔寨王国繁荣，人民幸福。祝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于北京

对彭德怀^[1]关于空军 进入福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3月8日)

已阅。退彭德怀同志：

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2]，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

毛泽东
三月八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彭德怀1958年3月5日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我空军歼击机师进入福建第一线机场的准备工作的意见。

在成都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3月)

一 在三月九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

协作问题^[2]

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去做？（县以下）^[3]

税制与价格

地方工业的劳动法

规章制度问题：

大问题还是小问题

从来不反映，例如农业是反映的？

[1] 成都会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 协作问题是毛泽东3月9日讲话的第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3] 县以下，指县级以下。毛泽东讲话中说：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是辩证法，还是片面性
“理论与实际结合”，实际不承认
上层建筑（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解放与束缚生产力？
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
“只能搬”，也不尽然，我党历史上只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
我的目的，不是整人
一种压力，不能独立思想，本质仍是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新的
继续。

二

第二本账^[1]
究竟多少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
大量招工问题
平衡问题
平衡理论问题
不平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普遍的永久的
平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普遍的暂时的
很多事物，以不平衡为平衡，例如人有老少、知多知少、高低
肥瘦，知识的多少深浅，永远不能平衡。时代精神是有的，一致是
有的，只是一个侧面。
粮食包干是大问题

[1] 指成都会议准备讨论通过的国家经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

地方工业发展速度问题
打架问题
与欧洲相反，倒转过来发展地方个性^[1]
发展生产力——一个理论问题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现在形势，矛盾基本上克服的趋势（暂时的，在过渡时期是决定性的）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个理论性问题，
矛盾的对立斗争，以河北为例
文教的十四项^[2]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再谈一下不断革命论
虚报、空唤不做（不切实际）问题
整风的新形势，基层整风
资本家、知识分子的新气象
开右派大会问题
农村工具改革运动（技术革命的萌芽）
六十条的修改^[3]

[1] 毛泽东在这里讲地方分权问题，他说：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2] 指成都会议准备讨论的关于文教工作的十四项规定。

[3] 六十条，指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这时已作为草案下发各级党委。毛泽东讲话中说：六十条现在还非正式，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人民日报》的革命与地方报纸^[1]

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

朝鲜的经验

波兰的经验

印尼形势

阿拉伯世界形势

西方形势

是否参加经济协作

同日本做大生意，同东欧做小生意，是否妥当

国防计划问题

三

然后，逐一谈一下，可以在一『个』段时间内（例如两个星期）解决一大批问题。

大体成熟，不甚成熟的问题，作出草案发去征求意见，隔一段时间（例如两三个月）再行定案。

走马与下马

空军进驻福建问题

国防方向问题

略带一点理论色彩

[1] 毛泽东在这里讲如何办好报纸。他在讲话中说：中央、省、专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赔〈培〉养理论干部计划，例如山西^[1]

技术革命的萌芽

下一次会议的重点是什么？

工业、文教、报纸、商业、政治——一切事业的统帅

我不做国家主席的问题

协作区会议两个月开一次

出研究题目问题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对立统一问题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问题

生产关系三个部分的研究问题

再举河北水利工作为例，说两种方法比较问题。

“看得到，抓得起。”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不然就难于领〔导〕下去，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可以学会做到这一点，问题是研究工作方法。

广与深的方法

先广后深。

逐步广，逐步深。

为一下摸深，钻到一二个较小的问题里去，势必把大量的问题忽略了，把大问题丢了。

先全面看一下，问一下，想一下，一共有些什么问题。求广。不这样是危险的。

[1] 中共山西省委1958年1月曾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指示。

二 在三月十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学习与独创

——例如硬搬规章制度^[1]

建党时期 北伐时期

1921—1927

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尚在，俄国阶级斗争激烈，斯大林领导尚未稳固

我国发生陈独秀主义，其来源是国内的资产阶级

内战时期

1927—1934（遵义会议）

我国发生三次左倾路线

其第三次（1931—1934），发生在苏联反托洛茨基胜利，反德波林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胜利，斯大林统治开始稳固，米夫当远东部长，因此教条主义传来，并有自己的特色。

过去8年

1950—1957

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硬搬部分与适用部分

主要是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其次，教育工作，卫生工作；商业与轻工业似较少些；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是

[1] 硬搬规章制度，指硬搬苏联的一些规章制度。毛泽东讲话中说：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有独创精神的。

这些比较，分析，甚为必要。

其原因：(1) 设计、施工、装备都从外来，自己不行；(2) 对苏联对中国都不了解；(3) 大压力，如斯大林，盲目地屈服于这样一种大压力。我党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也有这少数人附〈随〉声附和；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有两种个人崇拜，正确的，不正确的，应分清楚；(4) 忘记了历史经验，不懂比较法（对立统一），不知道设置对立『立』面，不加分析，不动脑筋。

现在的变化：

1956年，十大关系；斯大林被批判；对苏联了解较多；中国对“冒进”。

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整风，反右

1958年，杭州、南宁及现在的会议，反浪费反保守

国务院各部門规章制度的改革，已经提出

地方已经分权

马克思论上层建筑

三 在三月二十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

它的意义极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迅速有效。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请各省市区普遍推行。

像河南，至少提“一年到两年”的口号，今年也不要登报，实干就是

各省不要一阵风，让河南今年试一年，各省可以在明年大跃进。

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先后一年，二年乃至三年，五年完成四十条，不算不荣誉。

各省市区两个月开一次会，省市区内部的。协作区也如此。

调整生产节奏（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基础上，波浪式的前进，急缓的对立统一，劳逸的对立统一，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两个战役之间必须要有一次休整、补充和练兵，这是规律，每种都互相转化（急转为缓，缓转为急，劳转为逸，逸转为劳，战斗转为休整，休整转为战斗，睡眠转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转化为散会，散会转化为开会，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转为团结，生产转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春夏转化为秋冬，生转为死，死转为生，女转化为男，男转化为女，压迫者转化为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转为压迫者（对前时的老压迫者），战争转为『平』和平，和平转为战争，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为〕量变，有限转为无限，无限转为〔有〕限。如此等等），请同志们想一想，推而广之，教育干部。

现在的路线在创造中。

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少数人感觉是正确的，尚有很多人（可能是多数）将信将疑，或者不自觉，一部分人根本不相信。对于我们，理论上和若干实践上（相当的增产，其他工作也有当〈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但四、五、八^[1]尚未大部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尚是口号，165项全部

[1] 四、五、八，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实现后是大好，是中好，或者出乱子，尚未证实。所以说路线由于群众斗争和我们的思想反映已开始形成，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前后完〔成〕了。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正是形成正确路线的必『须』要条件，二者的对立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无此事实，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是一种形而上学。

四 在三月二十二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

张生与惠明^[1]（刊物问题）^[2]

看不到，抓不起（捡了芝麻，抱〈丢〉了西瓜）
是何原因？不思而已。

“势如破竹”“高屋建瓴”。

精神不振，奴隶精神存在，迷信古典作家，又没有学习到古典作家的势如破竹的风格，他们风格较高，我们风格较低。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

[1] 张生、惠明，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毛泽东在3月22日的讲话中，一开始讲了张生和惠明的故事，他说：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但无人送信，于是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胆大勇敢，是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惠明。

[2] 指创办《红旗》杂志。《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出版。

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演说^[1]，一个通知^[2]。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董〈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

大字报表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批评的尖锐性，庸俗空气一扫而空。

而我们呢？老是四平八稳，逢人且说三分，未可全抛一片。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王鹤寿在这次长出了一点菱〈棱〉角，可取。天津南京二位同志批判我，可取，虽然是错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3]虽然是错误的，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点可取。陈沂^[4]又当别论。

当面不说，背后咕哝，最不好。

尖锐的态度，委婉的态度，都好，依问题和情况不同而定。

从团结、帮助出发而采取的尖锐性，只会使党团结，不会使党

[1] 指陈伯达195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陈在讲话中主要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他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学边干。

[2] 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通知于1958年4月2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对贯彻“双百”方针提出了异议，同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工作者时，批评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4] 陈沂，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分裂。

有话不说，则相当危险。

应当选择说话的时机，是对的。像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大礼案、红丸案^[1]，那些人，并不高明。比干、汲黯、朱云、屈原、贾谊^[2]，则是好的。

怕带〈戴〉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老公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都要准备。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

“舍得一身剐〈剐〉，敢把黄〈皇〉帝拉下马。”

对苏联同志的某些原则问题，当面说，不公开，是适当的。

我们要适应群众斗水〈争〉的水平，群众现在比『我』我们先

[1] 大礼案，史称“大礼议”。1521年明武宗死，武宗无子，由兴献王子厚熜继帝位，为明世宗。在对其本生父母如何称谓及崇祀问题上，挑起了臣僚之间的激烈争议。礼部观政进士张璁等迎合世宗意，认为世宗是依祖训继续于武宗，议尊其本父兴献王为皇考。大学士杨廷和等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议三年，世宗裁定追尊本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致死十余人。红丸案，晚明三大案之一。1620年，明光宗即位后生病，服太监崔文升药，更重，又服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光宗即死。时人疑郑贵妃（明万历妃）指使下毒，引起争议，是为“红丸案”。结果将崔李二人谪戍。

[2]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相传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汲黯，汉武帝时任东海太守、淮阴太守，常直言劝谏，反对汉武帝反击匈奴贵族的战争。朱云，西汉元帝时任槐里令，为人狂直，多次上书抨击朝臣腐败。屈原，战国时楚国大夫，在同反动贵族斗争中，遭谗去职被放逐。后见楚国将亡，投汨罗江而死。贾谊，西汉文帝时为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

进。我们的某些作风，应赶快步有所改变。

1956年吹掉三样东西：有痛心的，有漠不关心的，有高兴的——三种态度，是一个教训。有许多问题，都有三种态度。

这次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1]进了一步。但思想谈得较少，似是缺点，是否不去重庆、武汉，以两天或三天时间谈一点思想问题，心里话。

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

又说是整风，又不谈思想，是不是矛盾呢？

收集民歌问题^[2]

二

创立学派问题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敌人统治着。

有些同志甘愿当资产阶级反动派学者的奴隶，是殖『民』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隶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没有学问的问题，向书呆子投降。

[1] 南宁，这里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11日至23日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 指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各省搜集民歌问题。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学问问题。

青年列宁的学问问题

青年黑格尔

青年达尔文

青年牛顿

青年孔夫子

颜渊，曾参，贾谊，诸葛亮，王弼，玄奘，惠能，李世民^[1]

我们自己这些人^[2]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3]

[1] 颜渊，孔子的学生，孔子称赞他的德行，说他“不迁怒，不贰过”，早卒。曾参，即曾子，孔子的学生，以孝著称，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18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文章，为世人所称誉。诸葛亮，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26岁时，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王弼，三国魏玄学家，曾任尚书郎，少年时即享高名，卒时年仅24岁。玄奘，唐代高僧，27岁时，他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赴天竺（今印度）寻经，游学天竺各地，经历17年后回到长安。惠能，即慧能，唐代高僧，传说早年丧父，以卖柴养母，因听人诵《金刚般若经》乃发奋学佛，后成为佛教禅宗的南宗开创者。李世民，18岁率兵参加反隋战争，26岁继皇帝位，即唐太宗。毛泽东在讲话中，举这些人为例，说他们都是少年有为的。

[2]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20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3]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是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1898年发动维新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被杀。章太炎、邹容，近代民主革命家。

中国的古文经学家

欧洲中世纪经院学派

耶稣、释迦的少年时代与经院派佛学家的比较

我们与右派的比较，究竟谁有问题

只要方向对，学问是可以逐步积累的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我们不是空疏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应当在理论上苦战多年

十九世界〈纪〉俄国文学界的自卑感

伯林斯基的一篇文章

五 在三月二十六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文件如何处理？

睡三天，如何走

(1) 事前没有设想，实业虚业并举（实多，虚少）

(2) 一年抓四次，平均每次半月，共两月

省、地、县可否这样？（大区六次）

稳稳掌握群众情绪，掌握建设进度

(3) 下次：抓工业（有煤、电、油、水、地、机、建、财、贸、银行、木〈林〉业、交通）

再下一次：抓文教；1959财政、计划；可否？

再下一次：抓商业。

(4) 各省、各部，如何虚实并举，红专都来？

(5) 工、农、商、学、兵、思，六者都要抓

(6) 对日五年一亿英镑贸易问题

1亿镑=2.8亿美元 每年0.56亿美元

1美元=4元人民币

3.8亿^[1]美元×4

15.2亿元人民币

3.04 ——每年对日贸易额

5\15.2

15

20

20

0

(7) 三个阶级，或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即尚未转变的地、富、反、坏和右派；

②民族资产阶级，即中间派；

③工、农（过去是被剥〔削〕者、或不剥〔削〕别人的独立劳动者）

(8) 解放第一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的一部分繁重工作，非常必要；如此就有可能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较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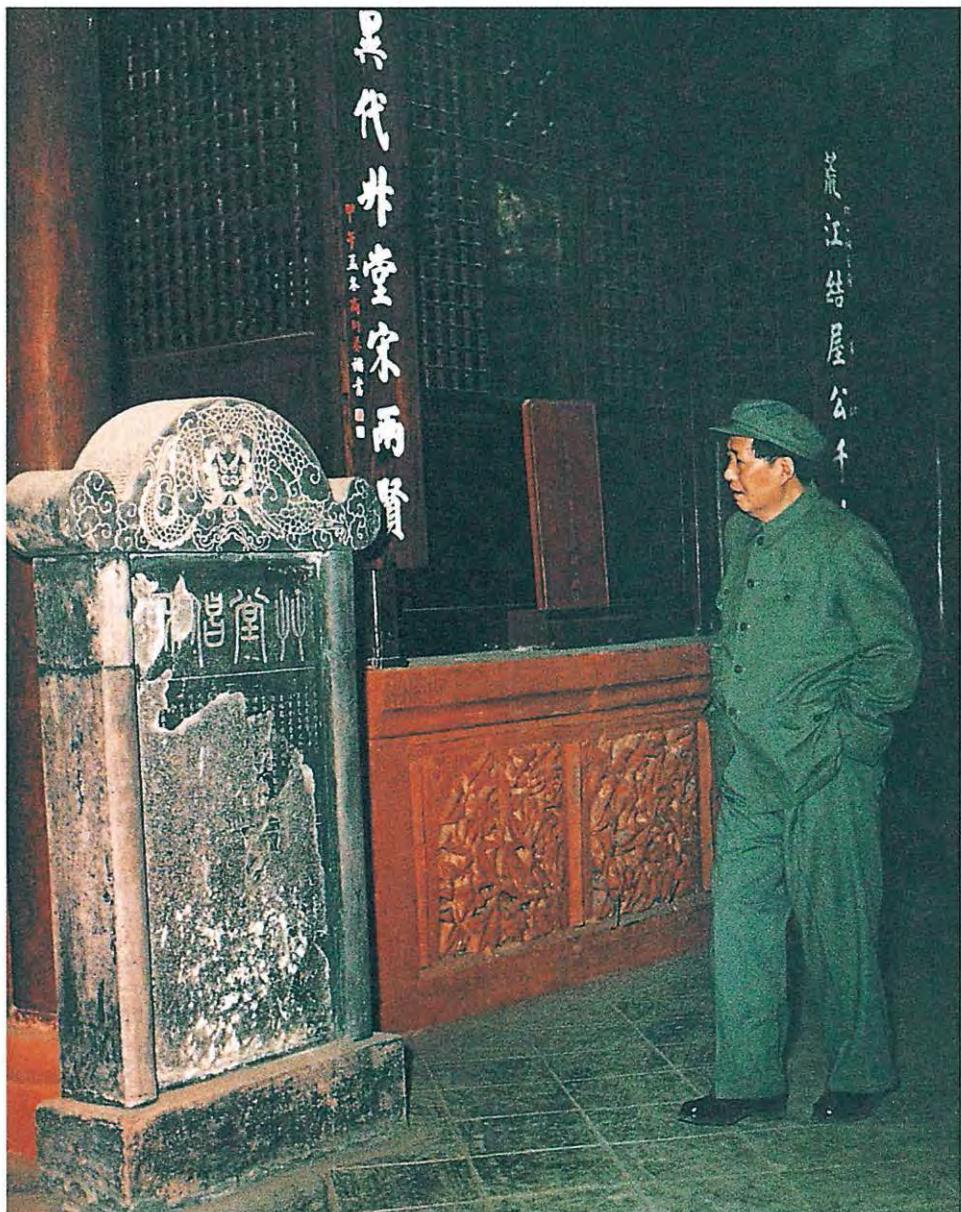
(9) 三区合开武汉会议

[1] 这里数字有误，应为2.8亿美元。以下乘除的计算均有误，对日五年贸易总额和每年贸易额，应分别为11.2亿元人民币和2.24亿元人民币。

叶飞、刘建勋^[1]是否到会？

北京是否还有人到会？

[1] 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



1958年3月，毛泽东参观杜甫草堂。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3月9日）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做。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3年完成，12个省5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至7年完成（包括2年灾荒），争取5年完成，这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

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两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

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做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

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

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得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3月10日）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

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

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

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

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門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的。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

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做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祝贺丹麦王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3月10日)

丹麦王国国王斐德烈九世陛下：

值此陛下寿辰和丹麦王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诚的祝贺。祝中丹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和巩固。祝丹麦王国繁荣，丹麦人民幸福和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于北京

对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 问题的建议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3月11日)

—

此件^[2]付讨论。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二

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五年不变问题及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
要求答复。

三

以上建议请中央考虑，如认为可行，即速确定，通知有关部门
和我们立即执行，以利建设。

以上二、三两项建议，请中央指示。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的批语；二是毛泽东为广东省委建议拟的标题；三是毛泽东修改的广东省委建议末尾的两段文字，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8年3月6日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财政下放对组织社会主义大跃进起了良好的作用。1958年广东省的基建投资，已由原来中央安排的1.19亿元增加到2.26亿元，即由地方追加1.07亿元。估计在开展反铺张浪费，厉行节约和挖掘生产潜力后，企业利润还可增加，也就有可能再增加投资，用于生产建设。（二）财政“五年不变”的规定，将会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之能更主动地去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因此，请中央考虑，是否正式宣布财政下放、五年不变的方针，和批准广东省五年基建投资计划。（三）要使工业的发展真正做到多快好省，除有些工厂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外，应把发展地方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些工厂尽量下放。现在有的工厂由中央各部门分管，地方插不上手，这些厂往往各搞一套，浪费很大，生产潜力远没有发挥。我们认为，在一个地区的工业，原则上必须确定由地方统一管理。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浙江省委关于冬季生产运动 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8年3月13日)

此件^⑩可以一阅。水利、积肥不算突出；但有些经验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8年3月5日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并上海局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浙江省冬季生产运动中关于兴修水利、积肥、绿化造林、冬播作物及除四害、讲卫生等方面的情况，提出了冬季生产运动中必须加以解决的几个问题：一、关于各项生产的全面规划和安排问题。该省绝大部分地区采取了“排任务、排劳力、排时间”的办法，把各项生产纳入计划，既抓住重点又照顾全面，因此使各项工作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做得又快又好。二、对占百分之十左右的三类合作社，各地正在抽调骨干加强领导，结合生产、整风彻底整顿三类社，要求在春耕前根本上改变这些社的落后面貌。三、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有些地方对粮食分配工作重视不够，放松领导，致使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没有核实，统销未作妥善安排，群众叫喊缺粮的现象又有出现，对当前的生产高潮有不利影响。报告最后说，为了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省委决心继续抓紧整风，彻底转变领导思想和作风，用整风的精神和方法领导生产运动。此外，还希望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检查评比，定期组织各社代表到中心社参观检查，学习先进经验，研究改进办法，制定工作规划，使参加检查和被检查的单位都能明确努力方向，以推动春耕生产运动的发展。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陕西省委关于组织负责干部 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的 通知的批语

(1958年3月15日)

此件^[1]可阅。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同志们研究一下，出一批题目发给若干干部；同时寄中央书记处一份。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1] 指中共陕西省委1958年2月16日关于组织县级以上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的通知。通知说，为了使全党负责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对于整风运动和工农业生产高潮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以便有效地改进实际工作，促进工农业大跃进，并使负责干部注意采取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省委决定凡县级以上具有进行理论研究工作条件的负责干部和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理论教育工作者，都要尽可能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单独或组成小组，每年至少研究一个有关当前实际工作的重大问题，写出专题论文或报告。通知还列出了五十个供地委书记以上负责干部参考的研究题目。毛泽东的批语和陕西省委的通知，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 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

(1958年3月15日)

此件^[1]可一看，然后谈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二十八期刊载的《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意见综合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1958年1月8日、9日、13日、14日分别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会的情况。在新闻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版面上也没有生气。在出版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出书没有长期规划，今天不知明天做什么，和现在国家建设面貌不相称。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对旧的通俗文艺书籍采取什么态度，方针还不明确。而儿童文学书籍无人写稿，愈是低年级学生读的书愈是无人写，发生稿荒。在文艺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大学的古典文学师资有脱节现象，建议在上海成立文学研究所。在电影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如何“放”的问题，比如，有毒的片子是否经过消毒、修改后就拿出去？还是发现问题就停下来重新搞？还有人反映，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情况反映，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1]的批语

(1958年3月16日)

付讨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各种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1] 指中共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委员会1958年2月27日向洛阳市委并河南省委上报的关于第一拖拉机厂1958年至1968年跃进规划。主要内容是：一、增加品种，拟由原设计的一种产品增至七种基本产品，和十一种变型产品。二、增加产量，由原设计五万四千标准台，第一期至1961年达到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六标准台（1959年第二季度正式投产，年底可生产八千二百三十三标准台，1960年7月达到设计水平），再经过二期与三期扩建，增至十九万二千八百六十六标准台，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厂可累计生产一百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一标准台。三、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累计产品可耕作面积六亿三千一百九十六万亩。四、我厂十二年的累计产量可赶上英国一九七二年拖拉机保有量，即至1969年我厂可累计生产七十万三千四百五十混合台，超过英国1972年本国保有量（七十万台）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台。跃进规划后附有“十年内增加品种与逐年产量表”，表内的“品种名称”列有拖拉机型号“ДТ-54型”“ДТ-75型”等。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规划，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批语^[1]

(1958年3月16日)

付讨论。山西的办法很好，各省、市、区可以仿行。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3月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二十七期上。该期刊载了《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一文，文中说：中共山西省委、河南省委都在1958年1月间发出了关于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指示。山西省委要求从1958年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品质优良、思想意识健康、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工作干部。具体要求是：每个县至少培养出二至四人，每个地委和市委培养出五至十人，省级机关培养出三十至四十人。要求在二月底前认真地配备和调整理论教员，并确定了在职理论教员的编制总额和挑选理论教员的条件以及对理论教员的培养和使用办法。河南省委也要求理论教员的调整配备工作要在二月底以前完成，要求“必须如同支援文教战线一样以最大决心抽出一批优秀干部来充实这条战线”，并要求经过这次调整之后，一般不再调动他们做其他工作。毛泽东在批发这篇文章时，将括号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几个字删去。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文章，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一批按语^[1]

(1958年3月19日)

这些按语^[2]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3]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

[1] 这是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批按语写的说明。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毛泽东1955年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写的一部分按语。

[3] 书名应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祝贺突尼斯独立二周年的电报

(1958年3月19日)

突尼斯总统哈比布·布尔吉巴阁下
阁下：

欣逢突尼斯独立二周年纪念日，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突尼斯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新的胜利。祝中、突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祝突尼斯共和国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8年3月19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8年3月20日）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

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总路线正确，是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那么，先后一年、二年，乃至三年、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在高级合作化问题上，李井泉同志可是从容不迫，他就不忙搞高级化。他搞高级化不是在五五年，也不是在五六六年，而是在五七年。别的省大概是五五年下半年和五六年上半年就搞得差不多了，他那里迟一年。这有什么要紧？也许还更好些。这当然不是泼冷水。如果你们现在去传达，本来是三年搞得完的，一定要搞四年，说横直是讲了的，这不算荣誉，搞五年也不算不荣誉，那也不好。要看条件如何，群众情绪提高没有，觉悟提高没有，这是精神条件。还有物质条件。只要条件搞好了，需要多少年，这是个客观的事情。如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用十年、八年或者十几年完成四十条，也是搞社会主义，但那是另外一条路线。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就是不那么舒服，慢一点，人民比较愁闷。苏联人民的气不舒畅，干部上下级之间也不很通气，四十年搞那么一点东西，搞那么一点粮食，搞那么一点钢。有的同志讲，我们只要十八年（已经过了八年，再加两个五年）就行。我说三个五年计划赶上它年产五千一百万吨钢就好了。假如十八年抵它四十年，那当然好。我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我们的政治条件跟它有些不同。应当说，我们列宁主义比它多一点，生动活泼，它那里列宁主义丧失了一部分。我们这一套是学习列宁的。同志们，你们看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革命前夜同革命之后几年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是跟群众通气的，把心交给群众的。骂起来的时候骂得很凶，只有敌人恨他，群众说骂得

好。时间、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用脚走路，一点钟只能走五公里，用自行车就多了，用汽车、火车、飞机更多，这是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条件办得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办不到的，就不要勉强。现在可有一股风，这股风不是七、八级，而是十一、二级。这风很有好处，现在不要刹这个风。但是我们内部安排，要压缩空气。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事情还是那么多，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虚报、浮夸、争名，不去务实，讲是讲得好，一查没有措施，这就危险。这一点请同志们注意。总而言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是现在有些事情没有措施，就不务实了。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委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

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一分为二，这是普遍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腐朽力量。因此，我们就要赞美新事物，为新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折衷主义是假公正、假科学、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诡辩术，是展开唯心论的范畴的。

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

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得越多生得越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

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

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个儿和矮个儿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关于推广徐水县 实现农田水利化经验的批语

(1958年3月21日)

此件^[1]连同谭震林的报告^[2]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1958年3月14日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给邓小平、彭真并报毛泽东、中央各负责同志的报告。报告中说，徐水县从1957年11月起，苦战3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至三套灌溉设施。徐水县兴修水利的特点，是在群众自办农田水利的方针下，建立一个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小型互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灌溉相互为用的水利工程系统。报告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一）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二）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三）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四）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五）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六）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1958年3月13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视察。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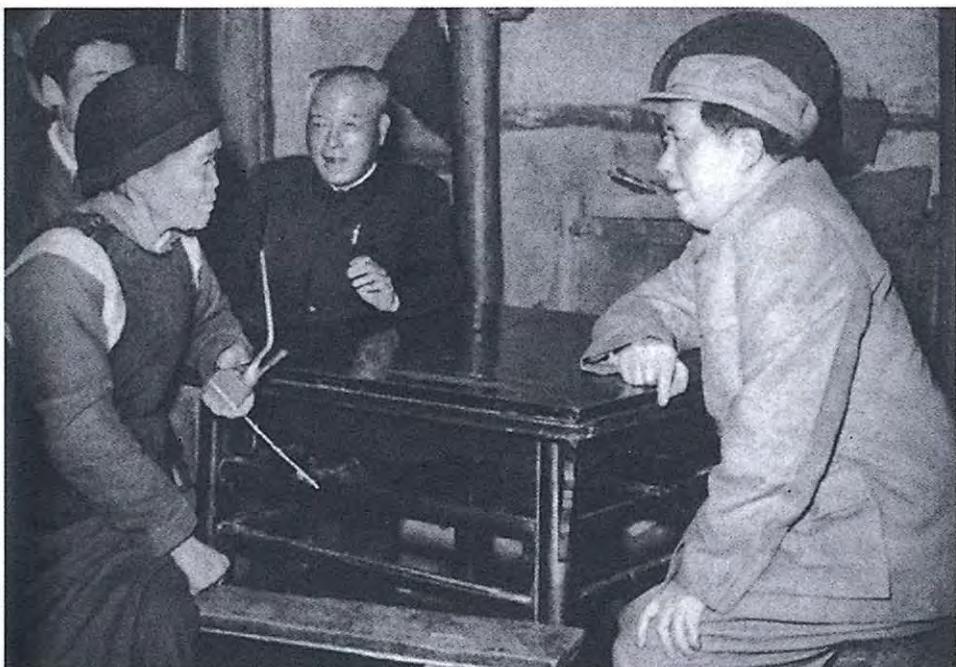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



1958年3月，毛泽东在红光农业合作社视察时和小朋友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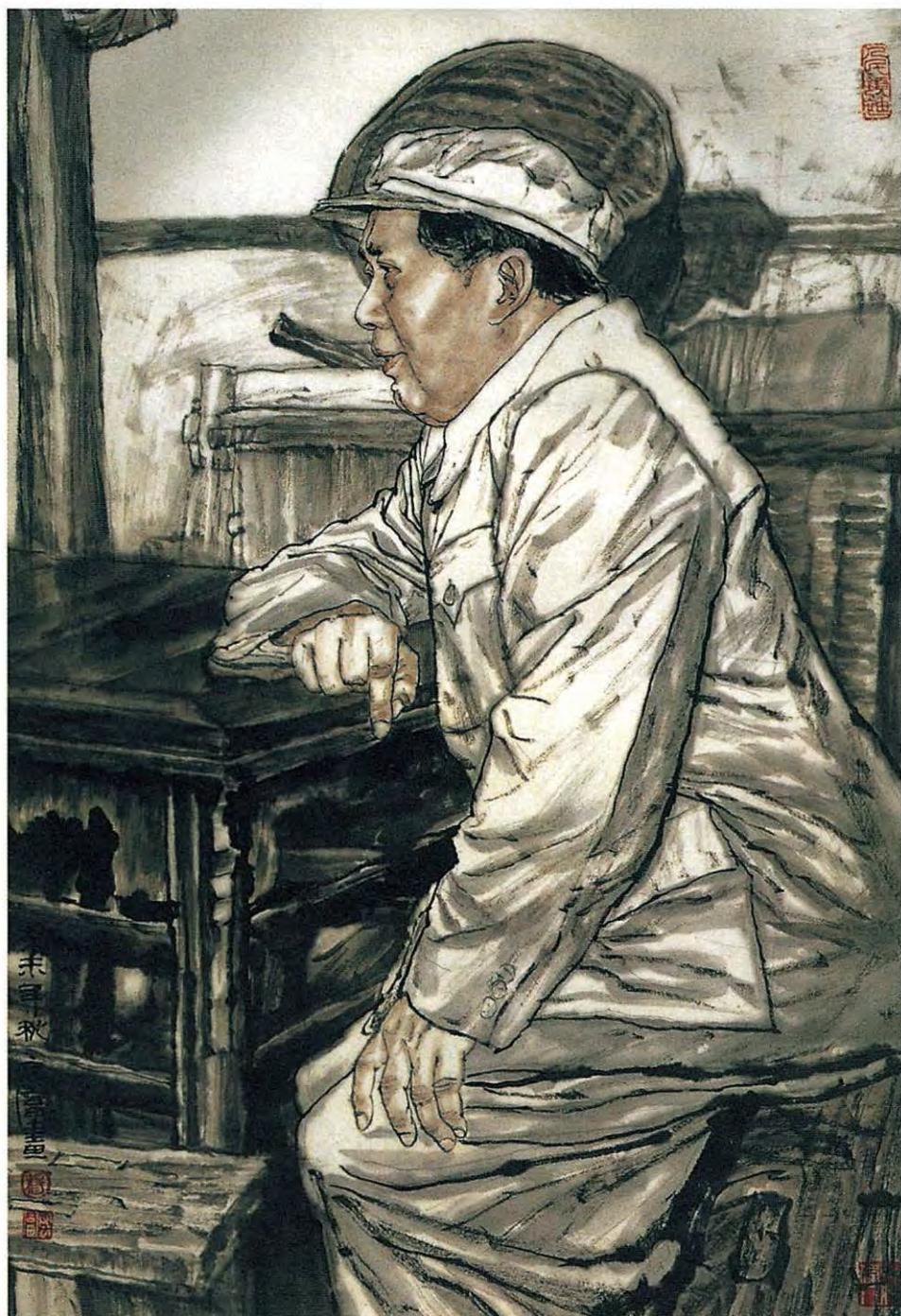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幸福公社和农民高勃然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红光农业合作社和社员温大娘亲切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的苕菜地摘苕菜。



《在合作社社员家中》(中国画)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到四川灌县视察都江堰，观看水利规划模型。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观看都江堰水利枢纽规划模型。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

(1958年3月21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阁下
总统先生：

值此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致以热忱的祝贺。祝贵国繁荣、人民幸福、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给滕代远^[1]的信

(1958年3月22日)

滕代远同志：

铁道文件^[2]，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

[1] 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2] 指铁道部党组向成都会议提交的文件，包括铁道部党组1958年3月14日《关于全国铁路十五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二年）新线发展规划的说明》和滕代远1958年3月2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建成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报告说，旧中国在73年内仅修筑过2.5万公里铁路，不仅数量少，分布也极不平衡。建国以后，为迅速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在恢复原有铁路的同时，于1950年就开始新建铁路，到1957年年底，全国已经通车的铁路总长度增加到近3万公里。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有3万公里铁路是太少了。根据中央关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业与农业并举、沿海与内地兼顾的建设方针，为适应目前全国工农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形势，铁道部党组反复研究了新建铁路的规划，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新线2万公里，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各修3万公里，十五年共修建8万公里新线，到1972年，全国铁路总长度将达到1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上从第十一位跃至第三位。这些文件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太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习的地名不要重写。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上午七时

滕代远同志：

得此文件，谨宣你些补充，特此函。该限加修改：每一件事必须修改不可。宜用经济（政治）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该用军用的就用军用的，该用政治的就用政治的，每一个五年计划用五年计划，不能胡乱改，如前所叙除到（修改）。这些宜一并写进去，可以在同部处，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覆修改。三件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件现退回，请你用墨水笔在幅面底稿上。我写出来的是清楚的，你用铅笔在幅面上。地名不要乱写。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致滕代远信的手稿。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8年3月22日）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

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1]。”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

[1] 这里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

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

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们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稣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

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在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实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从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

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被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

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1]的批语

(1958年3月22日)

—

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3月13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一文。文中说，目前上海化工学院学生正大张旗鼓揭发各班级中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现象，形成“兴无灭资”巨流。许多“自由王国”“自由天地”“自由集体”已被揭发出来。该校两个右派学生也写了一篇大字报，其中揭发的情况，经学校了解是真实的。大字报说：化工学院三舍203室，夜夜电灯通明，烟雾弥漫，房门倒锁，经常聚拢一些头发高耸、衣着奇异、口含烟卷的学生，桌上陈列菠萝美酒，口中哼着黄色歌曲，手里玩着从文娱部偷来的扑克打桥牌，窗旁悬着一副对联“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他们每天夜自修的生活。在学习上，他们从不认真，上课坐在最后，偷看小说，对政治课及政治运动则更歧视，不仅诽谤政治课教师，而且千方百计逃避政治活动。出入这个房间的所谓“知己”，都是一些这次反右斗争中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一些分散在各个班级的落后分子和认识不清的人。领导过去注意不够，说明领导存在官气。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作为会议文件在成都会议上印发。

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

见1958年3月13日《宣教动态》。^[1]

[1]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一文后写的说明。

对彭涛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 报告^[1]的批语

(1958年3月22日)

可用。付讨论。请作者回京后，将文内一切化学名词注上分子式。三月间写的四级办肥料厂文件^[2]，不如此件生动和有说服力，如有时间，请重写一次。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二日

[1] 指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1958年3月21日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我国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构成和建设构想，认为我国可以在有机化学产品上也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走以电石为主的发展合成化学工业的道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我国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能不能大跃进？能不能在十年内赶上英国？”，并把报告中“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至少在十年内我们应该走以电石为主的道路”一句，改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应该走以电石为主的道路”。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2] 指彭涛1958年3月4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学肥料生产七百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署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四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1962年氮肥产量可达到1800万吨至2000万吨，再加上500万吨至700万吨磷肥和部分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亩施肥量上，十年内赶上英国，也就大有希望了。

对《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 问题的意见》^[1]的批语

(1958年3月22日)

退乔木^[2]办。在第二件上，增加了县的一条，请与少奇、小平^[3]商量酌定。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1] 《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是在1958年2月21日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一、为了适应农业、地方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大跃进，根据中央改进行政管理体制的精神，在某些省、自治区可以适当地扩大专署的权限。1. 建立专区的财政。2. 专署对所辖县、市的财政预算执行，可以作必要的调剂。3. 原由省委托专署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中等学校，划归专署直接管理。4. 根据地方工业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兴办适合于专区管理的企业，建立中等技术学校和工业、农业的科学的研究机构。5. 专区范围内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由专署编制汇总。6. 专区范围内的人员编制，在省控制的总指标内，专署可以在地区间和部门间作必要的调剂。二、为了使工农业便于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每个专区应有一个工业城市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三、专署无论是否扩大权限，仍然是省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不是一级政府。四、专区的建立或撤

对《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销，专署行政区划的改变，都由省委、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然后由省人民委员会报国务院备案。五、专署权限是否扩大和如何扩大，专署编制是否相应地扩大和如何扩大，以及专署的组织形式，完全由省委、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这个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1958年4月2日会议同意下发。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给田家英^[1]的信

(1958年3月22日)

田家英同志：

请着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

（1958年3月25日）

可以一阅。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五日

[1] 《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的主要内容是：（一）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运动正在进一步发展。同工种比，同业务比，同行业比，厂际比，车间比，科室比，个人比，越比越深入。（二）运动与前一时期比较，开始转到想办法，找关键，比智慧，比措施。很多厂开了诸葛亮会，或者摆擂台。如江南造船厂抓住了缩短造船修船周期的关键，订出先进的指标和措施，原来造五千吨的船花18个月，现在9个月就完工；修船周期也缩短一半。（三）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规章制度实际上被冲破了。比如，工厂的成品以前是装箱后送商业部门验收，这样费时费钱，现在商业部门派人到工厂验收了。又如工厂上下工序之间、车间和验收人员之间的手续是很多的，现在已大为减少了。（四）有些工厂建立新的规章制度跟不上去，工作已发生困难。如江南造船厂过去靠施工命令、派工单领导生产，现在车间工

长、主任直接到车间派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新的规章制度跟不上，计划科统计不出完成生产的情况，劳动工资科发不出工资。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已要工业部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五）各方面的情况有很大变化：1. 许多厂增产一倍、两倍以上，最多的永泰电机厂产值比去年增加二十六倍；新产品不断出现。2. 群众思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过去调动工人积极性总是讨价还价，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3. 厂内及厂与厂之间的协作关系有很大改进。上海绢纺厂过去三班工人闹不团结，干部没有办法。这次检查说：不团结就赶不上英国。现在三班工人互相照顾，生产也上去了。（六）修改定额问题。国营大厂有定期修改定额的习惯，大都在四五月修改，现在提前了。电机、橡胶、针纺等行业的工厂自动提出修改定额，办法是工人自己提出来，自下而上经过讨论，再用送捷报的办法到没有修订的工厂去报喜。（七）最近发现有简单化强迫命令的现象，如推销公债、储蓄、税收、绿化等。这些情况已引起市委注意。（八）商业方面的情况：1. 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效率提高以后，公司、基层商店感到人员过多，很多职工贴大字报提出上山下乡。对这些人的安排，除到郊区、江西和长兴岛以外，还要研究其他的出路。2. 机构与体制问题，经过酝酿，上海市属六个局合并为三个局，即第一、第二商业局合并为第一商业局，零售业务下放给区，市级批发业务交中央站兼管；服务局、粮食局、供销合作局合并为第二商业局；外贸局不动。3. 商业网的调整正在个别区、个别行业试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材料，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1958年3月25日）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委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那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

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除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

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两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尽可能地征求意见，搞出的东西才比较有把握一点。但这样搞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还没有经过实践的证明。许多东西，我自己就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究竟对不对，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我看还要看几年。我不提倡我们在报纸上来宣传这些东西，可怀疑的东西不要去宣传。我说至少还要看五年。我们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革命。至于建设，还没有证明，或者说还只有初步的证明，因为只搞了八年嘛。为什么说革命的正确性已经证明了呢？因为我们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蒋介石政府总是推倒了，你不能说这不是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去年这一年，也可以说经过证明了。我不谨慎，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写了些按语，其中有一篇，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问题好像基本解决了。^[1]那个时候矛盾的两外一个侧面还没有暴露出来，还是经验不足。

[1] 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所说的“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问题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哪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

面地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得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见、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波匈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

（1958年3月26日）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由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

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1]学^[2]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成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

[1] 兵，指国防。

[2] 学，指文教。

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人）。

右派这么多，所以采取除少数外，不提他，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草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3月26日)

—

退陈伯达^[2]同志。此件可用。略有修改^[3]。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4]同志斟酌处理。

毛泽东

三月廿六日

—

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

[1] 指1958年3月第一次起草的刘少奇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草稿。3月9日，邓小平在向政治局各同志征求意见的信中说：“这个报告草稿是为四月间党代表大会准备的。草稿由陈伯达同志写出，中央其他同志都没有看过。现发给你，请你看后准备意见。”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改在5月举行，报告稿重新起草，5月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 即本篇二、三，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4]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

三

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

在介绍一种有灭蝇蚊作用植物的 材料上写的说明^[1]

(1958年3月)

—

四川农民报提供的关于具有消灭蝇蚊作用的一种植〔物〕的材料。这种植物名曰“打破碗花花”。

—

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1] 毛泽东的说明写在《四川农民日报》1958年3月19日提供的介绍四川农村中一种具有杀虫作用的名叫“打破碗花花”的植物的一份材料上。材料中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作“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能杀蛆灭孑孓，它还能毒杀土蚕、螟虫，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介绍了这种植物。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在重庆钢铁公司》(中国画)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建设机床厂视察。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时，受到职工的欢迎。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建设机床厂。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建设机床厂车间参观。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建设机床厂。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隆昌气矿。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伏罗希洛夫 和赫鲁晓夫任职的电报

(1958年3月2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欣悉你们光荣地被选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祝你们在争取实现苏联人民这些崇高目的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有力保证。祝我们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对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 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的修改^[1]

(1958年3月)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2]

[1] 意见稿在第五项中还谈到要正确地解决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毛泽东审阅时又增加了“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一种关系。

[2]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1958年3月)

(□□□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蒙汉两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哪里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哪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做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

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要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即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挽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得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口□□，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做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字报。中国自有了大

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思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毛泽东插话)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发言时的插话)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毛泽东插话)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

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话)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土地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像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的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毛泽东插话）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要不是谭□□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做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时期什么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

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觉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吴德发言时的插话）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话）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做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毛泽东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哪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

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泽东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 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 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 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话)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

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1]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

[1] 原文如此，疑有误。

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得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淠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

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么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周林发言时的插话)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

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支枪,他先攻我。

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话)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

□，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其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

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做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做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做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并非真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陶铸发言时的插话）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多、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柏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绝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塞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没有料到，如一九五六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

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在廖鲁言《关于农业方面的 几点意见》^[1]上加写的话

(1958年3月)

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

[1] 这是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准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稿，题目是毛泽东审阅时拟的。这个发言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为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 写的标题和批语

(1958年3月)

——
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①

[1] 这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为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而拟写的标题。编入的诗词主要有：李白的《蜀道难》《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上三峡》《早发白帝城》《送友人入蜀》，杜甫的《剑门》《蜀相》《水槛遣心二首》（选一首）、《赠花卿》《野望》《狂夫》《客至》《登楼》《绝句四首》（选一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白帝城最高楼》《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高适的《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岑参的《奉和杜相公发益州》，唐玄宗的《幸蜀西至剑门》，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张藉的《成都曲》，刘禹锡的《松滋渡望峡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的《竹枝》二首，李商隐的《马嵬》《杜工部蜀中离席》《武侯庙古柏》《筹笔驿》，罗隐的《筹笔驿》《魏城逢故人》，李贺的《巫山高》，温庭筠的《锦城曲》，韦庄的《菩萨蛮》五首、《荷叶杯》二首，苏轼的《洞仙歌》一首，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成都书事》《归次汉中境上》《楼上醉书》《秋晚登城北门》《渔家傲·寄仲高》《诉衷情》《谢池春》。另据1954年4月30日《成都日报》报道，毛泽东于1958年3月7日游览了杜甫草堂。报道说：在杜诗版本展览室，他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是政治诗！”他还仔细地看了各种杜诗外文版本。

二

送田家英^[1]同志。用后退毛

第11页第二行、第13页第13行各有一个错字^[2]，请即改正。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初稿中的两处错字是：在第11页上，李商隐《马嵬》一诗中“空闻奉传宵柝”应为“空闻虎旅传宵柝”；在第13页上，韦庄《荷叶杯》一词中“花不见无期”应为“花下见无期”。

为编印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 写的标题和批语

(1958年3月)

—

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①

二

放在明诗前，作为总题，单印。不与唐宋诗混。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为编印明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而拟写的标题和题下说明。编入的诗主要有：杨基的《长江万里图》，李延兴的《读贾谊王粲传》，杨慎的《宿金沙江》《三岔驿》《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送余学官归罗江》《春兴二首》《武侯庙》，黄夫人的《寄外》，皇甫汸的《从军行寄赠杨用修》，李攀龙的《送皇甫别驾往开州》，谢榛的《送谢武选少安犒师固原因还蜀会兄葬》，谢遴的《巴女词》，费密的《朝天峡》，吴骐的《汉昭烈》，陈恭尹的《邺中》《蜀中》，黄幼藻的《题明妃出塞图》。

为成都会议印发马克思和毛泽东文章拟的标题

(1958年3月)

—

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1]

—

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还是从片面的财政观点出发？^[2]

[1]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拟的标题，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现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

[2]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另拟的标题。《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

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

(1958年3月)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对饲养员）辛苦了，好同志！（握手）
祝你们获得更大成功！

饲养员（以下简称饲）：全靠你老人家的教导！

毛：主要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对社长）能使你们全社妇女都当上模范吗？

社长：保证全能当上，毛主席！

毛：全当上模范未必行吧！只能在二三年内做到有一半妇女当上模范就不错了。你说我这个看法保守吗？（众笑）

毛：参观一下你们的养猪场好吗？

饲：欢迎，欢迎！毛主席多指教！

毛：别什么都要我指教吧，我和□□都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许多事情上，你们比我们内行多了，是吧？

毛：这是什么？

饲：是糖化牛粪，拿来喂猪的，猪很爱吃。

毛：真是新鲜事儿，牛粪也能喂猪！怎么个制法？介绍一下吧。（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向□□说）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从前我们就没听见说过。看来我们中国那句老话“做到老，学到老”实在不错！

毛：（对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回家喂猪有意见吗？

饲：有啥意见呀！我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这养猪场哩！

毛：很好！可要把你学的科学，传授给群众才更好。

毛：……多看看先进的东西，眼光就会更开阔些。

（亲自给一头猪打了蛋清针，然后对□□□说）

这里的经验真不少，特别是代饲料，如果全国都推广，一年要节约好几十亿斤粮食哩！请记者同志在报纸上介绍一下好吗？

□□□：办得到。

毛：最好后天见报。

（对饲养员）谢谢你们！对我们教育太大了！

饲：可有人看不起我们哩！

毛：谁？谁是顽固派？

（饲养员介绍一些人如何从轻视妇女到称赞妇女的成绩）

毛：看不起妇女的人虽不多，但哪里总有几个，这不完全怪他们，过去封建制度对他们影响太深了，脑筋一下不容易转过弯来，又不能用飞机大炮来对付他们。那怎么办呢？我看除了加强教育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妇女同志们做出成绩来，多拿事实给他们看，看得多了，他们脑子里的那个“封建王国”就会不攻自破的。

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话^[1]

(1958年3月)

毛泽东：（对江峡轮三副、女青年石若仪）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问石若仪）你在船上工作多久？

（石若仪说到有四年多了。）

毛泽东：（问杨大副）你呢？

杨大副：三十多年了。

毛泽东：（对石若仪）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毛泽东：有些地方的航道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

毛泽东：（对江峡轮船长）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给青年人。

[1] 这是1958年3月，毛泽东乘江峡轮去武汉途中，和船员谈话的一部分。



1958年3月，毛泽东和王任重等在江峡轮上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乘坐江峡轮去武汉途中，和女三副石若仪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江峡轮驾驶台和船员亲切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驾驶台向莫家瑞船长了解长江航道的相关情况。



1958年3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后在船上和大家畅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江峡轮上和船员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和女三副石若仪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向大副杨大福了解长江的有关情况。左三谢滋群，左四杨大福。



1958年3月，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三峡。



1958年3月，毛泽东乘船视察三峡航道。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江峡轮上考察三峡航道。



毛泽东曾三次坐过的江峡轮，后称东方红轮。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1]

(1958年4月2日)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比我们实现工业化的时间早。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外国有好东西为什么不学？学了究竟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是讲学好东西，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是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可是，有时也学了一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这个责任不能由苏联专家担负，而应由我们自己担负。这是指对苏联经验随便硬搬，十个指头中间有一个指头学得不对。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先进经验，但也把一部分不适合中国经验学来了。这也有一个好处，不适合的经验我们再改进，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经验。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就行不通。

要学先进经验，这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的。同时有一小部分经验不适用，这一部分搬到各国是有害的。列宁告诉人们不要硬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话，就是它的基本原理，也要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

现在很好，在莫斯科开了一次会，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决定

[1] 这是毛泽东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了一个根本的纲领。刚才讲的，纲领上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各国情况相结合；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没有这样的纲领，现在有了这个纲领，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所接受的纲领。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接见以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为团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前排右四为雅罗谢维奇，后排右一为武汉市长刘惠农。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 十三周年的电报^[1]

(1958年4月3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当匈牙利解放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的匈牙利人民的这些成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的电报。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三周年。

就感到欢欣鼓舞。祝中匈两国人民间的永恒友谊和兄弟合作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4月6日）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

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做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

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得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地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

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划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游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4月6日）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

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采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

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板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委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

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作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作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蓬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十年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1958年4月1日至6日)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每省都要采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副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好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比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好不好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

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来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担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阳。刘琨、祖逖闻鸡起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额、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藏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没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门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

△大鸣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看，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话，只听空气的话。斯大林在世好像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题就接近解决。让闹，闹够，你们总是不通，一不让闹，二不让闹够。

△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没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斤，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门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骂得很凶。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鸣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鸣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

△（在湖南□□□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题，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心在农村了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查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查团去基层检查。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查几次，检查很好。没有检查的要补上这一课。

△（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这个问题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得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竟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题。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地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这是党内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大学接见武汉社会科学界人士。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的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上向代表招手致意。



1958年4月，毛泽东和著名水利专家何之泰亲切握手。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接见科技工作者。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和科技工作者在一起。



1958年4月，毛泽东和武汉测绘学院院长、著名测绘专家夏坚白亲切交谈。



1958年4月，毛泽东和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亲切谈话。

关于不派代表出席南共联盟 第七次代表大会给赫鲁晓夫^[1]的信

(1958年4月8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您四月三日给我们的信^[2]，并听取了尤金^[3]同志的口头说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在各国共产党尽了一切努力改善同南共的关系之后，提出并准备通过这样一种有体系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基本原理的纲领草案，表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企图向全世界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同莫斯科会议十二国共产党宣言相对抗。我们决定同你们采取一致的步骤，改变过去的决定，不派代表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2] 指赫鲁晓夫1958年4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南共纲领草案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南共纲领草案是别有用心地企图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实质上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相违背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当前国际局势、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有不少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和评语。因此，苏共中央准备改变原定派代表团参加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只委托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

[3]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关于不派代表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给赫鲁晓夫的信

大会，而委托我驻南大使伍修权同志以观察员身分列席。我们并决定不向南共代表大会发贺电。请将你们通知南共不派代表出席南共大会的信（副本）及发信日期告诉我们，以便在你们发信给南共之后，我们随即把我们新的决定通知南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

对江苏省委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的 报告^[1]的批语

(1958年4月8日)

付讨论。研究推广办法^[2]。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

[1] 指中共江苏省委1958年3月29日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给中央、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江苏省的农业中学，是从邗江县施桥乡和海安县双楼乡开始的。施桥乡用七天的时间办了两所，双楼乡用四天时间办了一所。现在，全省各县都在筹办这类学校，截至本月24日，共兴办851所。举办农业中学必须贯彻群众自办、半耕半读、勤俭办校、为生产服务和谁读书谁出钱的原则。从已办和正办的农业中学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办学的目的比较明确，是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办学的方法，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许多重大问题都经过群众讨论解决。学制一般暂定三年，也有打算学两年的。课程一般有语文、数学、农业知识（或者有关技术知识课等）、政治四门课。教材暂由各县、市自编，省和专区也在编写。教师就地取材，一是没有升学的高中生，二是下放干部兼课，三是在中小学教师中挖潜力，兼课。上课时间，有半日制，有隔日制，个别也

有早晚班制，形式不拘，以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教学为原则。学生一律走读，实行半耕半读，又劳动，又学习。收费标准，各地不一，一般是每学期收学费四至五元。校舍一般利用原有祠堂、庙宇或公房，也有租用民房或搭些草房。都能做到因陋就简，贯彻群众自办，乡社领导，勤俭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

[2] 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各省市党委、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中说：（一）普遍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对于满足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的强烈要求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有重大的作用。这是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凡是有条件的省、市和自治区，应当仿效江苏的办法，大力开展民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二）随着各地大量举办农业中学，师资必然感到不足。这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潜力，组织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下放干部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干部去做教员；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和改进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和农学院的工作，采取各种有效方法，迅速培养农业中学的师资，并且帮助农业中学教师的提高。同时，各级党委还要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根据因地制宜、学以致用的原则，编辑当地农业中学的教科书。（三）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它和普通中学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在城市和农村发展民办职业中学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普通中学的领导，改进普通中学的教学工作，积极提高教学质量，以保证高等学校有高质量的学生来源。普通中学的学生，要利用假期和休息日的一部分进行劳动，实行勤工俭学，但不应实行“半工半读”，也不要勉强实行学校“自给”和“半自给”，以致妨碍学生的学习。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4月10日)

此件^{lll}很好。转发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中央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

[lll] 指中共甘肃省委1958年3月29日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给中央、兰州军区加发甘南州委的报告。报告就乘这个机会解决甘南问题；区别对待部落头人；收缴叛乱地区的枪支；坚决彻底肃清外来反革命分子；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寺院；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在群众中追悼被杀害的藏族干部和群众；组织武装工作队等11项措施向中央作了汇报。



1958年4月，毛泽东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亲切交谈。



1958年4月，毛泽东参观武汉市第六工业展览会展出的第三文娱手工业社会成产的竹制点头喷粉器。



1958年4月，毛泽东观看沼气灯和沼气炉。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观看湖南木偶剧团的表演。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观看皮影戏后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

介绍一个合作社

(1958年4月15日)

—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⑩，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⑪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

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于广州

—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¹⁾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1] 指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1958年3月2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个报告同毛泽东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58年6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1958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这次接见的情况，新华社记者写成通讯《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刊载在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其中有这样的报道：

毛主席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一听就知道毛主席指的是“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那篇“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报告。他马上告诉毛主席：“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主席还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主席就称赞说：“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毛主席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毛主席同崔希彦开始了有趣的谈话。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崔希彦说。

毛主席摇摇手说：“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

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毛主席又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估产是每亩一百五十斤。”

毛主席算了一下以后说：“你们计划每亩产八百斤，小麦每亩只能收一百五十斤，还有六百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八百斤？”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回答。

.....

燃着一支香烟，毛主席亲切地对崔希彦说：“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听着毛主席的教导，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只是说：“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毛主席又问崔希彦。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这时，毛主席和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毛主席听，共有20多种。

“这么多，能做完吗？”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他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施德生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做。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熊天荆说。

“你的意见呢？”毛主席问熊天荆。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毛主席乐得笑开了。

.....

[2] 这段话原手稿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同志意

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在本篇（二）中的一段批语，就是针对这段话的修改而写的。《红旗》杂志发表时，改为现在这个表述。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撰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手稿（部分）。



西安雁塔区春花农业社社员在创作壁画《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农业一马当先，各地纷纷提出“大跃进”目标，报刊上不断出现“高产卫星”。



《毛主席指引金光道》(中国画)



《毛主席来到俺庄丰产田》(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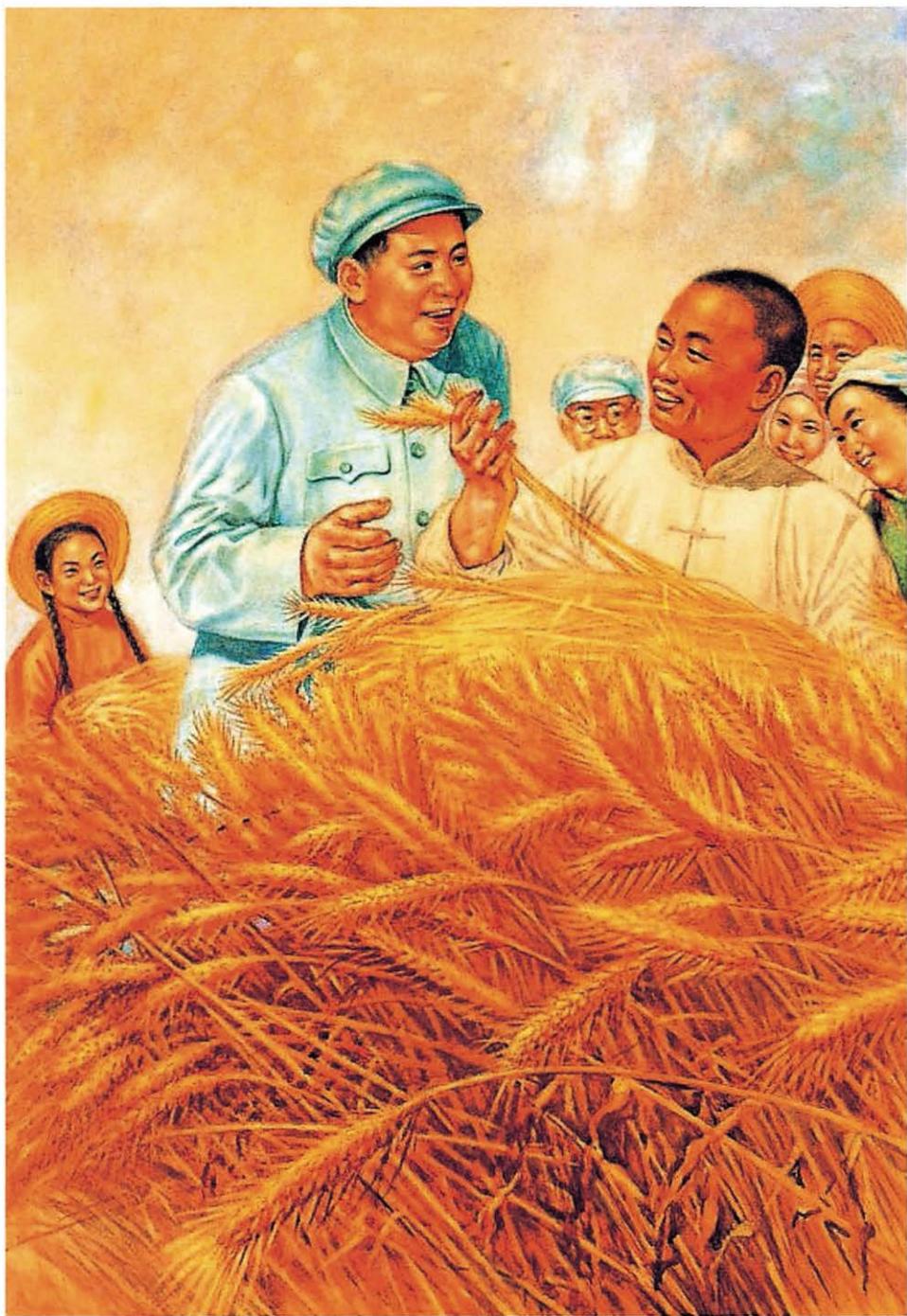
《人民领袖》(中国画)



《主席来到我们家 问长问短把话拉》(中国画)



《毛主席和社员在一起》(油画)



《毛主席来看我们的庄稼》(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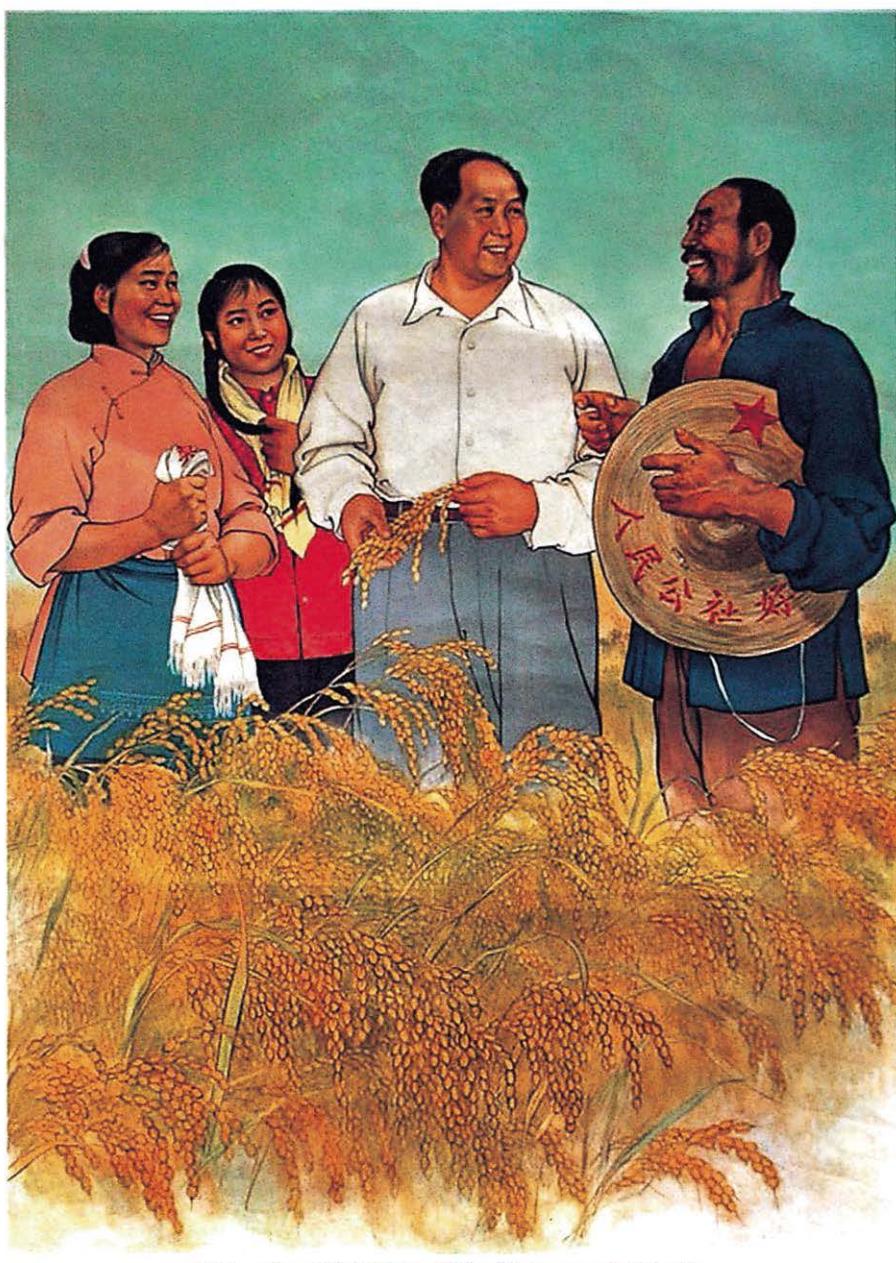


《毛主席来到我们家》(油画)



毛主席指出了光明大道

毛主席指出了光明大道（宣传画）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宣传画）

临时通信^[1]

(1958年4月23日)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

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有十几项主要指标就够了，更多不必要。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连夜赶工，有七天至十天时间也就够了。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底子，赶一下不甚难吧。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属〈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初步接触一下，每项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时间也就够了，秋冬再做较深入的研究，明春再做更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以政治带动业务，以虚带实。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以上各点如同意，请酌办。此件用电话通知。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

刘邓^[1]阅，罗光禄^[2]用电话通知杨尚昆^[3]，请尚昆即刻用电话通知各省市区。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罗光禄，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3]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周恩来等的信

(1958年4月25日)

恩来、陈云、德怀、富春、一波^[1]同志：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2]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廿五日或廿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3]，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4]，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5]，水利部李葆华^[6]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7]同志一道来。最好本（廿五日）日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2] 毛泽东这时在广州。

[3]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彭涛，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4] 刘澜波，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5] 刘景范，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

[6] 李葆华，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7] 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动身，以便开四天会，卅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

毛泽东

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二

刘邓^[1]即阅，用电话即发。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语

(1958年4月25日)

此件^[1]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的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五日

[1] 指水利电力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加快电力工业发展速度，十年赶上英国。（二）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全国电气化。（三）放手发动群众，全民办电。（四）水电和火电的比重。（五）电网建设。（六）设备供应问题。（七）投资问题。

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4月27日)

15年能否超过美国?

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仿电力部报告^[1]（还有冶金部）十天内写一个长报告是否可能？供党大会用，我也要用。

各部的措施和资金，总投资，怎么样？着重1958年。

各部思想整风怎么样？（以红带专）

大权统一于中央是否可行？

有多少人关于1953年的决定草案？有无可能，什么时候做出一个正式决定？

第三次党大会（1959），是否可行？

可否宣传集体决定了方针？似乎有两派，态度各一。

党、政、军、民、学五方面都如此。

[1] 指水利电力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对一封反映广东潮汕地区整风情况的来信的批语

(1958年4月27日)

陶铸^[1]同志：

此件所提问题^[2]，请派一个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彻查一次。宗派主义可能有的，但死者有无因而致死的特殊情况，也值妥善详查。去的人不要带任何预定估计，完全从寻找真理出发。情况弄清，群疑可释。闻你病了，要静心养病，好了再工作，不急忙。潮汕这件事件，可用几句话交付一位书记去办就行了。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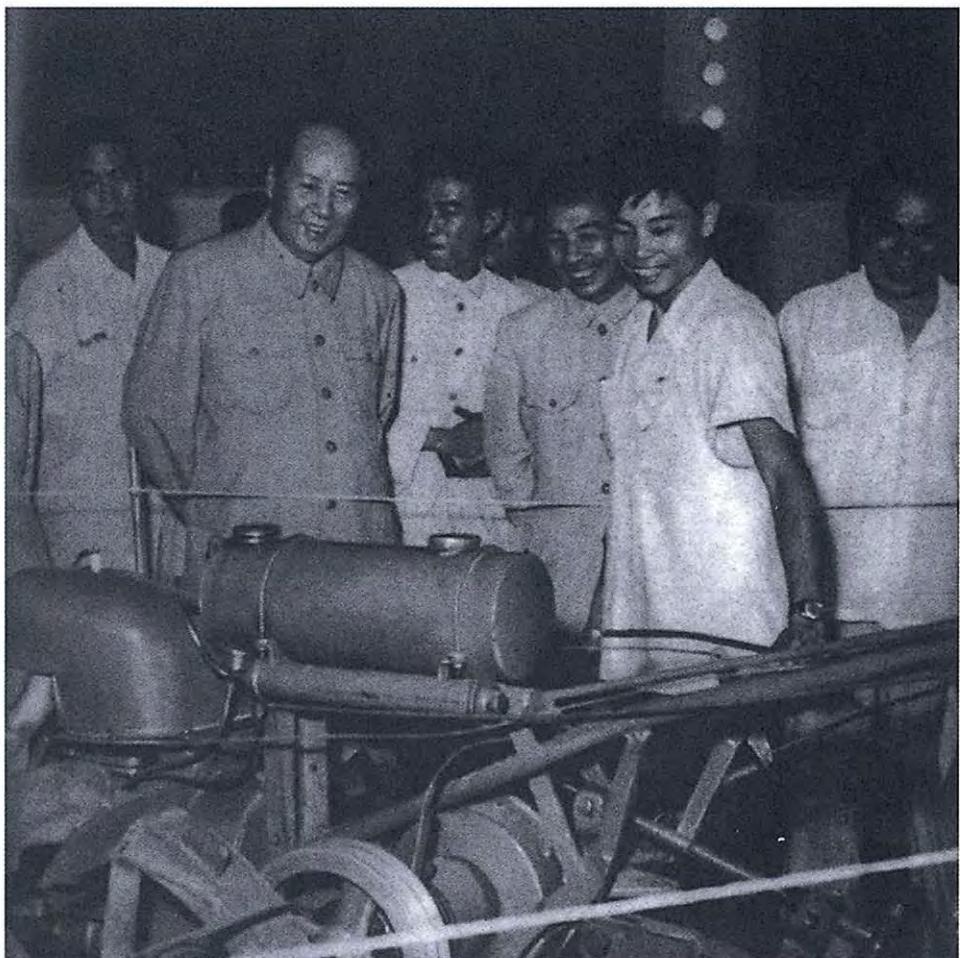
四月廿七日

[1] 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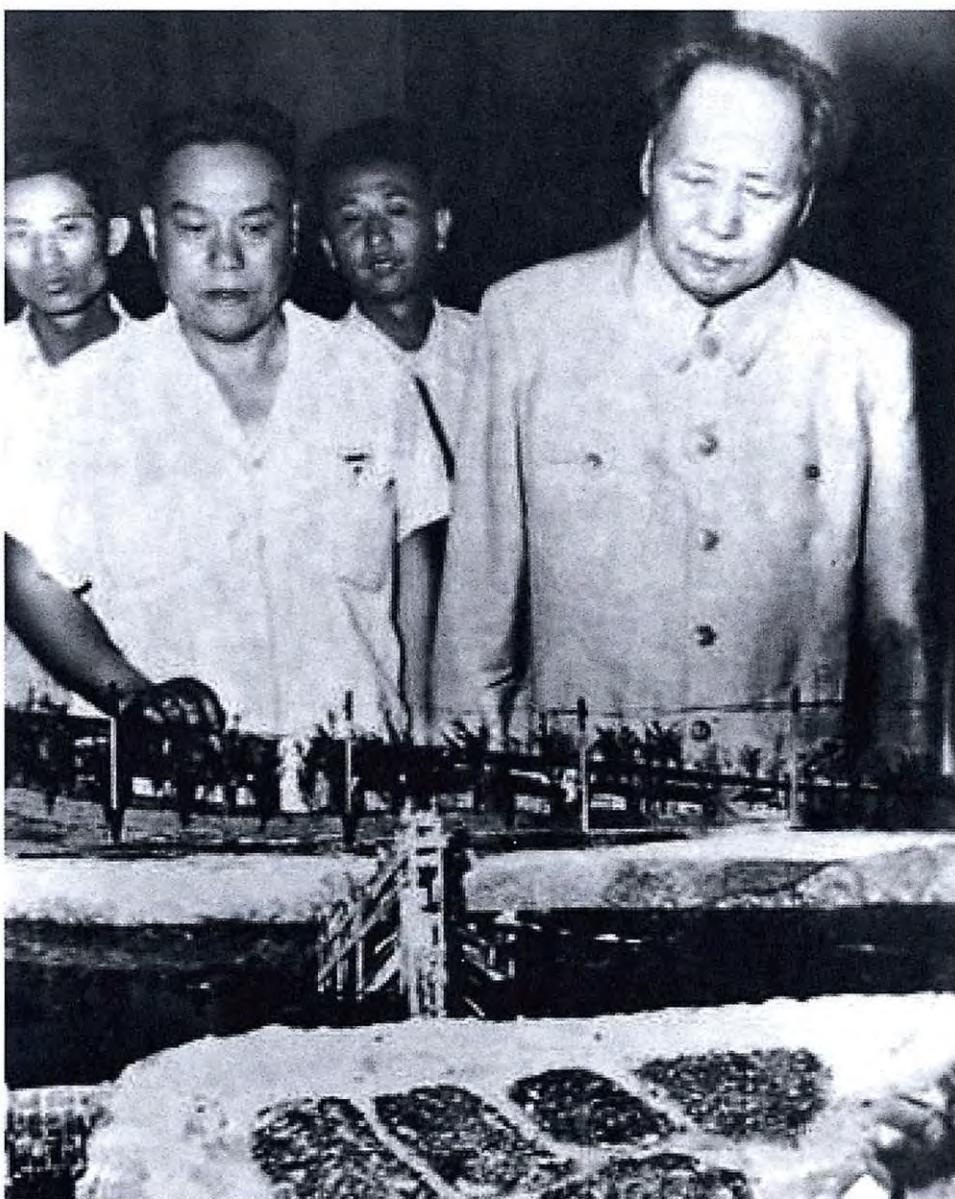
[2] 广东省潮安县有人于1958年4月1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反映潮安县委书记在整风反右斗争中自杀的情况。来信希望从速派人到潮汕检查该地区整风中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整风运动健康发展。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视察了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的耕耘、水利、水产和土壤肥料4个馆。图为毛泽东在观看新式渔网。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上参观万能拖拉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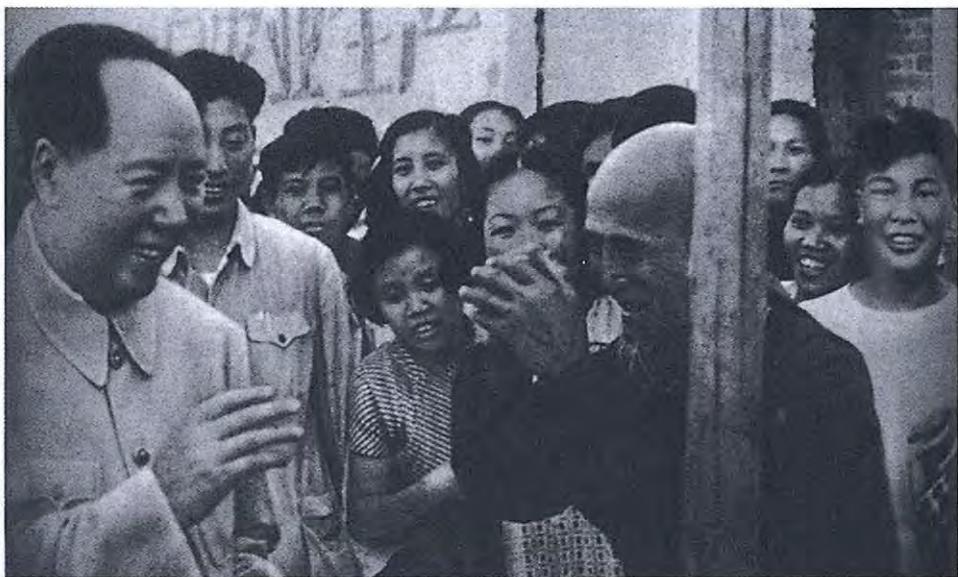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上观看淡水河涌养鱼系统模型。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州市市长朱光陪同下，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视察广州郊区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和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老社员在一起。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和青年在一起。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油画）



《毛主席视察农机馆》（油画）

给田家英^[1]的信

(1958年4月27日)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2]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3]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4]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撰有《汉书》。

[3] 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

(1958年4月)

当前有十七个工作：

(一) 十年农业规划：1. 水利规划：全国大兴修水利，甘肃省五八年一千一百多万亩，我省原定三十二万亩，有保守，现为九十二万亩（解放前全省为九十四万亩）认为差不多，现在看还落后，五八年要修九十四万到一百万亩，解决水利。2. 肥料：要做到上万斤肥，打千斤粮。3. 土壤改良：盐碱地的改良（如柴达木等地）。4. 选择优良种子。5. 改制、改良（农业技术改良，深耕细作）。6. 病虫害的消灭。7. 推广新式农具（包括农业机械在内）。8. 副业发展：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副业为了支援农业。9. 发展耕畜。10. 绿化。11. 除四害。12. 消灭严重疾病（传染病）。

这十二条中央、省、地、县、区、乡、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要做出规划。

(二) 另有十二个规划：1. 工业规划（主要地方工业）；2. 手工业；3. 农业；4. 副业；5. 森林；6. 渔业；7. 牧业；8. 交通；9. 商业；10. 文教；11. 科学；12. 卫生。中央、省、地、县都要做出规划。共为二十四条。

(三) 反浪费问题。要开展反浪费运动，国务院将发指示，贪污也要反，贪污不是大量，浪费是大量的，特别在建设方面浪费最

大。□□□同志讲：“浪费很大，各个厂（场）矿都有浪费，反掉浪费就能积累建设资金，他说柴达木建设（工薪）不降，不管有多少油，我主张不降。”增产是两个方面，即增产、节约。增产不节约就浪费了增产。

（四）正确解决农村积累和消费问题。在合作化开始一二年，为了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提出多扣少分。现在是要多积累合作社的资金，一个合作社的积累也是巩固社的，没有社的积累，社就无法巩固。可考虑50%作为社的积累，50%分配。合作化后，农村的情况是26%的农户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现在不强调生活水准，主要发展生产，现在不是要吃好、穿好，而是要真正苦干五年，艰苦奋斗，如果一人少用十元就六十亿，这对国家有好处，有了积累才能建设，有了建设才有希望。积累资金的办法：一种是国家的积累（包括企业事业公益金），二种是合作社积累（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三种是国家税收积累。

全国取得一条经验，一些建设国家投资就搞不好，凡是自己动手就能搞好建设，要大量地依靠农业人口的劳动力来建设水利。自己搞水利建设就搞好了，靠国家投资搞水利就没搞好。

农业合作社里，可以搞社员个人向合作社投资，做成合作社的积累，来建设农业，集中生产，但不能强迫社员投资。青海一九五八年搞一千万至三千万积累，有些人是有钱的。

（五）搞试验田问题。各个党委要搞试验田。黄安县搞得（土地不好）亩产八百斤，原因是人的作用，经营得好，黄安县提出千斤县，主席指出：中央到县都要搞试验田。牧业区搞牧业试验场，要抓紧搞先进，不搞落后。人的作用是主要的。要具体领导，什么工作都要具体领导，搞农业就要搞试验田。县、区、乡都搞，就能

搞几十个，几百个场子。工业也要搞试验，这方面的干部不要住在楼上办公，应到工厂（场）去办公。搞出经验来，办学校也搞试验，文教厅的干部可搬到学校办公。真正深入实际，这是领导的根本问题。

（六）红与专的问题。红与专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红专两个方面都搞（红是政治，专是专业技术），要批判空头政治家。批判不重视政治的技术家，只讲空话是不行的，有些人不红，就是白的。

（七）打掉“官”风（全国反官僚主义一般化）。要提倡干部有革命的干劲，干部要有朝气。现在的干部不论新老，应是越老，干劲就越大。

（八）二十四条规划，省、地委在六月报中央，县委的规划除报地委外，直报省委，乡区的规划好的典型与不好的典型选择报省委。

（九）除四害：毛主席指示，要求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它的意义不仅是除四害，它关系着人的健康问题。

（十）绿化问题。主席讲天天绿化，大规模地搞运动，如木林、经济林。有些省提倡上山，河北省飞地，农业社抽人上山搞生产，搞牧、农场。

（十一）认真地搞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取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王震参观日本的农业发现许多工业分散在农村，我们要学习日本这种方法。省、地、县都应搞工业。

（十二）开会方法，地区联系问题。开会的方法我们党内有许多好形式。主席讲大鸣大放大字报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几级干部会除讲工作外，还要讲理论、思想问题。这样就能提高干部的思想性、原则性。这次反右派是理论问题，又红又专。地方民族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不从理论讲，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浙江省

委书记□□同志的报告是标准，我们要看七八次，报告中第八、第九部分是敌我矛盾，政治、思想、革命问题。上海市委的报告提到了思想问题。

地区联系，更好地互相配合起来。中央提倡互相联系，过去大区撤销是必要的，大区撤销后密切了上下联系（省与中央），地区的联系是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省可以互相订合同。

中央初步考虑了七个点。1. 以上海为中心，华东五省。2. 武汉，两湖、河南、安徽。3. 广东，包括两广、湖南、福建、江西。4. 成都，包括西南三省、陕西。5. 西安，西北五省陕、甘、青（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河南。6. 天津，与河北合并，河北、内蒙、山西、河南。7. 沈阳为中心，东北三省。

各省开党代会，互派代表参加。

我们也要搞中心联系，农业社也要互相联系。

（十三）中央领导同志下乡问题，一年至少四个月下去。

（十四）中央同志下去，不迎接，不请客，不唱戏，以免耽误工作。

（十五）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报告谈得很明白，反右派以来有人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是敌我矛盾问题（二中全会决议指出）。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右派是代表敌人的），但是敌人一天天减少。右派十五万要超过，这些右派搞了，敌人的量减少了，但是矛盾仍然存在，敌我斗争还有。但是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人民内部矛盾占了主要的，敌我矛盾占2%，同时是分散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也可以采取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右派中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部分

是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上下之间，这是长期的大量的，因此，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或者看不到敌我矛盾。

(十六) 不断革命，(这是对工作而言) 工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今后是一个接一个运动，经过这次整风，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今后是解决技术问题，十五年后铁的产量要赶上英国。十五年，党的任务放在技术问题上，政治是统帅、灵魂，只有红不专，当空头政治家是不行的。工作要比赛，比先进与落后，全党要钻研技术，不钻研技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但要红就要学习政治，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提拔干部有的人说不要德，有才就行，德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没有是不行的。另外，要有技术。十五年后要消灭阶级，那时有没有革命，有没有斗争？还是有的。解决好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好就是敌我矛盾。苏联两个人造卫星的上天，证明科学技术超过了美国，因此，我们革命的干劲应赶上先进派。

(十七) 对立面的统一。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有好与坏，才能比较出先进与落后。报纸也要宣传好的、坏的，大量的和主要的。比较的方法实际是积极性的比较。不但经济工作上要比较，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要比较，主席讲一年比三次(党代表大会比，其他会议比)，办法是：推广好的，批评差的。



1958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界人士。

给纳赛尔的信

(1958年5月4日)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先生阁下：

我收到了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给我的信。我非常感谢你向我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那种深厚的友谊。

今天，我接见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1]中将和他所率领的访华军事代表团，我们谈得很融洽。^[2]

我高兴地看到贵我两国之间为了和平目的而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崇高友谊。我衷心地祝愿阁下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功，祝愿阁下健康和愉快。

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中国人民的事业现在有较大的发展。大约再有若干年我国的情况可能更好些。这些，穆罕默德中将会告诉你的。不管帝国主义者

[1]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当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陆军总参谋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

[2] 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5月4日电《毛主席朱副主席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电讯说：“毛泽东主席在今晚接见了以易卜拉欣中将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毛主席对贵宾们说，中国人民得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友谊，感到非常高兴。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我们是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相互关怀。”

怎样敌视我国，他们决不能阻止我国前进。正如同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他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是一样的。

向阁下致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于北京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批语

(1958年5月4日)

即送陈伯达^[1]同志：

此件^[2]写得很好，即刻照发。

毛泽东
五月四日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 指1958年5月4日报送毛泽东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清样。社论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写的。主题是批判不久前结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篇社论于1958年5月5日发表。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1958年5月)

— 在五月八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

题：破除迷信

怕教授

破除迷信，无法无天

破马克思^[2]

妄信〈自〉菲薄

天体、神仙、洋人、细菌^[3]

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

名家是最无学问的，落后的，很少创造的

敢想、敢讲、敢做

劳动人民中蕴藏了丰富的积累〈极〉性

工业没有什〔么〕了不得，迷信不对的

十五〔年〕赶上美国，可能的

龚定盦的诗^[4]

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不是狂妄的，实事求是的

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

世界第一大国，不是大国沙文主义——丑、低级趣味

甘罗、贾谊、刘项、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5]。

原因：方向对，而名人学问多保守落后了

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催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反对贾桂^[6]

庸信〈俗〉的谦虚，谦虚=实际

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上层建筑问题

不揭盖子，没有希望

盖子一揭，大有希望

插红旗、标新立异

学列宁^[7]

先进的东方，落后的欧洲

十五年后走向反面，尾巴一定挠〈翘〉起来，如果不注意的话。不要紧，再来一个否定，又生动活泼了。

你看：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

你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封〕建『筑』〔时〕代的『上』形而上学——现代的辩证法

客观存在的，不是吗？

设置对立面，十分必要

如何设置？客对〈观〉存在的

下回再讲，再见！Thank you very much. 十分『感』感谢！

二

破除迷信

现在迷信还多得很

怕教授，怕马克思

科学是高不可攀的

工业是很难的

军事也有神秘色彩

原子弹，尤其可以吓人

拿苏联吓人

我军有很多有头脑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应将一切东西拿过来，并且有所独创。

插红旗，辨风向，要用嗅觉嗅一嗅风向气味，不用被野心家吓住了，一万人〈年〉还会有野心家

风向能辨，才能插红旗

不止□□一处，可能还有些小□□

要有分析：□□同志与□□不一类的

要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军事史及其他

我所总结的只有很少一点，要把范围扩大，不要把自己束缚在我所讲的那一个小天地内

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

要学苏联，不是硬搬，而是有选择地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的

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

还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这是我们的敌人。

马克思、列宁都反对将他们的主义当教条

这次会议的意义

二 在五月十七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除四害的伟大意义

印度的响应

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的口号，也不提列宁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提我们现在的一些口号，反而快些好些，为什么？

我们的口号高明些，干部、技术、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

20年来，1800万吨钢，我们13年就可做到，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又紧张又松弛，又团结又斗争，一句话，我们发展了辩证法。

是不是，请大家想一想。

昨天有一位同志讲得不对：“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错的”，又跟不〈又〉不跟，要有独立思考，“跟”字不对。

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之前。高级干部，中央委员

十个指头

位置要摆得对

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一个的问题。资产阶级中

间派，其中中部分是一半对一半

往往到具体问题就忘记了，有搬石头打自己脚的危险，如高岗
一九五六年错误的性质

秘书室

训练部

准备对付大灾难

(1) 战争

(2) 分裂 谁不照顾大局谁将跌斤斗

资产阶级思想、习惯的长期性

可能还有30万右派（党内外）

可能有成百万有左倾观点的人

十几〔年〕内反复整风

反右是纠正过去倡右错误

百花、长期之必要

修正主义

社会主义阵营的密切合作

学习，辞去主席

四海之内皆兄弟

人人是外行，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东风、西风、南斯拉夫，亚非拉

原子大战，乐观主义

准备挨骂，党内分裂

请同志们准备下次大会

准备冬耕

三 在五月二十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

再讲破除迷信

一机部的材料^[8]

应加农、林、水、卫

再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

“老子第一”，看不起人，就会在大部〔分〕人中一扫而空，剩下的人也就难于作怪了。

再有再扫荡

这是一种低级趣味。

大国沙文主义，也就受到致命打击

讲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

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

内行少，外行多，例如一万行

略熟几门别行，是必要的，业余转化为专业，专业专〈转〉化为业余

右派提起这个问题，答复得不系统。

插红旗，辨风向

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或者其他插灰旗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9]，识的极端重要性

斯大林论预见：站在看台上，什么也不见

易曰：知几其神乎？可见不容易
不要太老实
庸俗的、低级趣味的谦虚，不插红旗，闭口道士，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
再讲灾难：
坏事是好事
红白喜事
大、中、小灾难
原子战，党分裂，大讲特讲，破除迷信。
讲死讲鬼，就能不怕死了，就不怕鬼了。
突变（生死都是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
突变优于量变
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质变、分裂是永远的、绝对的
应防止、也可能防止不利于人民的大分裂。
南斯拉夫、法斯特、陈独秀、张国焘、丁玲、李峰、李世农、沙文汉、古大存、陈再励、赛甫拉也夫、孙殿才、孙作宾、潘复生^[10]
分裂是好事
以后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如同细胞的不断死灭
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如同细胞的不断产生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情绪〈报〉局的发生、发展与消灭
有灭亡，才有生长，还归自然，再造生物
如孔子至今存在，岂非一大灾难？

鼓盆而歌^[1]是正确的

人死应开庆祝会

开庆祝会之所以不可避免，是为了团结起来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

遗传性与变异性，习惯性与创造性，旧条件反射与新条件反射，设置对立面（自然的，人为的）

怕死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

我也有这种反射

愁忧与快乐的对立统一

——后者的主导方面，乐观主义

一个人的思想也经常有建立与破坏

党的分裂的艺术领导，预见，搞得好一点。

治病救人

允许革命

在这次讲的意义：

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乐观主义

民歌

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

立即布置冬耕，1959年计划、预算

八月『五』上旬开省委书记会议^[12]

思、工、农、商、学、兵，两个个月内，都要抓一下，重点在工
(交通在内)

明年五月开三届大会，请作准备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

二

你们中有好些能想、能分析、能综合，聪明，有才分；我很高兴；前途是你们的；但不知道你们的品德如何？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

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

从思想上政治上随时解剖自己，学鲁迅；看鲁迅全集；看报看书。

学习：看书看报。

制式（式）教练要学，其余都可自学。华罗庚、齐奥尔科夫斯基^[13]。

破除迷信

人有各种迷信：狗肉，游水，学英文。

妄自菲薄，奴隶尾巴

自力更生，有些人不如合作社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

待马克思……

没有苏联就不能活（工业、军事），此论不通

苏联之前无苏联

马克思之前无马思想

必须认真学习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

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

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
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我虽不行，总算分析的一点我们的经验

你们应当超过我

教条诸公对我没有发言资格

有一个同志讲得对，我的东西，他说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
这就作了分析

教条说：“批判〈判〉的学习”，不对，因他们是教条，无资
格；又不平等待遇。

与教条平等，与外国平等。

真理：批判学习一切东西，党中央的，马列的，外国的，我
的，你们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

几个经济文件，看了没有？

军事工作的缺点

四 在五月二十三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真正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个制度必须认真执行。

例如：

(1)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是中央常委会通过的

(2) “促进委员会”，是在政治局扩大会（知识分子会议，1000
多人），在一篇演说中提出，而为全体所默认的，以鼓掌欢迎出之

(3) 四十条，是政治局扩大会（有全体省委书记参加）〔通

过的]

(4) 十大关系，是在上述同一会议上通过的

(5) 多快好省，是在中央常委会上通过的

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

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事实上推翻四十条，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序言（反右倾保守），而改为反左倾冒进，十人小组无疾而终，但八届二中全会并未做出明确决议（这个会议一切无决议），相反，有一个公认的七条意见，我又在结论中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部分的，总的方向是向前促进的，“飞鸟之影未尝动的”，鸟在前进。可是“反冒进”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

为什么？

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一股狂热的运动。

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

他们的错误与潘复生、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孙殿才、孙作宾、赛甫拉也夫等人有原则性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

党依靠这样的大会制定路线，监督中央。

[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

23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四次讲话，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这四次讲话的提纲。

[2] 毛泽东讲话中，在谈了“我们大多数同志有些怕资产阶级的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地不大怕了”以后接着说：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

[3] 毛泽东讲话中，在说到我们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时，谈了如何看待天体、神仙和洋人的问题，他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这是什么道理？我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下。我说，不，我们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也住在天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来人，他们不把我们当成神仙吗？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把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4] 龚定盦，即龚自珍，清代文学家、思想家。他的诗文提倡“更法”“改图”，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洋溢着爱国热情。《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

风雷》是其代表作。诗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5] 甘罗，十二岁做秦相吕不韦的家臣，吕企图攻赵，以扩大燕国献给他的河间封地，甘罗自请出使赵国，说服赵王割五城给秦，因功封为上卿。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文章，为郡人所称誉，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著有《鹏鸟赋》《过秦论》等。刘邦，指刘邦、项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秦亡后，发生楚汉相争，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韩信，刘邦建立汉朝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他年轻时“胯下之辱”的故事，流传很广。释迦，即释迦牟尼，相传他二十九岁时创立佛教。颜子，即颜渊，孔子的学生，孔子称赞他“不迁怒，不贰过”，早卒。红娘，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崔莺莺的婢女，聪明勇敢，热情地促成莺莺和张生的结合。荀灌娘，晋代人，自幼习武，其父任荆州都督时，被叛兵围于宛县（今河南南阳），荀灌娘年仅十三岁，请求突围求救兵，率勇士数十人于夜间突围而出，救兵到，敌军逃走。白袍小将，指罗成，传说他十四岁起兵参加隋末的农民起义，后降唐。在后来的戏剧中，扮演他的人都穿白色盔甲。岳飞，南宋抗金名将，后被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死时三十八岁。王勃，唐代文学家，少时即显露才华，著有《滕王阁序》。李贺，唐代诗人，早岁即工诗，死时二十七岁。李世民，十八岁率兵参加反隋战争，二十六岁继皇帝位，是为唐太宗。罗士信，唐初将领，十四岁时参加农民起义，勇猛善战，后降唐。杜伏威，唐初将领，隋末参加农民起义，后降唐。周瑜，三国时吴国名将，三十三岁时率吴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孔明，即诸葛亮，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二十六岁时，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孙策，孙权之兄，东汉末江东豪强，在江东地区创建孙氏政权，死时二十五岁。王弼，三国时魏国玄学家，少年即享高名，著有《周易注》《老子注》，卒年二十四岁。达尔文，英国博物学家，二十二岁时开始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后提出生物进化论。杨振宁、李政道，美籍华裔科学家，1957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郝建秀，全国劳动模范，1951年十六岁时创造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聂耳，中国著名作曲家，他二十三岁时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一九四九年

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定为代国歌。哪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形似少年，神通广大。兰陵王，指北齐兰陵王高长恭，传说他勇武而貌美，自以为不能使敌人畏惧，常戴面具出战。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了这些人的事例，他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6] 贾桂，戏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7] 毛泽东说：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该的。旗帜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帜，我们要拔掉它。

[8] 一机部的材料，指第一机械工业部编印的四十一个科学发明家小传。毛泽东讲话中说：这个材料可以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农林水部门、卫生部门、政法部门、文教部门都可以搞这样的材料。

[9]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的专书，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应尤重史识。毛泽东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10] 李峰，曾任中共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因被认定犯有“反党性质的错误”，受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二年处分，1980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平反。李世农，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62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并报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决定撤销关于开除李世农党籍的决议，恢复其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沙文汉，曾任中共

浙江省委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81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改正。古大存，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整风运动中因被认定犯有“进行地方主义活动错误”，受撤销职务处分，1982年1月中共广东省纪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平反。陈再励，曾任中共广西省委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改正。赛甫拉也夫，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因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受撤销职务处分，1979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殿才，曾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党籍，1963年9月中共甘肃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改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1982年8月中共甘肃省委进行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决定予以平反。孙作宾，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予以改正。潘复生，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被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撤销职务处分，1962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予以平反。

[11] 《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12]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13] 华罗庚，中国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齐奥尔科夫斯基，苏联科学家，最早提出火箭飞行理论和航天理论。这两人都是没有上过大学，自学成才的。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图为大会会场。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5月8日）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同志讲破除迷信吗？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

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

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

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敢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岁（一九〇三年）创造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

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工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

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竖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

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

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1958年5月，毛泽东和彭德怀、陈毅等交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给张闻天^[1]的信

(1958年5月8日)

洛甫同志：

三个报告^[2]都看了，第三个^[3]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

[1] 张闻天，又名洛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2] 指张闻天1958年4月中下旬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的三个报告，分别是：1958年4月13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等问题的报告，1958年4月25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外商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1958年4月26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

[3] 指张闻天1958年4月26日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报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号上午三时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国庆的电报^[1]

(1958年5月8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特别是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对于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最近一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互助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已经更加巩固和加深。

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的电报。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关于中共准备派代表团参加经互会 高级代表会议给赫鲁晓夫^[1]的电报

(1958年5月9日、13日)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安东诺夫^[2]同志转来您的关于召开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的来信。

中共中央高兴地接受你们的邀请，并且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5月20日开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一俟确定后，当另行通知。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为了参加5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我们决定派出由以下三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

团长：陈云同志（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团员：李富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

叶季壮同志（中共中央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

此外，随同代表团前去的，还有助理人员及翻译八人，谨此通知。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



195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天津参观进出口商品陈列馆。

对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的批语

(1958年5月12日)

即送邓小平同志：

看了一遍，可用。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2]，请酌定。有些地方尚待谈一谈。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1]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稿。报告汇报了1957年11月中国共产党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并就（一）关于国际形势，（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具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三）关于思想工作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等问题作了阐述。

[2] 毛泽东对邓小平报告稿的修改主要有：在报告稿讲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是我们的坚定的方针。但是，学习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学习

必须同独创相结合”一句中的“但是”之后，毛泽东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一句；在报告稿讲到“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事实上就是各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的思想工作的一个总纲领”一句中的“思想工作”之后，毛泽东加了“和政治工作”几个字；报告稿讲到“右翼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中间还有相当的影响”，毛泽东把这句中的“还有相当的影响”改为“还有很大的影响”；报告稿讲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最近所通过的纲领，不管这个纲领的支持者的主观愿望怎样，也不管这个纲领在表面上点綴了多少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它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恰好适合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毛泽东把这句中的“这个纲领的支持者”，改为“这个纲领的创造者”；在报告稿讲到“南共所以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正是他们在国内对资产阶级思想屈服，而在国外又对帝国主义压力屈服的结果”一句中的“南共”之后，毛泽东加了“领导集团”几个字；在报告稿讲到“不但一切愿意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人们无法同情南共领导集团的分裂活动，而且一切愿意和平事业和民族独立运动胜利的人们也无法同情他们”一句中的“而且一切”之后，毛泽东加了“真正”二字。

对罗瑞卿^[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 发言稿的批语

(1958年5月12日)

退罗瑞卿同志。此件^[2]已阅，可用。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8年5月10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题目是《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更好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

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 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5月13日、24日)

—

即送胡乔木^[2]同志：

有些修改，你看何如〈如何〉？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陈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

第一章则无一句多余的话，觉得很好。

[1] 毛泽东对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稿先后修改了两次：一次是1958年5月13日，一次是5月24日。这两次修改比较完整的有六段，见本篇六至十一，其中八、十是5月13日修改的，六、七、九、十一是5月24日修改的。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二

退胡乔木同志：

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我又作了一些修改，你看如何？并请送少奇同志酌定。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上午六时

三

成语是削足适履，不是适履。履是草鞋，履是一般的鞋子。^[1]

四

是否确是一月，请再一查？^[2]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5月13日修改刘少奇报告稿时，对文中一个错字的批语。刘少奇原报告稿中说：“对于不平衡的出现惊慌失措，因而要求先进向落后看齐，要求削足适履、因噎废食的平衡，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将这句中的“削足适履”的“履”改为“屨”，并写了这个批语。

[2] 这是毛泽东1958年5月24日修改刘少奇报告稿时在文内写的一个批语。刘少奇报告稿中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在这句中的“一月”处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胡乔木查后，在毛泽东批语旁边写道：“已查，不错。”

五

“从来”不对，错误路线统治时期能够如此吗？^[1]

六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英、法三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了，虽然它们现在仍然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反共、反人民、反民族独立运动为目标而互相联系着。

七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5月24日修改刘少奇报告稿时在文内写的一个批语。刘少奇报告稿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致在中途发生停顿，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致因为革命的间断而冷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不致因为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而生长起骄气和暮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把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中的“从来”二字改为“长期以来”，并写了这个批语。

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八

曾经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表示怀疑的同志，许多人已经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训；有些人却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同你们算账。”让他们等着算账吧，他们总是要输的。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九

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十

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毒草既然是客观存在，不让他们以本来面目生长，它们也会以各种变形面目生长，暗里地毒害人群。不如公开对它们说：毒草是不合法的，长出来是要锄掉的，但是我们并不禁止你们长出来，有谁愿意出来斗争就出来吧。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未被锄的仍然起来斗争，并不因为前车之覆，后车就警戒了。凡未被锄的，今后一有机会，必然又会起来，那时又得再锄。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的，不能算数的。

十一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严肃的原则精神同生动的独创精神相结合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对陈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 发言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5月15日)

—

陈云同志：

此件可以用了，并且可以在明天讲。我加了几句^[2]，你看如何？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晚十时

—

我们必须依靠各级党委和依靠群众，必须向中央和各级党委经常反映财经情况，必须纠正那种平时不反映或很少反映财经情况，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5月1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讲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速度问题。

[2] 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次下倾盆大雨的错误办法。无论是工业方面、农业方面、财贸方面、或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又应经常注意检查，并且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大鸣大放的办法，敲起警钟，批判脱离群众和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

在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上的批语

(1958年5月15日)

小平^[1]同志：

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2]，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请你做两件事：（一）找苏使馆负责人谈一下，表示热忱祝贺。或者在大会^[3]后由我找他谈一次。这是一件大事，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二）将苏件立即印发大会代表阅读。如有时间在小组会上谈论一次，并可带回去。奇文互相赏，迅即印发。此信附印在苏件上，放在前面。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8年5月9日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信，主要就苏南两党关系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提出看法，认为南共七大的纲领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相对抗的，大多数南共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苏联、苏共和各兄弟共产党进行了不友好的和敌意的批评。

[3] 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四海之内皆兄弟^[1]

(1958年5月16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1958年5月14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报告说，我部担负的是一项新的建设任务，很多技术问题我们不懂或者不完全懂，因而苏联专家就成了我们当前的重要技术力量。苏联专家受苏联党和政府的委托，积极热情地来帮助我们建设，他们把能够帮助我国建设最新技术、最高标准、规模大的、内容齐全的厂矿，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时期，由于我们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不明确，在共同设计的时候，有时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彼此之间有些争论，因此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形成了两股劲。直到成都会议后，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总路线，才有所转变。这个转变经过一个过程。开始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教条主义态度，不敢想，不敢问，认为自己不懂，只能照抄照搬。成都会议之后，进一步总结了对苏联专家工作的经验，发现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也必须政治挂帅，强调务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近一个多月来，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反复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总路线，介绍整风运动和其他有关的中国实际情况，使苏联专家自觉地掌握中国的方针路线，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效果很好。现在苏联专家能够和中国同志一起主动地讨论怎样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怎样贯彻多快好省路线，许多设计修改了，想了很多窍门，制出新的更合理的设计。这就使过去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正如一位苏联专家所说“这是中苏友谊的结晶”。

—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1]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2]！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

小平同志：

此件请即办。批语印在文前。

毛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对滕代远^[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 发言稿的批语

(1958年5月16日)

即送滕代远同志：

此件^[2]写得很好，看了很高兴。立即就向大会去讲。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1] 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

[2] 指滕代远1958年5月15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怎样把铁路修得快些、办得好些？》。发言稿内容包括：（一）必须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全国工农业大发展，迫切需要铁路建设大发展；（三）全党全民办铁路，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是完全可能的。

祝贺挪威王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5月16日)

挪威王国国王奥拉夫五世陛下：

当挪威王国国庆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和挪威人民致热烈的祝贺。祝中、挪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祝陛下身体健康，挪威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北京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5月17日）

一 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它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哪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哪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哪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副武装的，是全副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哪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

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

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 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哪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

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作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

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间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

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子，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种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

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早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 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得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嘛！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嘛！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

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得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

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采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起可能再要七年。王口口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淘大粪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

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哪个好，真理在哪，就跟，不要跟某某人。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子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

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 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得不好，要分裂。我们搞得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感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得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弹，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

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饶漱石、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

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

(1958年5月18日、20日)

—

此件^[2]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1958年5月3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1954至1955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1956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1957年2月试制成功一台30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5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150台，一九五九年生产1500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25马力拖拉机。

受刑戮〈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三〈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二

小平^[1]同志：

此件请即照发大会。

毛

五月十八日上午六时

三

送小平印发。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有用，印发各同志阅。

昨件“戮”误为“戮”；“三刖其足”，“三”应为“两”。

毛泽东

五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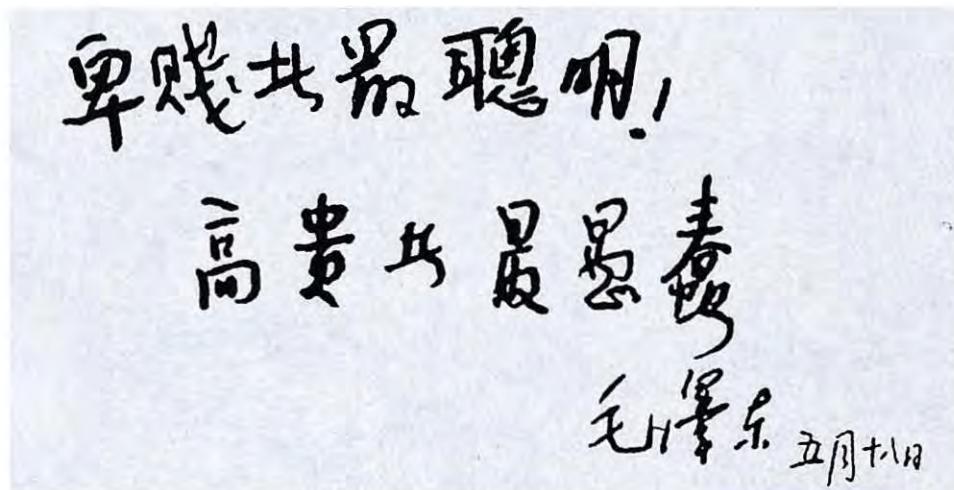
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 试制拖拉机成功题词^[1]

(1958年5月18日)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拖拉机成功的题词。

[1]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来到丹东五一八拖拉机厂参观，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十二个大字，送给全厂职工。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 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5月18日)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小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话，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三是讲灾难。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

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没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恩赐观点，阶级斗争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械、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闭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

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口口、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库西宁的谈话、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没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没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争，要用长期的斗争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场革命，没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没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

力来整风，我有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论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没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

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对《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1]的批语

(1958年5月19日)

—

小平^[2]同志：

此件请印发大会各同志。

毛

五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

见今年第63期《宣教动态》。^[3]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63期刊载的《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文中说，4月25日下午宋任穷约集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京的苏联专家座谈，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当前整风和大跃进情况，以及多快好省的建设路线、工农业并举、大中小结合的建设方针等，并列举了苏联专家协助我国贯彻多快好省路线的大量事例。苏联专家沃尔比约夫除在会上讲话外，会后向翻译说了一些意见。沃尔比约夫说：现在中国党提出的

“多快好省”的建国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又多又省”这两点，必须结合当地情况。比如在苏联钢材很便宜，而木材很贵，但在中国却相反，木材很便宜，而钢材很贵。假如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而提建设时都要用钢材，不用其他代用品，势必造成多花钱，就不合乎“多”“省”的精神。又如在苏联提倡搞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因为苏联人少，劳动力不够。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人多，现时如果也提倡像苏联一样搞机械化、自动化，就不合乎中国国情。中国党现在提出多搞中型、小型厂矿企业的方针，是合乎中国情况的。这样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在这以前，沃尔比约夫也说过，在他与中国同志的接触中，常发现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专家只能起顾问和指导作用，许多问题还得中国同志自己来解决，因为他们了解情况最清楚，同时也便于发挥本身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份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印发。

-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 [3]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后写的说明。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8年5月20日）

主席团决定我讲一次话，采取成都会议的方法，总共讲三次。已经讲了两次，今天是第三次。

（一）再讲破除迷信。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

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得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得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且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 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

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打打，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做，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几，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

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 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裂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七个，七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突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

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做出决议，做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很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

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

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得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地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由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

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防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得好，必须除杂草。在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了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得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提到第一

位也好，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说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用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用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关于印发四百个科技创造发明家小传 资料（初稿）的批语

（1958年5月21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付印，于明日务必发明〈给〉各同志。

毛泽东

五月廿一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5月编印的《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资料“编者的话”中说：为了初步地具体了解中外古今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情况，我们编出了这本资料（初稿）。在这400人中，中国的有70人，外国的有330人，其中我们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占总数的58%。这个材料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图书馆的几位工作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搜集和编印的，由于时间仓促，在人物的选择、材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上，都会有很多缺陷，但我们相信它对于破除科学界的迷信，将会有所帮助。《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作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1958年5月21日，毛泽东观看国产第一辆小轿车。



1958年5月，毛泽东在试坐国产第一辆小轿车。

给张治中^[1]的信

(1958年5月22日)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2]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1] 张治中，字文白，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指张治中1958年5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在民革整风期间写的《自我检查》的情况，并将《自我检查》和他1949年冬写的《六十岁总结》送请毛泽东审阅。

文伯先生：

五月三日函信已收。前书已到，直即今天。打用一着，一定马上着手完成。了。少威，经猪，感而忘血。我的立典，竟在你的身上。各方面。今后而。

我们努力而为，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着这样大的困难，这样心情，真是理解的。竟晦，大约有数月的。这次。连绵数天，为少威。祝安好！向你和你的夫人和孩子，你们，多谢。

小林，②這一年
而。我待期，

毛泽东致张治中的手稿。

关于印发沈鸿^[1]给毛泽东信的批语

(1958年5月22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1] 沈鸿，当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沈鸿1958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对毛泽东倡议编印科学技术创造发明者小传的感想，并建议我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这封信作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8年5月23日）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

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才，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得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

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作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蘋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 写的题下说明^[1]

(1958年5月)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修正草案，作了第二次修正，并加以原则的批准，准备提请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又提请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5月23日，八大二次会议对纲要作了第二次修正，并决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号召全党同志和五亿农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对《红旗》杂志发刊词的批语

(1958年5月24日)

此件^[1]写得很好，可用。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1] 指《红旗》杂志发刊词，载于1958年6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

为《红旗》杂志题名^[1]的批语

(1958年5月24日)

—

伯达^[2]同志：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

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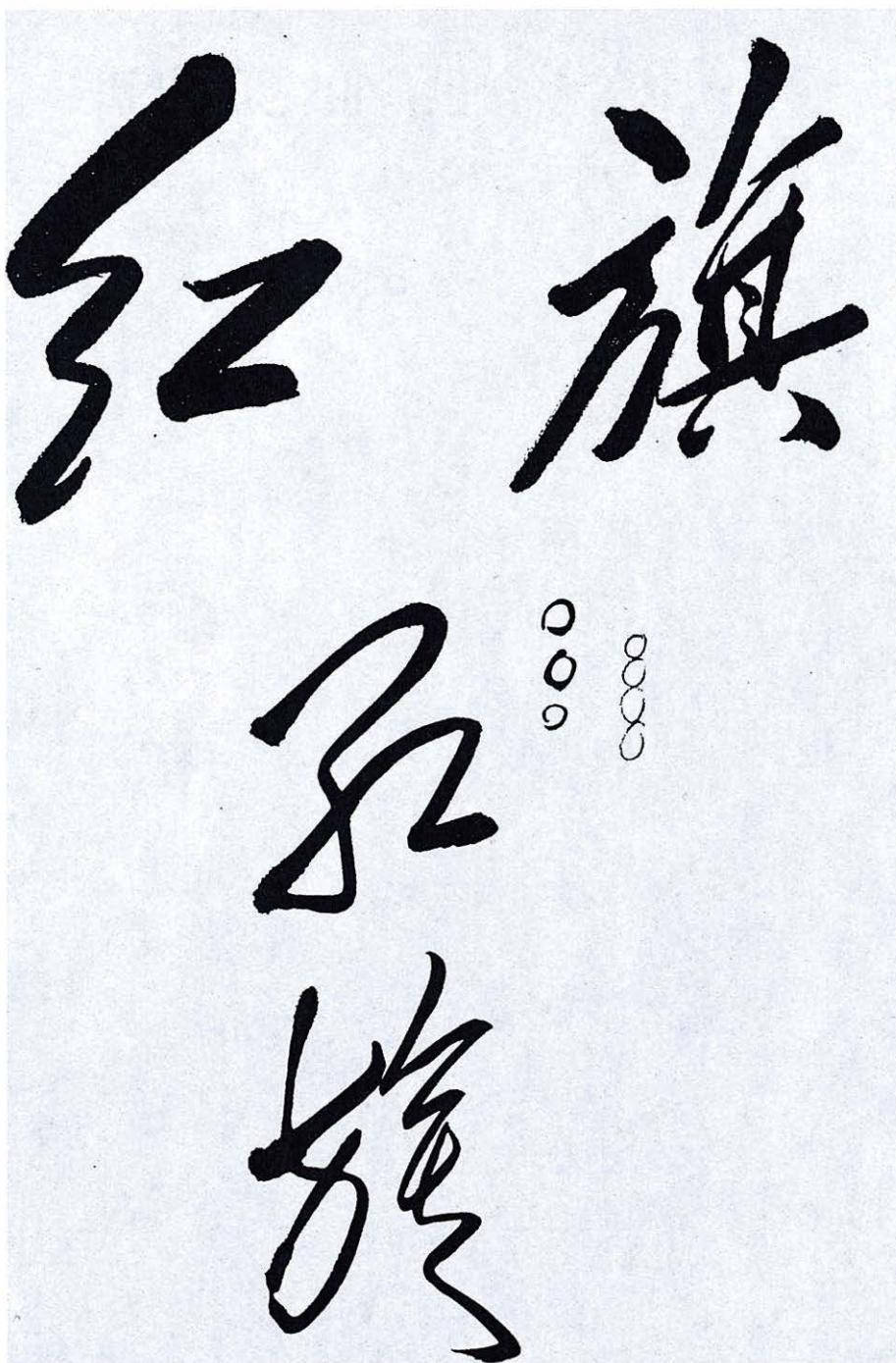
[1] 本篇收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名时写的三个批语，其中一写在单另的一张白纸上，二、三分别写在他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的旁边。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和即将出版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三

比较从容。

为《红旗》杂志题名的批语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的刊名。

关于注意粮食供应问题的批语

(1958年5月24日、27日)

—

震林^[1]同志：

此件^[2]请你一阅。

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

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3]。因我忙，无暇找他们谈。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即送小平^[4]同志，即刻印发到会^[5]各同志。

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二时

-
- [1]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 [2] 指中央警卫团干部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
 - [3]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一个座谈会，并于1958年5月26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本篇二就是毛泽东在谭震林的报告上写的批语。谭震林的报告中说：已遵示，找了警卫队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武汉粮食会议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北京又综合各地情况发了一次通报。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子100斤，饲料200斤，余粮100斤。这个要求如果无特大灾害出现，连续三个跃进年就可能达到。如果打算有二年发生大灾害，则需五年达到这个要求。
 - [4]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 [5] 指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

对赵尔陆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建议的批语

(1958年5月25日)

小平同志：

此件^⑩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毛泽东

五月廿五日

[1] 指赵尔陆1958年5月17日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问题给毛泽东的建议信。信中说：如何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作用，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自执行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和实行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新体制之后，地方办工业、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如何使各省市工业的发展更能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避免和减少盲目性，更好地适应多快好省的总要求，单靠省或中央各部是不容易处理好的，而目前以各经济协作区的协作会议的形式来担负这一任务也比较困难。因此，我有一个想法，是否可以考虑在各区成立党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或别的组织形式，以统一和加强对各区的经济领导，综合规划各区的建设远景，及重大方针政策的掌握和生产的组织、地区的全面协作平衡等。在政权方面可不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但要设置一个强的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是中央局的办事机关。不论从目前的工作需要，还是将来的发展趋势看，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似乎有必要。因为主席号召大家要敢想敢说，我就把最近以来经常想、而又没有想好的意见大胆地向主席讲出来，供参考。

赵尔陆^[1]同志对区域协作问题，建议设立六个中央局及六个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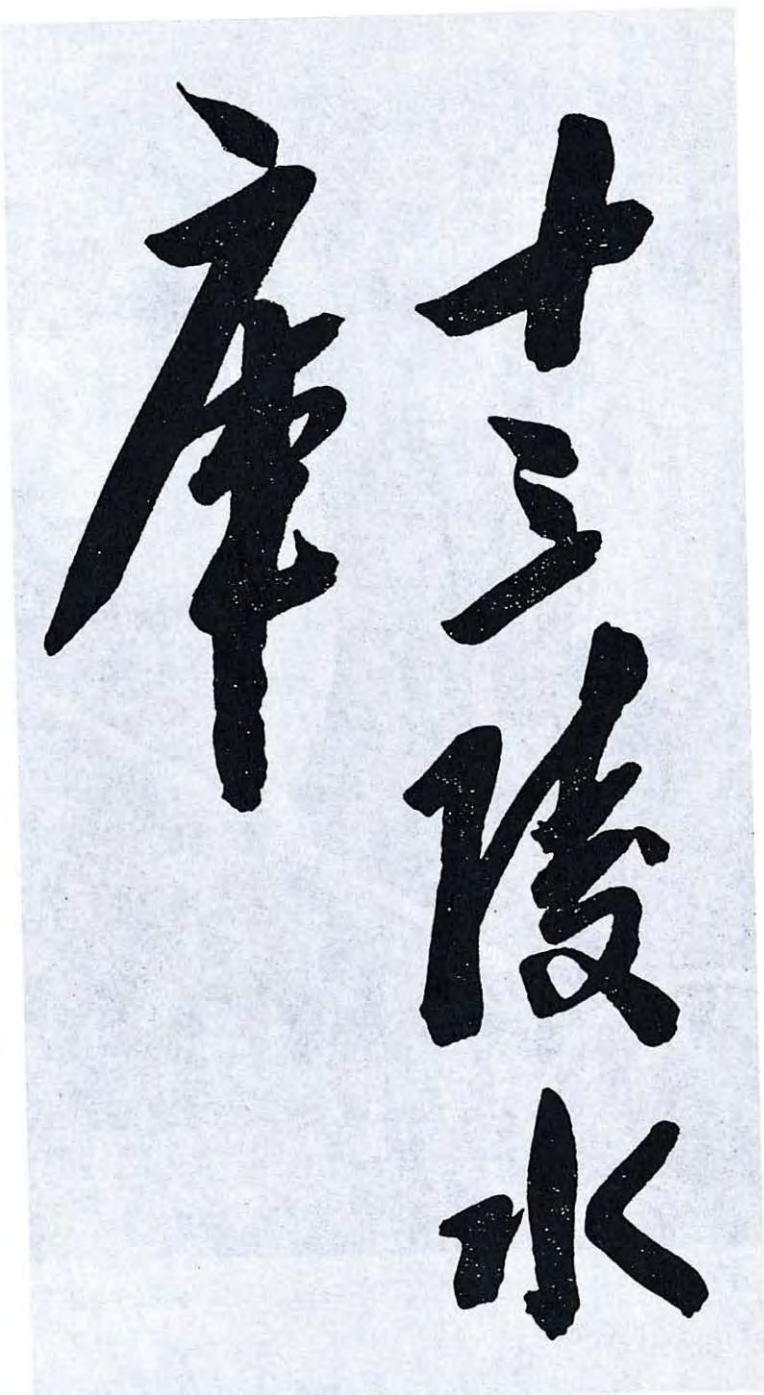
[1] 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为十三陵水库题名^[1]

(1958年5月25日)

十三陵水库

[1] 十三陵水库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境内，在十三陵盆地的东南，距北京城区40公里。十三陵水库是1958年初开始修建的，当年6月30日胜利建成。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代表十万劳动者，敬请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题词，毛泽东欣然写下了“十三陵水库”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毛泽东为十三陵水库题写的库名。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带领出席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中央委员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光辉的榜样》(中国画)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视察十三陵水库。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向工地上的劳动者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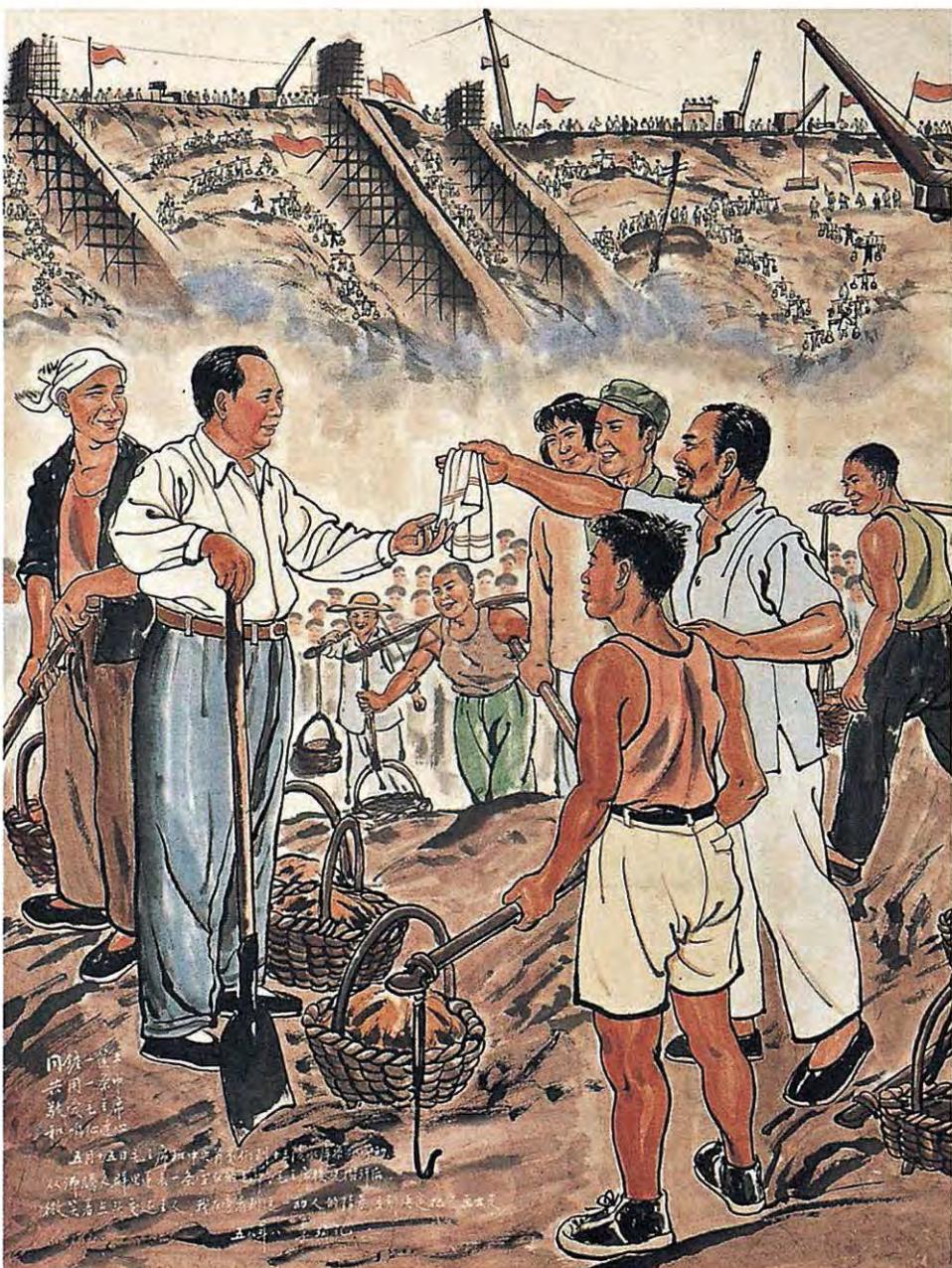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修建纪念明信片上的签名。



《毛主席和我们一起劳动》(油画)



《毛主席与我们一起劳动》(油画)



《毛主席在十三陵工地》(中国画)

对刘少奇关于改进劳动工资、 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 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5月)

退少奇同志处理。

此件^{[[1]]}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

[1] 指刘少奇1958年5月25日给毛泽东、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报告说，关于改进我国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制度问题，中央已决定在县以下的工业企业中不再实行老办法，由各省和自治区另拟新办法。至于县以上的工业企业，我认为应在现有的企业和现有的工人中暂时实行原来的办法，基本上不加变动；但在新建的企业和新招收的工人中可另拟新办法实行。此外，我曾同恩来、定一及个别省市委的同志谈过关于教育、劳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工矿、机关劳动制度。另一个是除注意组织城市职工和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运动外，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力也组织起来。这两个问题，已在个别单位进行试验。

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 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 新高潮》后写的信

(1958年5月26日)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上午七时

关于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座谈会 给邓小平^[1]的信

(1958年5月29日)

小平同志：

本日有事商量，请通知柯、陶、王、张、林、欧、李^[2]七位协作区主任委员留一天，我想有些事和他们谈一谈，或者由常委召开会议，或者由我、你、彭真^[3]主持。明天酌定。昨天会议上气氛不大好，值得座谈一会儿。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也以留一天为宜，待座谈会本日开后，明日再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为如何？如以为可，请即执行。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上午五时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柯，指柯庆施，当时任华东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陶，指陶铸，当时任华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王，指王任重，当时任华中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张，指张德生，当时任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林，指林铁，当时任华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欧，指欧阳钦，当时任东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李，指李井泉，当时任西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

(1958年5月)

中国人民得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友谊，感到非常高兴。

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我们是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相互关怀。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纠正《红旗》杂志第一期中 错别字的批语

(1958年6月4日)

陈伯达^[1]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2]。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3]。

毛泽东

六月四日

[1]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2] 《红旗》杂志第一期刊载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后面这一句中，多排了一个“的”字。

[3] 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刊登了一则“更正”，对《红旗》第一期和第二期上的一些错讹之处分别进行了订正。其中包括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多排的一个“的”字。

为购买《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 给林克的批语^[1]

(1958年6月4日)

林克：

请将《第六辑》买一部给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1958年6月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第211期刊载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目录的旁边。增刊第六辑载有：徐嘉瑞的《九歌的组织》、陈朝璧的《关于“招魂”的作者和内容的商榷》、金德厚的《关于“‘离骚’中窜入的文字”》、任二北的《古歌辞中的和声与叠句》、郑孟彤的《汉赋的思想与艺术》、邓潭洲的《论韩愈的诗》、陈友琴的《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刘开扬的《论孟郊》、陈贻焮的《王维生平事迹初探》、马克垚的《关于李白思想的一些问题》、麦朝枢的《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樊兴的《“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胡国瑞的《论温庭筠词的艺术风格》、吴则虞的《辛弃疾词论略》、浦江清遗著《论小说》、戚法仁的《“汉宫秋”杂剧主题思想的探索》、陈中凡的《高明“琵琶记”评价的商榷》、聂石樵的《略谈“桃花扇”》、章沛的《“聊斋志异”个别作品中的民族思想》、张鸿勋的《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在方强^[1]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 意见上的批语

(1958年6月5日)

—

此件^[2]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3]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宣于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

[1] 方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

[2] 指方强1958年5月29日关于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给会议主席团的信。信中说：“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会议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巾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毛泽东

六月五日

二

不存在问题么？^[1]

三

要学外国的技术。^[2]

[1] 方强在意见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在“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几句下面划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2] 方强在意见信中列举军队建设中的教条主义的表现时说：“我们的部队和学校，不主要去学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不以今天活生生的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选集》为指南，而着重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以外国的东西为指南。”毛泽东在“而着重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以外国的东西为指南”一句下面划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四

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方』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1]

五

彭、黄阅后退小平：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六月五日

[1] 这个批语是针对方强信中批评军队中的教条主义表现一段话而写的，这段话是：“我们军队曾有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关于做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布局 和开好军委会议问题给邓小平^[1]的信

(1958年6月7日)

小平同志：

六、七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德怀^[2]同志将军事会议^[3]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毛泽东

六月七日上午四时

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3] 指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 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

(1958年6月7日)

—

刘、林彪、小平、周、朱、陈、彭真、陈毅^[1]阅，退彭德怀同志：
可以照所拟办理^[2]。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
共同。

毛泽东

六月七日

[1] 刘，指刘少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2] 彭德怀1958年6月5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关于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在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

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在谈话部分，毛批有意见^[1]，请彭注意。

—

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1] 指毛泽东在彭德怀1958年6月4日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中修改的一段文字，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在王鹤寿关于发展 冶金工业报告^[1]上的批语

(1958年6月7日)

小平^[2]阅。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

毛
六月七日

[1]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1958年6月6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9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 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 批语和修改

(1958年6月8日)

—

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交小平办。
此件加了职权划分^[1]，小组成员也有些增加^[2]，请你们阅后，退
小平提付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发出。有不同意见，请即告我。

毛泽东

六月八日上午三时

[1] 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中增写的关于职权划分的一段文字，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毛泽东在中央财经小组名单中，增加了副组长谭震林，组员王鹤寿、赵尔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二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批语^[1]

(1958年6月12日)

陈伯达^[2]同志阅。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评（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上，该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在“东风强来西风弱，真正英雄看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两篇文章：《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和《孙守纲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一文，介绍了只上过两年大学的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针对蛋制品中的“沙门氏菌”问题，从学习入手，利用空闲时间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阅读，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322次试验，创造出了“真空充氮处理法”，消灭蛋品中的“沙门氏菌”，解决了国际市场上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孙守纲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一文，介绍了天津市供电局修理试验所21岁的化验工孙守纲不畏困难，在4年多的时间里跑图书馆、查技术资料，经过多次试验，制成质量超过英国和日本的优质“矽胶”的事迹。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关于中央各部委干部参加劳动的批语^[1]

(1958年6月15日)

小平^[2]同志：

这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居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农垦部部长王震1958年6月13日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农垦部三分之二的干部已于五月底分赴密山、佳木斯等垦区参加劳动，一律下场四个月，进行现场整风，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和帮助农场工作。我个人拟待十七日处理完下放任务后，也去密山、佳木斯垦区。”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人民不要战争但要有战争准备^[1]

(1958年6月16日)

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有信心怎么行。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如亲美、崇美、恐美之类。

我们六亿人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是否已免于恐怖？我们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和平好，战争总要死人的。人总希望死得慢一点，但人老了终归要死，死是正常的，不死是反常的。

要打原子战争，那就打嘛，不是我们要打。打起来，即使人都死光了，五十万年以后又恢复原状，人还是会生长出来的。总之，要谈一谈形势，要谈彻底一些。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无机物会变有机物，五十万年算不了什么。我有一次说，原子战争可能打掉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但还有三分之一，这还不乐观吗？即使一个人也没有了，海里总还有单细胞的生物。本来地球上没有什么生命的，后来才有的。话又说回来，就是要你们辩论一下，不要悲观，天不怕，地不怕，无非是杀头而已。

中心问题，是否双方都怕？应该是哪个怕哪个多一些，程度上应有多少之别。一九四六年，我讲过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他们的强大不算数，统统会灭亡的。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有时天上有

[1] 这是毛泽东和部分驻外使节谈话的一部分。

乌云，如蒋介石打张家口时将来的形势怎么样啊？即使城市统统丢掉了，我相信还是要胜利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以美国占领鸭绿江这个最坏的估计来考虑问题的。你占领了鸭绿江，我就退回到辽宁，但是我取得了出兵的资格，我打算分为六支兵力插进朝鲜去，反攻敌人。

双方都怕，敌人怕我们多一些，他们比我们弱一点。这是我们的估计，根据这一估计来决定我们的政策。但是有时会有变化的。总的来看，说我们怕他们多一些，这不合乎事实。

戴高乐^[1]登台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是他要整共产党，好事是比过去的总理要硬一些。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了一个“软体动物”。戴高乐是一条“墨鱼”，比“软体动物”多一条骨头。

请你们把谁怕谁多一点当作一个问题来辩论一下。每当发生了问题，好像上面的估计就不灵了。

莫斯科宣言曾谈到战争问题，因为有战争疯子。就全世界的人民来说，要有两条腿走路。人民不要战争，可是要有战争的准备。我们准备五年搞出原子弹，十年搞出氢弹，苏联帮助我们技术，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主要靠我们自己动脑筋来搞。

讲和平为什么又讲战争的危险呢？这不是不统一吗？是统一的。但不能用诡辩的方法来说统一，要用论据来说统一。过去少奇同志在延安时谈到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我是赞成的。高^[2]借此来

[1] 戴高乐，1958年6月出任法国总理，同年12月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2] 高，指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攻击少奇同志，实际上是冤枉刘少奇。

一条腿——和平过渡，我们又加上了一条腿——战争过渡，两条腿才好走路。

世界大战是从垄断资本来的。他们要战争，就可能出战争狂人。希特勒、蒋介石、日本法西斯都是战争狂人，但他们都被打败了。原子战争打起来，天地会无光的，但五十万年以后，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尼赫鲁^[1]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人都死完了，也找不到人来主和了。我说能找到人，他不相信我这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打出了一些民主主义国家，如印度等。要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完蛋了。讲到这里，我想到《新民主主义论》中没有说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如印度、印尼、叙利亚、埃及等国，这些国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看起来，没有讲到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道理就是一点点，一讲就讲长了。你们留下几天议一议。打原子战争，美帝国主义还是一个纸老虎。过去我们延安只有七千多人，蒋介石占有上海等大城市，他们有坦克、飞机、大炮，我们没有，究竟是谁胜利呢？抗美援朝时，我们每一个军才有五十门炮，美国一个师就有八百门炮，我们把他们打得一塌糊涂。打原子战争，七打八打，他们灭亡，我们胜利。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不会打的，因为美帝国主义满身是疮，漏子很多，人民反对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不巩固。大鱼吃小鱼，是一个基本规律。他们都是“鱼类”，都是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大鱼吃小鱼。北大西洋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公约组织就是大鱼吃小鱼。

思想要搞通，想通。对兄弟国家要适当地影响他们。有些国家对骂帝国主义就有些怕，还不如蒋介石，他竟敢打美国大使馆，当然目的是为了搜文件，结果他竟搜去了。美帝国主义搞中间地带好些，还是我们搞中间地带好些？中间地带又那么大。

我们的政策，分为两部分，一是和平，二是战争。所谓和平，因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目前，中间地带它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还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1958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北京西郊。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

(1958年6月17日)

—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2]，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

[2] 参见《孟子·离娄上》。

—

彭、黄：

此件请即印发。

毛

第一页，请克诚抄正看过，再付印。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先念^[1] 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批语

(1958年6月18日)

—

此件^[2]很好，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

克诚^[3]：

此件请即印发。

毛

[1] 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58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报告。报告对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趋势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作了汇报，对如何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提出了意见。

[3] 克诚，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照原样印，我作的记号不要印上去。我改了一个字，增了一个字^⑩，要印上去。

[1] 毛泽东在批发李先念的报告时，将报告谈到“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一句中的“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在报告谈到“第二个五年财政支出的分配，应当首先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一句中的“生产”“建设”之间加了一个“和”字。

给高智^[1]的信

(1958年6月19日)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4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2]，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1]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马特在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和周谷城在1958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一文。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58年6月21日)

这次讲话不是指示。先讲几点意见供参考，是否对，供讨论。只当做问题提出，几年来习惯于这种形式，你们什么时候起来的？今天？我是昨天起来的。大家比我高明，经常接触实际，对军事没有抓。这几年，有同志批评了军队。但他也有责任，我有点单打一，这方式曾提倡过，但有时也有缺点。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也怪我去抓别的了，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头一页上讲不唱天来不唱地，开头先唱香山记。事情总是这样的。我这几天，不唱天，不唱地，开始先唱别的戏。这事也难免，唱《打渔杀家》不能同时唱《西厢记》，如红线女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据说有二百个，其他的时间不搞工作。虽有理由，但也不大好，有个空政委说，他这次参加会议很荣幸，沾一点边，是否中央间接有点责任，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这是提出了问题。这次检查首先检查军委和各部。不要针对各军区，他们可以同去检查。你们越压迫我，我越舒服，中国人不受帝国主义压迫不起来革命。人不逼不革命。帝国主义压迫劳动人民，实际做了自己掘墓人。当然你们的压迫不是帝国主义的，是督促的意思，否则我们不会动了。事情关系到六亿人民，关系到世界持久和平问题。

[1] 这是毛泽东6月2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军委几年来工作基本对的，但有很大缺点，责任首先在领导。

国内形势起了很多变化，几亿人民起来奋斗，这次会议批发了富春、先念、薄一波、冶金部、一机部几个文件，希望大家很好地阅读（主要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值得仔细看看。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是：一曰粮，二曰钢，三曰机械。第一是粮，最重要，如若不相信，让厨房停伙三天行不行？现在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每人千斤”（六千五百亿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达到四千七百亿斤到四千八百亿斤。“苦战五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五百斤。”到那时，我们的腰杆硬起来了。二曰钢，今年计划：五年之内争取六千万吨，要接近苏联（七千万吨），明年可能超过英国。从工业方面想办法，干部一年下去四次，抓四次。军队也如此，你们要我管少了，是要我多抓，驴驹子喜欢人骑，中央这些驴驹子也要有人骑。如果没有钢，不能造机械，炼钢本身也要机械（平炉、轧钢等）的发展，电力、石油、炼油、采矿都需要机械，还有交通运输机械（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农业也要机械（拖拉机、排灌机械等）。

当前是粮、钢、机械三个重要问题。

军委会开得很长，但还要准备很长地开，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最少一个半月。反正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六十条中有一条抓军事，同样每年要搞几次军事，过去中央抓得不够，现在愿意抓了。现在各方面进步很快，首先是地方，特别是农业方面。这是说中央各部门是有缺点的，多了一点东西，少了一点东西，多了一点官气，少了一点政治。南宁、成都会议，八届二次会议后，政治扩大会议后，有很大进步，不能说他们“一多二少”了。官气少了，政治多了。军队有的同志讲，工、农、兵、学、商，兵在老

三，现在落后了，如果有些落后，是领导上有缺点，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开得很少。这几年主要抓农业，搞出一套办法。解决了以后搞工商也都弄出来了一套，还有一兵和学都往那里开会。（康生：前几天主席讲：工农兵学商，农搞出一套思想解放了，工业也基本上搞出一套，商也如此，只是兵与学未搞出一套来，意即兵学落后、思想落后。）开始动了。（康生：前几天主席的话有道理，教育的确还未搞出一套中国形式的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民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相结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大众的——走群众路线的。教育与广大群众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留同志们三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何迷信？思想没解放？这次会议务实太多，务虚不够，讨论中的时间不够，也可以看出这问题。大跃进中，群众思想跃进，教育工作跃进，我们领导思想仍落后。（□□：主席把军事与教育会议并列，军事会议比我们务实多，时间多，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实的问题。）我们这会有点事务主义，（□□：他们的会还要开一个半月至两个月。）这两方面都在开会。军队的落后，不是全部落后，中间脱节，可能上层热情少点，但也不是上层都如此，军事干部对我说：“各方面是大跃进，军事进步不够，心不安。”这是好的，经过这次会议后，会起变化的，军事会议要开得好，要讲清道理，达到一个目的。中国有这么多人，六亿五千万，地方比苏联小一半，但是比较好是温带，海岸线长，达一万二千公里，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国家有山有平原，山是西边，平原在东边，这有好处，使水位落差比较多，可建水坝利用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苏联早一些，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已有四十七年；俄国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时

间很短，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有三十八年，我们落后，但革命是自己搞成的，自己找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是一种辩证主义的原理，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作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什么？在莫斯科会议前，我们有五条，后变成九条，这种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结合不行，因中国有其历史的特点，照搬不行。有过照搬，党的历史上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受到很大损失，但也有很多好处，给了我们教育，得了很多经验，同样的，凡是我们的敌人也给我们很多教育，也有好处。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等，再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有些是党内性质的，王明现仍在党内，但他走到何处？将来再看，这人一开会就有病就是了。政治上犯错误，军事上也一定会犯错误。写过游击战争小册子，古田会议决议案是总结那时经验，划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军事的界限，那时这种界限不清楚，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军队中有两种路线，有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军事学，一套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很有兴趣，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外行指当时军代表政委不能领导军队，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当然不存在。有些同志认为要领导军队非学过军事不可，你们大家是否进过学校，没有的。这不是说过去在军队呆过的同志没用，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革命要迟好几年，俘虏兵也有作用（过去内战中俘虏兵也是内行）。

如果是缺点，大家都有，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有那么一股空气，对资产阶级军事学特别有兴趣。林彪虽进过旧学校，但他反对那一套，另搞了新花样。实际上资产阶级军事管理制度无非是打骂制度。这一时期，喜欢旧的资产阶级军事学，管理制度那一套是一种

什么思想？可叫作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后来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时代，有个外国人（李德）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争思想，说是上山主义，他们要正规化，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此时旧的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归降洋教条主义、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实际也不是归降，而是两种教条主义合作，结果把我们的工作送掉了，来了个大游击，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穿过地球的中心。其他根据地也犯过错误，中央苏区还来了一个大扭秧歌，一直到陕北。

我们党有三次“左”倾路线，两次右倾路线，结果军队搞少了，受损失。但也有好处，取得经验，经过遵义会议、延安会议、延安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把绝大多数同志说服过来，纠正过来。因此，不能说军事没犯过错误，正因为犯过错误，蒋介石请我们走，我们就走了。长征中还有一些，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反中央。以后转入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犯过二次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若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今天没办法在此怀仁堂开会和看梅兰芳的戏。

抗战后，解放战争中全党全军没有基本分歧。一九三八年六中扩大全会上讲述游击战争的好处，可建党建军建政，由九十万游击队变成四个野战军，主要说抗战，解放战争不是按洋教条，也不是按资产阶级教条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一套，当然也参照外国经验，不是按着两种教条主义取得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胜利后，我们又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小战争。苏联同志讲过，在朝鲜战场上，敌空军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未遇到过，当时我空军不能到第一线（敌后）。第二线（三八线）只能在后方顶一下，在当时情况下，打败美帝国

主义很不容易。有人说我没参加世界大战，不对，我们参加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的战争。美国陆军怎么样？不清楚，总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在战略上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但是在战役和战术上要看成是铁老虎。

胜利后办了许多学校，产生了教条主义，请那么多苏联专家来，教条主义自然有了。到底有教条主义没有？对此有四种看法：（1）没有；（2）有，不多；（3）有，不少；（4）有，很多。哪种对，请大家讨论。

党的历史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一种是无产阶级接受外国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对这两种都作过斗争，克服过。

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是否有？我看有点，分量问题可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没有。只写过几篇文章，那时有一肚子气，没有气也写不出来。王明由苏联回来，王明速胜论（写文章说四年抗战胜利）。当时有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党内主要批评速胜论，对国民党则主要批评亡国论。那是应时文章。现在的一套我不懂了，小米加步枪，我是看过的，辛亥革命时也背过。后来南、北议和，成了外行。

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次会议要作点决定，大的一个，小的可几十个，成都会议就是这样（三十多个）。实事求是讲道理，大家说，大家要讲心里话，我们也提倡直道心事（坦白、交心），直道工作。有人怕讲了穿小鞋，穿有什么要紧？共产党怕穿小鞋？中国过去女人都穿小鞋。三

寸金莲不妨碍她们生四万万五千万人，共产党人怕什么？穿上几十双有何要紧？我在成都会议讲过五条，杀头当然不会，我们提倡交心，我向你们交心，得罪人有的，总之要插旗子，不插红的就插白的或灰的，不要讲出话来过多斟酌，讲话可以，今天讲话也是乱吹，写出稿子就困难了。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全军团结，要团结起来，必须把问题搞清楚，否则不会真正团结，军人要爽快，交心才能达到团结。

为何要团结？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共有二十一年的和平。假如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按这个二十一年计算，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八年。现在蒋介石就那么一点大，可是他很神气，天天骂我们，搞几架飞机经常进来，到处撒传单，闹一下。你去捉，他又跑，也被我们搞了一些。我们现在还不忙。就台湾来说，如果我们有了一亿五千万吨钢，美国可能让步，它就得走。那时候吹一口气，嘘，它就得走，而现在我们就是打雷它也不听，它说这不过是蚊子叫。

我们要搞海军。肖劲光同志，你不是要搞点海军嘛，那时就有希望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军委像这样的会一年要开一次，全军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大家把道理讲通，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确，不是糊里糊涂。肖劲光同志我给你打保票，现在不行，搞海军没有钢铁，所以你还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

望。我们总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干十五年，有很大的希望。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有钢什么东西都可以搞，轮船可以搞，军舰也可以搞，铁路也可以搞，空军也可以搞，陆军装备也大为不同。要为此而奋斗。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图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主席台上。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肖劲光、许光达和刘亚楼在一起交谈。



1958年6月，毛泽东和将军们在一起交谈。



1958年，毛泽东和许世友等亲切交谈。



1958年，毛泽东和许世友在一起。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 《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1]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58年6月17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报，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 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 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一些简单的表，很容易看。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1] 指冶金工业部1958年6月7日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包括：全国主要冶金产品的1962年生产水平（钢、铝、铜、金），全国主要冶金产品分区的1962年生产水平，第二个五年需要的投资额、第二个五年需要的设备数量和第二个五年需要的建筑材料等。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在原标题“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下注有：“冶金工业部向政治局提出，1958年，6月。”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 《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1] 指农业部1958年6月11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1962年时耕地面积和各种作物的种植比例，粮、棉、油产量指标，增产措施和畜牧业的发展指标。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农业部向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农业方面所要到达的目的）”。

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

此件^[1]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六月廿二日

[1] 指冶金部党组1958年6月21日关于产钢计划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

刘邓^[1]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2]印发。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对《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 学习和讨论的情况》的批语^[1]

(1958年6月23日)

陈伯达^[2]同志：

请约定一、康生、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3]几位同志，将此期第一篇所列问题，主要是八、九、十节的问题，当场看一遍，当场逐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四、五小时也就可以了。然后和我谈一次为盼！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六月廿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1958年6月20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10期的封面上。该期《内部参考》刊载《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一文，文章分10个方面综合了各地学习和讨论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报告时提出的问题，其中第一至七节提出的问题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区别和联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精神的问题；关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总路线基本点的问题；关于破除迷信问题；关于“马鞍形”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第八节是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文章说：八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两次会议提法不一致，究竟哪一个对？有人认为八大一次会议的提法错了，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但也有人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策略上不能也不应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有人问，既然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说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如果承认这种理解是对的话，为什么还说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既然今后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什么又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什么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一致？今后阶级斗争的规律如何？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敌情观念？第九节是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文章说，有人对东风压倒西风表示怀疑；有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发生，对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缺乏信心。第十节是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关于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关于领导干部如何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对不断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要搞群众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不少干部对解放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有厌倦情绪；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毛主席提出“不断革命”，这与陈独秀提出的“两次革命”论有什么区别等。

-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 [3]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1]

(1958年6月23日)

一、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对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二、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的要点。

三、现在形势很好，特别是国内形势很好。现在我们要抓三样东西，粮食、钢、机械。□□□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华东五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今年可以增产粮食□□亿斤，如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做一个单位，两广、云、贵、川做一个单位，也各增产□□亿斤，这样即使不算东北、华北、西北，今年就可以增产□□亿斤。钢一九六二年可以达到□□万吨到□□万吨。赶上美国不要□年，□年□年就可以了。□年可以赶上苏联，□年，最多□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到那时候，肖劲光同志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主要的，新的还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四、肯定讲我们要学习苏联，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过去学了，现在要学，将来也还要学。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所以对苏联的经验要有选择地学。苏联顾问、专家，大多数是忠心耿耿的，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应当肯定。我们对他们应当做兄弟一样看待，不要把他们当做客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个别的，也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们就是有一个缺点：政治水平不高。有问题时要好好同他们研究，商量问题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团结诚恳对待他们，也要有批评，有斗争。这一方面第二机械工业部做得很好，向专家宣传我们的总路线，专家也说要向我们学习，批评我们有些人有依赖思想。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

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整。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搞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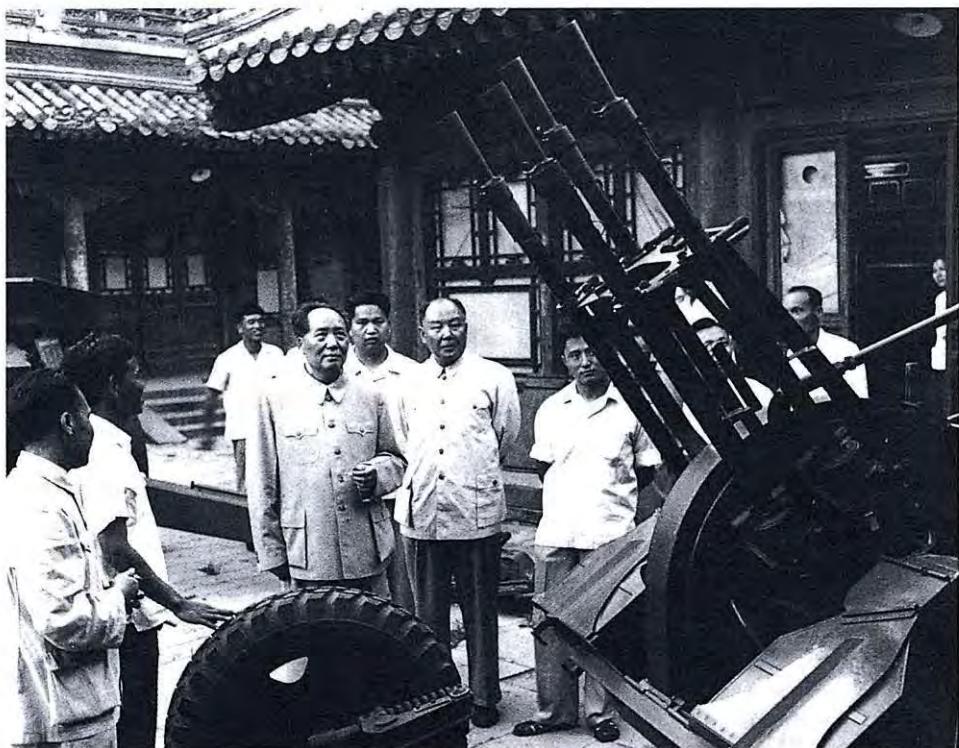
六、军委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一定要改进，办法就是一年下去摸四次，像地方一样有系统地去摸。住北京的人，官气多一些，政治少一些（现在有改进），因此要注意这个问题。军委领导要改进。下面有批评，我看这些批评是好的，要求高一些，都是为了改进军委领导。今后军委这样的会要每年开一次。今后中央开代表会议应多吸收军队同志参加，如地方上应相当地委书记以上参加者，军委师以上党委书记可以参加。你们不是说文件看不到吗？这次给你们多看一些。你们参加省委没有？（刘培基答：我们有八个人参加福建省委。）福建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知道的。

七、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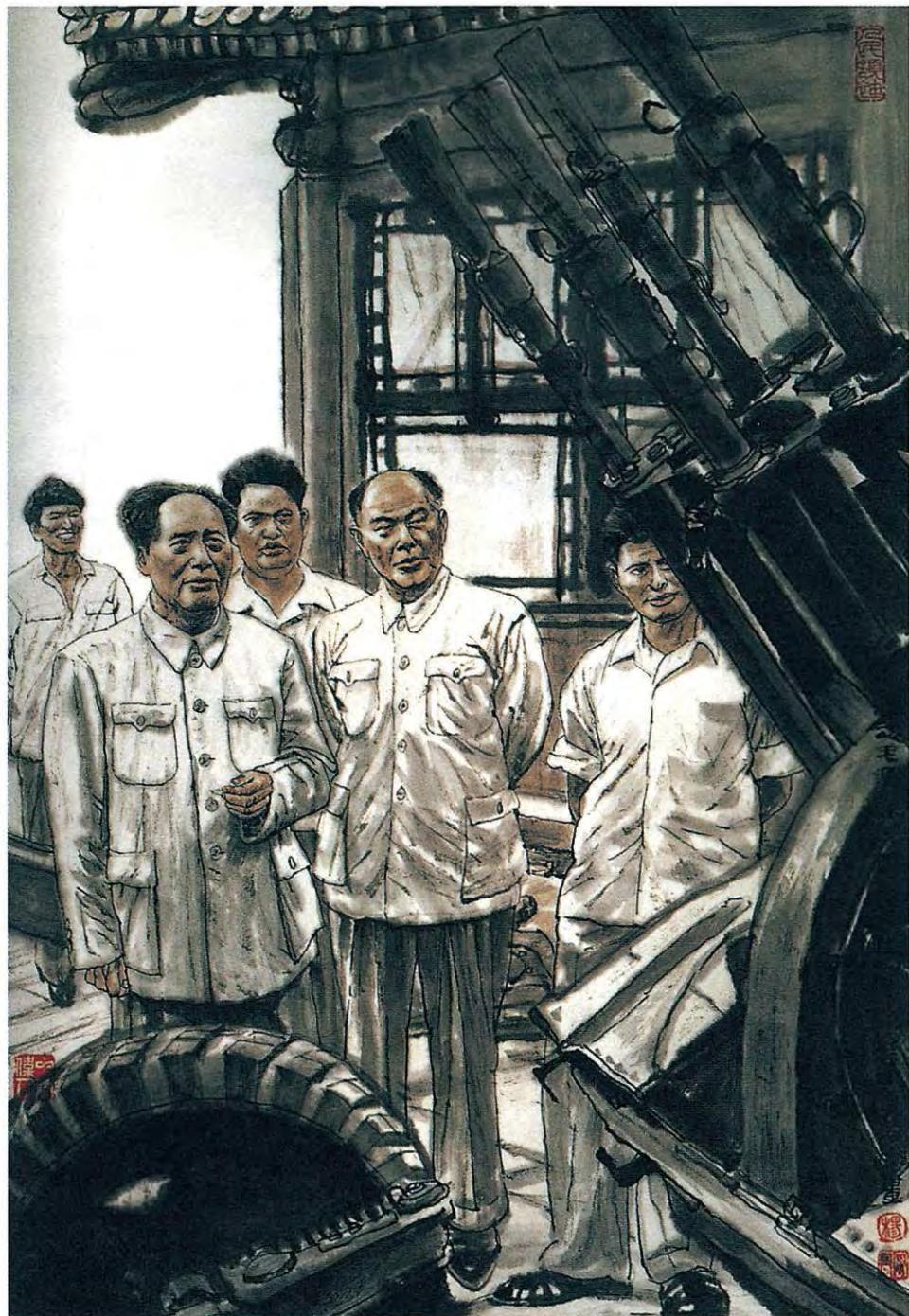
八、王明至今还向苏联告状，告我三个东西：一是反对共产国际，二是搞个人崇拜，三是强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都作检讨。□□□说：共产国际有错误为什么不能反？□□□就是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他说得很对，□□同志的这个报告也要印给大家看看。

九、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是□□亿，由于没有经验，加上

教条主义地照搬，浪费了一半，本来可以搞□□亿的事业，可以做更多的事而没有做到。好处是取得了经验教训。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我国自己研制的武器。



《观看新型武器》(中国画)

转发青海省委关于 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8年6月24日)

[1] 指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6月18日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给中央、军委并兰州军区、各州、县委、柴达木工委、西宁市委的报告。报告说，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的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从平息叛乱、捕捉反革命分子等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联，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其实质是帝国主义与拉萨反动派阴谋分裂活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反映，是一场尖锐剧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群众，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真正使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翻身，彻底铲除叛乱的根源。同时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予以严厉打击。198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复了青海省委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应当肯定，当时平息局部地区的武装叛乱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犯了扩大的错误，使一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责任主要在领导。处理这个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群众之间、干部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引导各族人民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在经济上，也要给予适当的扶恤、救济和补助，但目前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

—

此件请克诚^[1]同志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同时请小平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先发川滇黔藏。使大家知道这件事。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毛泽东

—

刘、邓、彭、黄^[2]阅，请邓、黄办。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

在中国驻苏使馆关于苏联积极筹备 庆祝我国国庆的报告^[1]上的批语

(1958年6月24日)

刘、邓^[2]:

看来不举行庆祝是不行的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然后常委谈一下，考虑方针，答复苏共。

毛泽东

六月廿四日

[1]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8年6月20日给外交部、中联部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6月20日，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接见了陈楚并告称，苏共中央很重视我国国庆十周年纪念，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节日，苏联将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苏共中央希望了解我国的意图，庆祝活动的计划、措施、规模和总的精神等，以便更密切地配合进行活动。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邓子恢^[1] 夏收增产统计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5日)

—

此件^[2]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五日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指邓子恢1958年6月24日关于夏收增产统计给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从河南、湖南等17个省区已报来的增产统计数，共339亿斤；二、甘肃、新疆、北京3个省区市增产估计数共15亿斤；三、据20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951亿斤，去年是596亿斤，今年比去年增产355亿斤；四、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5200亿斤，增产可达2100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毛泽东在这一项旁批道：“八大第一次会议决定1962年为5000亿斤。”）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邓子恢夏收增产统计报告的批语

二

克诚^[1]办。办后，将此稿送小平^[2]，印发在京各中委、各部长。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机械工业问题的 几个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6日)

机械工业问题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此件分为几个部分，全文虽长，每一部分甚短，很吸引人，可以一阅。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请克诚^[2]办。

[1] 指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机械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几个报告，主要是：关于重型机械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自由锻造水压机的生产分布和分配的报告、关于冶金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电站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石油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氮肥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

[2]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关于应对国民党军火力袭击的批语^[1]

(1958年6月26日)

退彭照办^[2]。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8年6月26日呈送的电话记录上写的批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1958年6月26日上午电话报告：福州军区判断，国民党军最近可能对我组织一次大的火力袭击。据此，福州军区提出两项应对措施。一是消极方面的，采取撤离等防范措施，高炮加强对空作战。二为积极方面的，即组织还击。总参谋长粟裕指示：除火炮防敌袭击外，另调一些高射炮部队，集中火力打击敌飞机。如有机会再打地面目标，并同意作战部关于积极进行还击准备，待敌暴露目标后狠狠给敌以打击的建议。彭德怀6月26日12时批示：“即送主席阅后审批。我同意第二项措施，采取积极还击并加强对空火力。”

对《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的批语和批注^[1]

(1958年6月27日)

—

即送刘、邓、彭真、定一、康生、伯达、乔木、胡绳、田家英^[2]各同志阅，退江青。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1] 《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载于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6月2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七十三期。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并在这个材料的空白处写了7条批注，我们把毛泽东的批注和这个材料对照排印，其中的横线、双横线、波线、三角、叉等符号，是毛泽东批写的。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二

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

下面是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的交心材料：

我认为：

(一) 世界上万事万物在客观上都有两面性，都有矛盾性。有两极就有中间。譬如：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薄中厚。中间就是矛盾的平衡，两面性的统一。 ×××

(二) 万事万物依存于极端的总是少数，多数都是处在中间状态，因此普遍、共同、真实、真理正表现在多数这方面，△也就是中间方面，△而两极总是少数的、是特殊的、片面的、表面的、不是代表性的。 △

(三) 两极中间也有中间，我所走的中间路线就是中间中的中间，这是最客观的，最稳妥的，最全面的，最辩证的。

根据以上的观点，我把中间路线分成三部：

第一，立身处世，接物待人的中间路线：

我肯定自己是个平凡的人，把自己放在众人中间，不突出就不孤立；

我认为喜乐爱恶，大家相同，平等待人，平心

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

相对主义，折中主义

论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善与人同。我对人家好，人家也对我好，与人方便就是方便自己，与人无争无竞，最能息事宁人，四平八稳，无往不利。极端个人主义

第二，工作作风上的中间路线：

不争上游，不甘下游，安于中游。不求有功，但愿无过，有功就可能突出，自己的功劳中很难避免不剥削人家的劳动。△有功，△也难免有个人主义，△难免不包括名利思想。△有过也不好，自己要检讨。

第三，政治方面：

一、学习不积极不落后，在小组会上不发言也不沉默。人家发言热烈，我也热烈发言，人家钻研学习，我才钻研学习，跟着一块儿学习。

二、各次运动中，不带头不落后，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不偏前，不偏后。运动在前进，我也在前进。

三、对厚古薄今与厚西薄中问题，该厚的某点即厚，该薄的某点即薄。古有好的，今也有好的。中有好的，西也有好的。古有坏的，今也有坏的。中有坏的，西也有坏的。好的为好的，坏的为坏的，不能主观片面，不能以特殊代表普遍。

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展开时，我也不批评人家，也不自我批评。批评展开了，大家彼此批评了，我也批评，大家自我批

评，我也自我批评。反动极了

总之，跟随大家就是走中间路线，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大家既然进入社会主义，我在大家中间，当然我也进入社会主义。

中间路线的好处是：

- 一、不为人羨而忌；
- 二、不为人畏而恨；
- 三、不为人敬而远；
- 四、不为人重而疑。

因此就可以安于现实，进一步可以争取荣誉，退一步远离耻辱，善始善终。

这种人是右派的后备军，这种人多了，右派的天下就巩固了。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 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6月29日)

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的发言很好。张宗逊同志的发言很好，我赞成。这是经训总四级干部会议逼他写出来的，可见一逼就写出好东西了。只有一点我不同意，那就是张宗逊说他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很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不对，应该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次亚楼同志的发言也可以。这说明军队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写出东西来。最好组织一些军师级同志发言，写写东西，因为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接触下面，写的东西能够理论与实际结合。会议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也要介绍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文章中讲话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的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

我军队开始就存在着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古田会议斗了一下，但没有说服有错误意见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路线。肖克同志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是个军阀主义，有资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思想。

战争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做教条来背，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

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八大”决议中有一节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得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依靠苏联援助，请问当时苏联又依靠谁来援助。

工农业大跃进，打破了迷信。我们在□年可以赶上英国，□年至□年赶上美国。明年我们钢产量，将达到□□至□□万吨。据说东北一九六二年即可产□□万吨，这是整风的结果。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形成工业大跃进。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也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有些人提出，苏联顾问看我们不抄他们的，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

□□为什么革命胜利后没有搞好呢？除了对前一段未深刻检讨，接受历史教训不够外，一是迷信旧的东西、旧教条，二是迷信洋教条，迷信苏联，三是迷信自己。这个人工作很积极，很努力负责，就是方向不对头，政治上不够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出名字嘛！

主要是迷信洋人，有自卑感，没有打破迷信，不以自己为主。现在一个合作社也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不然就会落后。湖北省

新洲五个合作社搞得较好，麻城差点，可是新洲没有注意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而麻城派人到新洲学习，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推广，结果麻城工作跑到前面去了。军队过去打仗；还不是把下边打的经验总结起来，再去训练部队，又再去打仗吗？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

苏俄打败过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已经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有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的情况的。要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对苏军的经验是要学的，因为我们的装备是苏式的，但装备技术天天在发展变化，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过去俄国人很怕拿破仑，因为他领兵曾打到莫斯科，最后俄国人又把他打败了，所以俄国人经常宣传他们比拿破仑还厉害。目前，苏军顾问搞的东西（作战计划、想□）都是进攻的，都是胜仗，没有防御，没有打败仗的。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争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定要总结。至于他们说我们是经验主义，那么，我们就说，你们搬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也是经验主义。

肖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来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关于学习苏联，对内讲批判地学，为了不引起误会，对外还是讲有分析地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学习

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这一点要同苏联同志讲清楚。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习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苏联专家现在也有了转变，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朱可夫事件后有转变。（陈口插话：据归国苏联同志他们也讲：来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的经验来的，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你们的经验回去的。）这就说明了大跃进的形势，不但鼓舞了我们中国人民，同时也鼓舞了苏联同志。这样好。

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凯丰^[1]同志曾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我问他看了没有，他答不上。可见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妥当的。

破除迷信是成都会议提出的，四个月来发展很快，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在全国全面开展，如鞍山，原计划产钢□□万吨，但现在变了，到明年就可能达到□□至□□万吨钢。他们也搞大中小型结合，土办法洋办法结合。据□□□同志从东北来信说：东北第二个五年计划可搞到□□万吨钢。有了钢，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粮、钢、机械少，现在搞出了东西给大家看看。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刘道生^[2]发言稿中提出十年搞五十万吨位，这太少，最少搞一百万吨位。一九六二年我们可搞□□至□□

[1] 凯丰，即何克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 刘道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万吨钢，要这么多钢干吗？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还手，要打它。把它打垮，就要考虑追击，要修水上铁路（造军舰）。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至□□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

原来认为军队有很大的捞头，现在只有□多万了，考虑还减不减？去年减□□万，留□□万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准备下次座谈会上，专门讲部队整编和干部等问题。

在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宣言》 上的批语^[1]

(1958年6月)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局1958年6月3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上。《党史资料汇报》的编者按说：这个文件是从去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们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的，不是原件，是根据英文译稿又译成的中文稿。英文稿译者于1921年12月10日写有一个说明，全文是：“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1]

(1958年6月)

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民政工作就是作人民工作，不要怕麻烦。

[1] 这是毛泽东接见河南登封应举社社长崔希彦等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七律二首·送瘟神^[1]

(1958年7月1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2]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3]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4]
千村薜荔人遗矢，^[5]

[1] 送瘟神，把迷信传说中的司瘟疫之神送走。意谓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同科学知识相结合，将有可能彻底消灭危害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很多省份广大人民的血吸虫病。

[2] 余江县，在江西省东北部。

[3] 浮想联翩，种种想象接连而来。

[4] 华佗无奈小虫何，华佗，汉末著名的医生。小虫，指血吸虫。本句意谓不发动群众消灭它，就是名医也无能为力。

[5] 千村薜荔人遗矢，薜荔，野生常绿藤本植物。千村薜荔，形容很多村落荒凉。矢，同屎。“人遗矢”，借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记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的故事。廉颇被废，虽老仍健，赵王想再起用他，但派去的使臣却捏造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顷之，三遗矢矣）。这里指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病人下泻不止，濒于死亡。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1]
牛郎^[2]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3]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4]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1]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人们住在地球上，因地球自转，于不知不觉中，一日已行了八万里路。地球赤道全长4万公里，合八万里。地球在太空中转动，所以住在地球上的人们也在“巡天”。一千河，泛指宇宙中很多的星河。

[2] 牛郎，神话人物。神话传说牵牛星是由人间的牛郎变成的。

[3] 一样悲欢逐逝波，逝波，一去不回的流水，借喻已过去的时间。这里是说人间的血吸虫病，在解放以前，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发动群众加以扑灭以前，还是同牛郎在时一样，悲者自悲，欢者自欢，多少年头就这样流水似地过去了。

[4] 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国的六亿人（当时人口约数）都是尧舜一样的圣人。尧和舜是古代历史传说中唐、虞两代的“圣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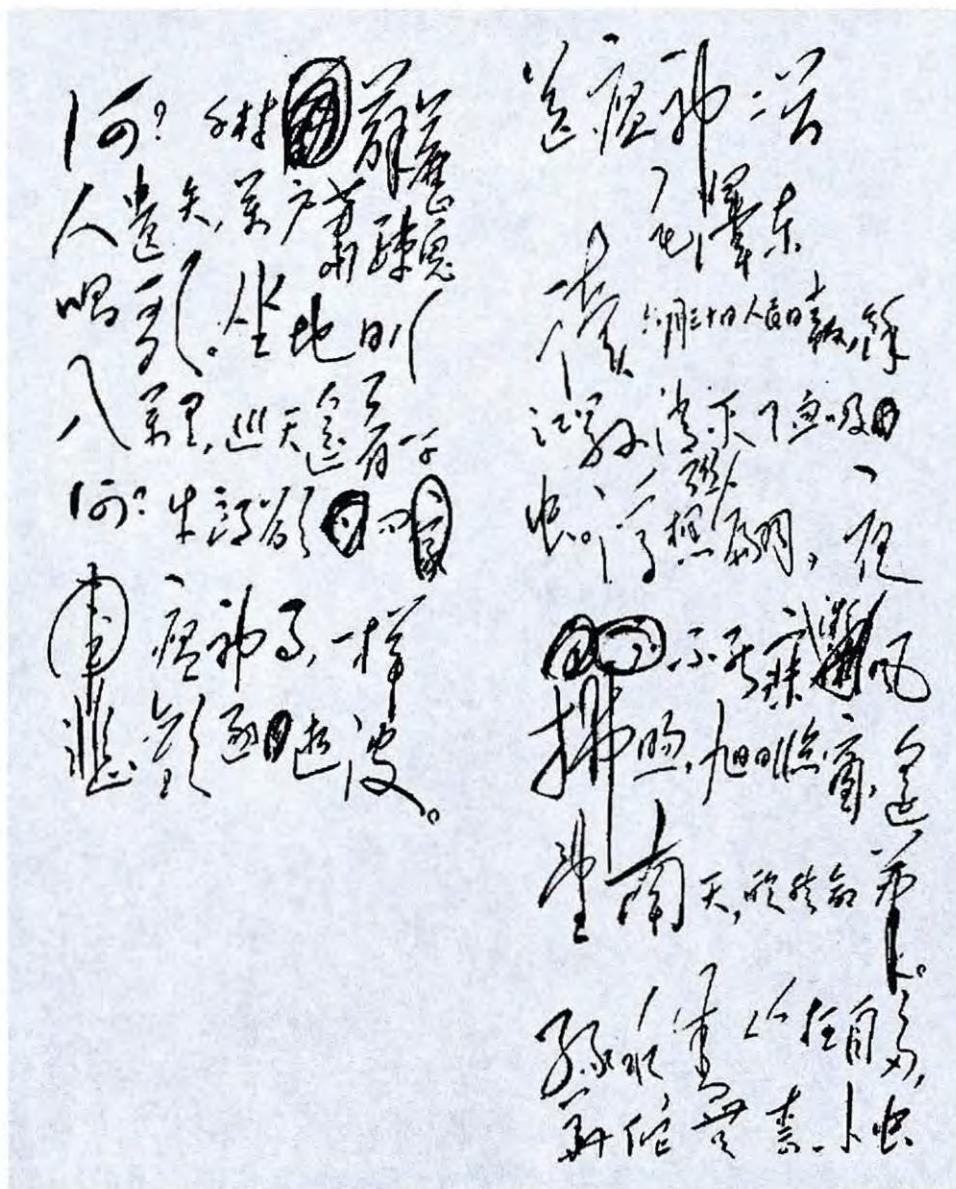
地动三河^[1]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2]照天烧。

[1] 三河，汉代把河东、河内、河南三郡称为三河之地（见《史记·货殖列传》），原指今晋西南和豫西黄河两侧的一部分地方，这里泛指北方。上句五岭，泛指南方。

[2] 纸船明烛，旧时祭送鬼神有烧纸船、点蜡烛等习俗。这里借来形容瘟神（瘟君）在六亿人民的奋进中无处存身，只有逃离人间。



毛泽东手书《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地
游人只似神仙。
坐知遥夜雨
行看天边云。
山雨欲来风满楼。
愁云惨淡万里愁。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毛泽东手书《七律二首·送瘟神》。

《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

(1958年7月1日)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给胡乔木的信

(1958年7月1日)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1]，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七月一日

[1] 指《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泽东

腹不言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吸血吸蟲而作。請你同人民財政委員會商討一下，
需用否？如力修改，請告訴我。
如何以用，請在明天或後天人民財政
委員會，不使送氣。吸血吸蟲是一
場惡戰。詩中生地、山天、江
雨、小三河之類，而我方雖有不善
可以制勝他。這一念，或致終
制勝。

毛澤東十月一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为索要一批图书杂志开列的清单^[1]

(1958年7月1日)

古诗源
唐诗别裁
明诗别裁
诗韵
楹联丛话，续话
六朝文絜
初唐四杰集
西厢记（剧本）
金瓶梅词话
红楼梦

一至六月：
哲学研究
历史研究
文艺报
诗刊

[1] 毛泽东开列的这个图书杂志清单分写在两页白纸上。原手稿没有时间，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的日记记载，这是毛泽东1958年7月1日写给逄先知，并由他去办的。

介绍一封信^[1]

(1958年7月3日、30日)

—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

[1] 本篇是毛泽东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1958年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的3个批语。标题是毛泽东在第一个批语上拟的。赵紫阳的信后来发表在1958年8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上，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2] 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

二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六〈七〉月三日上午七时

请在七日下午退给陈伯达。

三

陈伯达同志：

此事请你处理，我来不及了。

毛泽东
七月卅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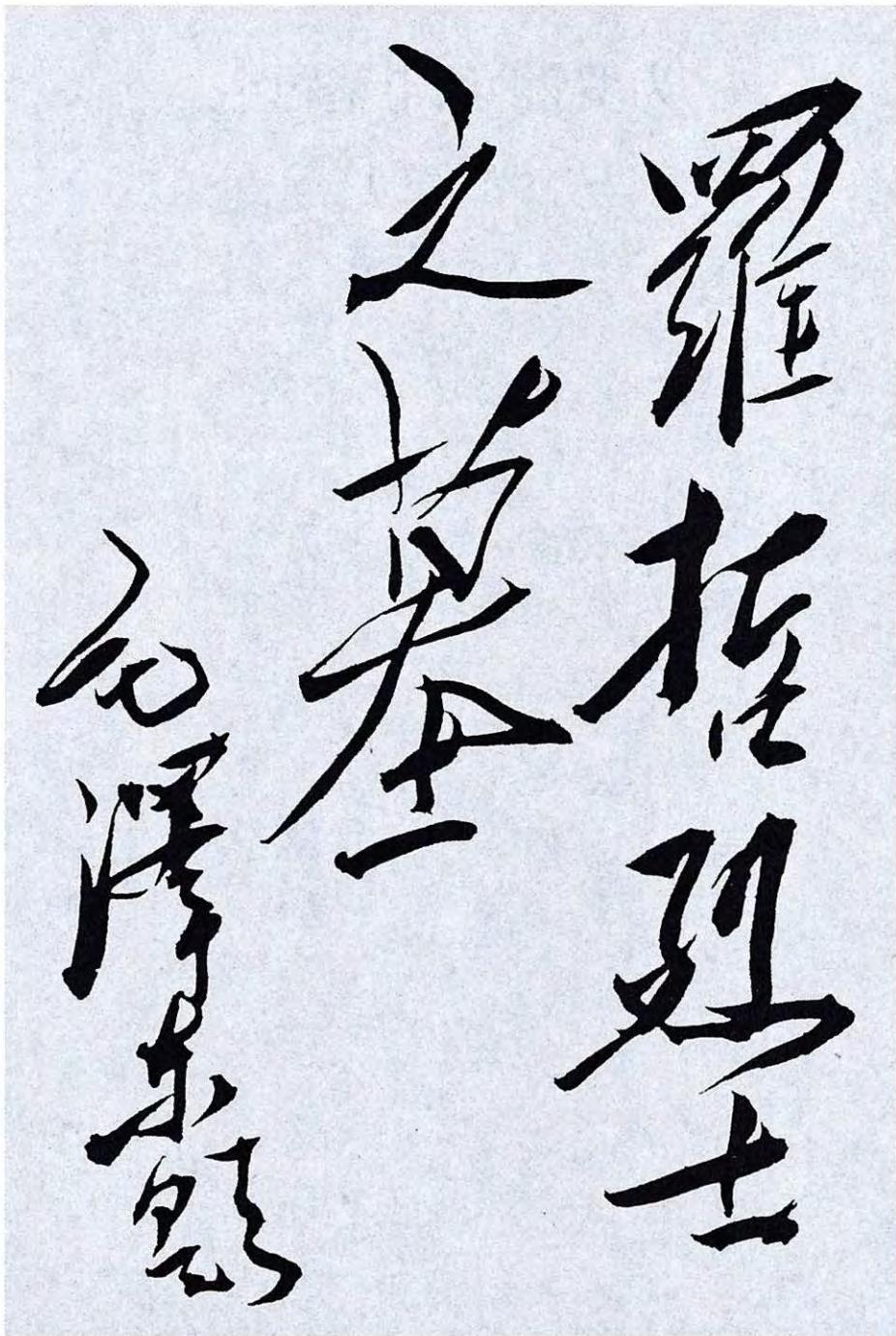
为罗哲^[1]烈士墓题字

(1958年7月)

罗哲烈士之墓

毛泽东题

[1] 罗哲，湖南株洲人，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毛泽东为罗哲烈士墓的题字。

为曹云芳^[1]题词

(1958年7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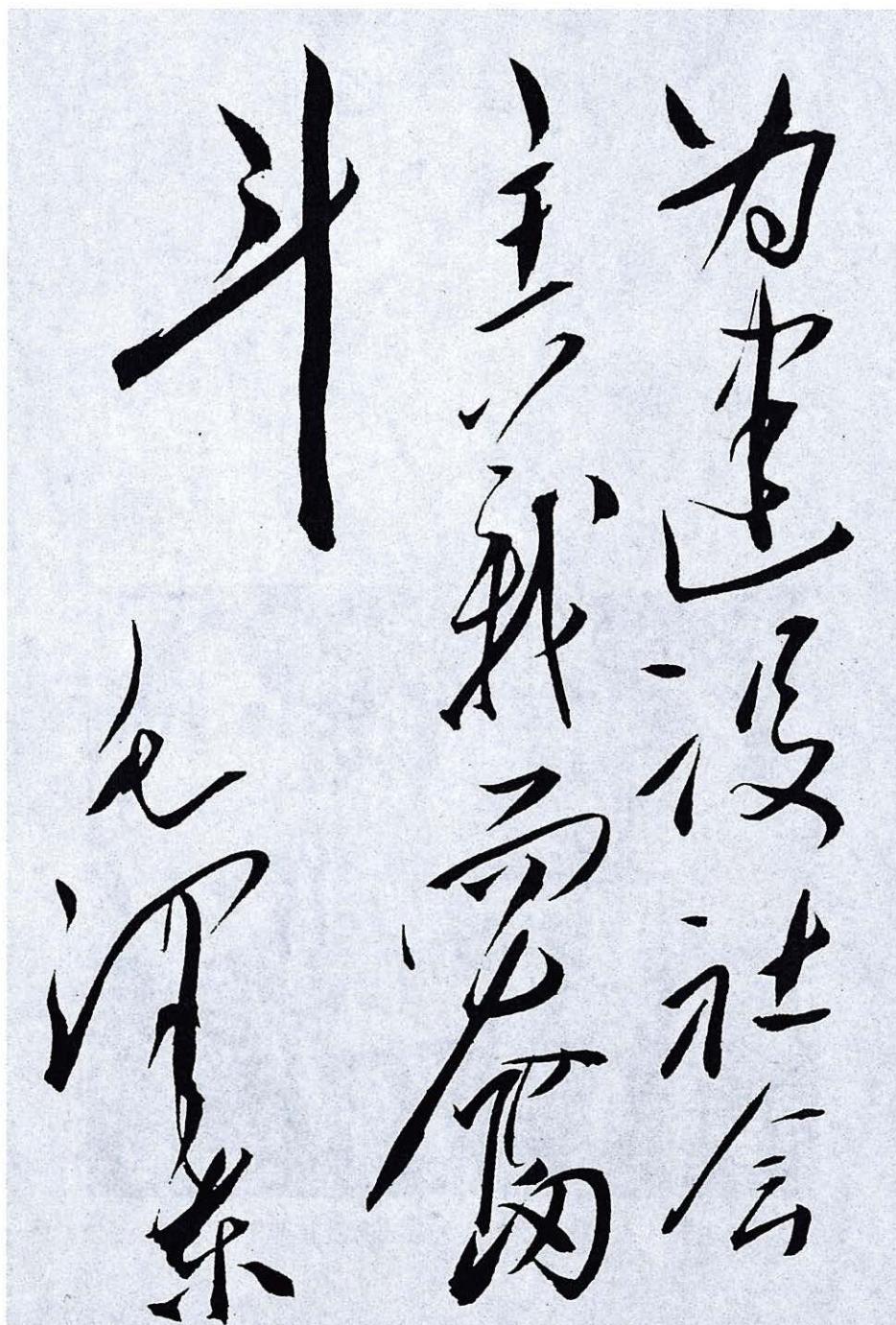
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



1958年，毛泽东和罗哲夫人曹云芳及其两个外孙女合影。

[1] 曹云芳，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她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毛泽东为曹云芳的题词。

对谭震林关于华东五省市 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总结的批语

(1958年7月7日)

陈伯达同志：

此件^[1]似可登红旗，你看如何？谭震林去郑州，大约一星期左右回京。他回来后，可和他商量一下。题目另换一个。文字略作修改（不要多改）即可。

毛泽东

七月七日

[1] 指谭震林1958年6月25日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总结在谈到农业发展的形势时指出：“从华东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上海市）的情况看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并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的粮食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任务，就是积极争取今年的秋季丰收和明年的更大丰收，以便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总结还就争取农业全面丰收，保证夏种计划的完成，加强田间管理，认真推广改良农具和新式畜力农具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谭震林的这个总结后来发表在1958年8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上，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接受锡兰^[1]新任驻华大使高伯拉瓦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8年7月7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锡兰作为亚非会议发起国家之一，在国际事务中正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锡兰政府和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事业、特别是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有益的贡献，受到了亚非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欢迎。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继续同锡兰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幸福而共同努力。”

“如阁下所说，中国人民和锡兰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进行了友好往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去年2月，中锡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认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就为我们历史上的友谊联系建立了新的巩固的基础。我深信，在这样的基础上，中锡人民的传统友谊将得到越来越广阔的发展。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锡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愿为阁下在加强中锡两国友好联系的工作中给以充分支持和协助。谨祝贵国繁荣，人民兴旺。”

[1] 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关于注意暴雨冲毁水库问题的批语^[1]

(1958年7月8日)

—

彭真^[2]同志阅。

河南暴雨冲毁水库一条，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七月八日

[1] 这两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8年7月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1期上。其中：一写在《内部参考》第2521期的封面上；二写在该期《内部参考》刊载的新华社郑州2日讯《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的旁边。新华社报道说：6月27日至30日，河南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暴雨中心在沙河上游的宝丰、郏县、叶县及白河流域的镇平一带。由于暴雨集中，势猛水大，造成了严重灾情。平顶山市冲垮水库16座、水塘35个、堰埂81处。郏县李口乡沙山水库土坝被冲毁，大水冲进张店村。宝丰县代集乡42个小水库被冲毁35个。叶县冲毁中型水库2座，小水库3座。偃师冲毁水库五座。镇平冲毁渠道7条，进水闸1座，拦河坝15座，小水库6座。灾情发生后，当地党政领导立即率领干部抢救，现洪水已基本退下，各地正转入善后工作。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

冲毁不少中小水库。

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 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

(1958年7月8日)

文章发表的面比较宽了，目前可以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了。

群众的检举很有作用。这要大大提倡。反革命最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报社有几百封信。有材料，应写成新闻，读者知道自己的信有了下落。对反革命分子也要进行神经战。使他们知道我们发动了群众。并且进一步号召群众检举，写成社论。

不要把自由主义当作政治上闹独立王国、反党等等。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 胜利三十七周年的电报^[1]

(1958年7月10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的時候，我們謹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此中国人民感到无限的欢欣。不久以前，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蒙古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制定了新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我们深信，勤劳勇敢的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定会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中蒙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不断发展。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日益繁荣富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

(1958年7月12日)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九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一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一百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1] 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你们解放后也不会去占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刚才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跟我说，摩洛哥向法国、英国买机器买不到，法国、英国不肯把工作母机卖给他们，摩洛哥要向中国买机器，他们很欢迎我们的机器。法国、英国、比利时离摩洛哥很近，但是不卖机器给他们。我们卖机器给他们。

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

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中国解放后自己发展工业，自己制造机器。你们那些国家怎么样？有没有民族资本？自己能不能制造机器？

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当然中国的情况你们也可以看看，比如上海、北京就可以看看。但是，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1]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1] 参见列宁《论策略书》。原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对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 常年办食堂的经验^[1]的批语

(1958年7月14日)

[1] 新华社1958年7月12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8期刊载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其中说，在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提起办食堂这件事，无论社干部和社员都会喜笑颜开地把它赞扬一番。这个社的农民喜欢食堂，是由于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第二个好处是节约了粮食；第三个好处是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第四个好处是有利发展生猪生产。但这个食堂开始并没有办好，他们经历了三次兴办两次垮台的过程，主要是原因是食堂的管理工作未做好，加之吃饭的分配方法有问题。社里领导针对社员群众存在的怕办得不合理、怕管理人员贪污以及富裕农民怕露富的思想顾虑，进行了以下几件工作：首先，深入一点，作出榜样，用实事解除社员的误解。其次，成立组织，加强管理。全社以管财经的主任为主，吸收有关人员参加，组成了食堂管理委员会，各队也成立了食堂管理小组。主要任务是检查账目、随时听取群众对食堂工作的反映，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改进食堂工作。再次是坚持自愿入食堂的原则。对于不愿入食堂的农户的粮食、烧柴，仍然按分配原则如数分给。由于坚持了自愿原则，加之食堂越办越好，使原来不愿入食堂的农户也自动要求参加了。1958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以《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

陈伯达^[1]同志阅。退毛。

第十一页湖北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一事，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

[1]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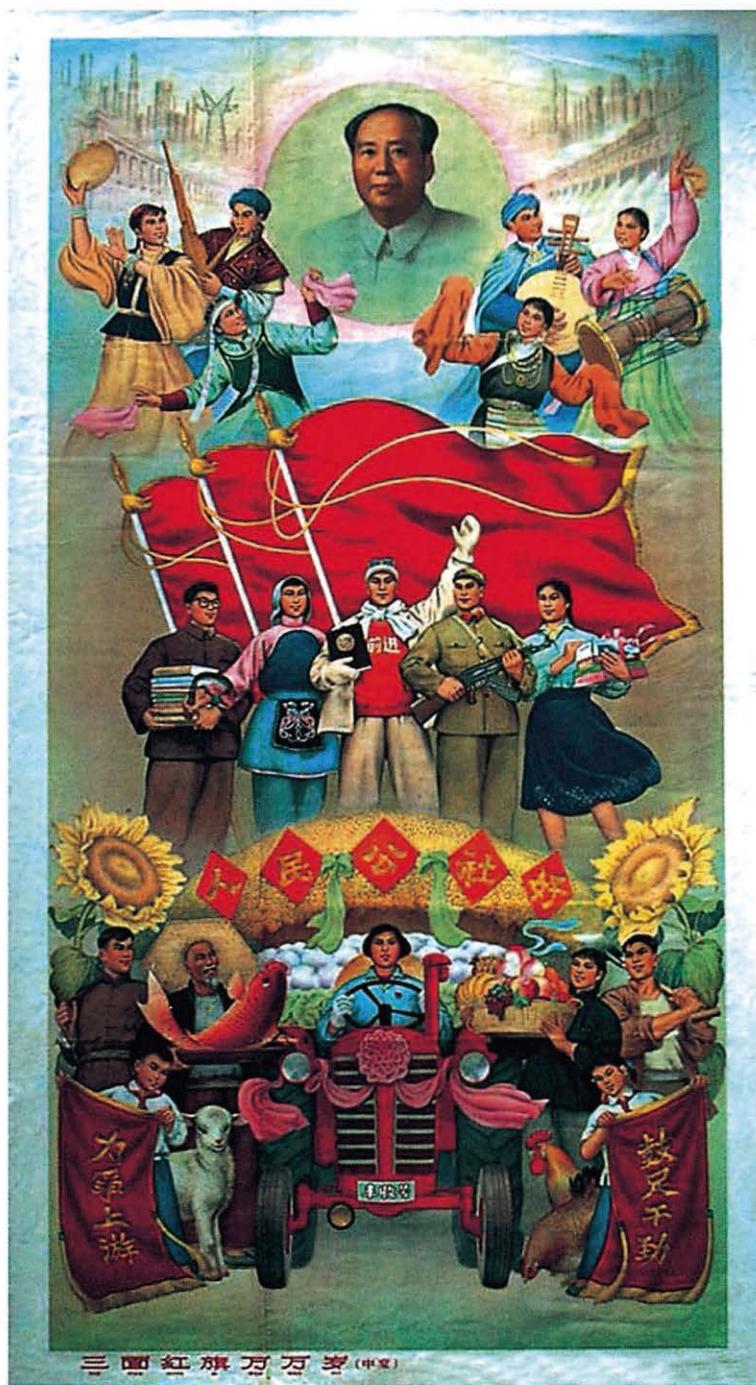
(1958年)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 这是《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四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引述的毛泽东的话。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上半月，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地视察，又就人民公社和其他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对此，新华社作了报道。主要有：（一）据新华社8月10日电，毛泽东于八月初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当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11亿斤粮食时，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徐水县委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二）据新华社8月11

日电，毛泽东于8月6日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在参观这个公社的棉田时，毛泽东问社干部：“你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1.5万亩，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毛泽东笑着向吴芝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三）据新华社8月12日电，毛泽东于8月9日在山东视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汇报了山东省各项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毛泽东还要求领导干部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四）据新华社8月15日电，毛泽东在天津市视察，在天津市长李耕涛汇报天津工业当前主要情况时，毛泽东指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随同毛泽东视察的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去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毛泽东很称赞，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三面红旗万万岁（宣传画）

对肖向荣关于几件外事安排的 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58年7月17日)

如时局许可，可以去。谈时可将时局许可与否商量一下。

毛泽东
七月十七日

[1] 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8年7月12日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主要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国防部长邀请彭德怀回访作出安排。彭德怀将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定。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请主席批示，主要是彭总访东欧各国问题。”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邓小平批语的后面。

在董必武^[1]关于乌布利希 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上的批语

(1958年7月20日)

定一^[3]同志：

此件^[4]值得一阅，注意第二页^[5]。

毛泽东
七月廿日

钱学森的文章收到了。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正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 乌布利希，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4] 指董必武1958年7月13日关于乌布利希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5] 指董必武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关于乌布利希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三）中的一段话：“大约在半年前，党中央向各基层组织发出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信发出以后效果很好。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党的会议上出色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他们的工作，介绍了应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辩证法的经验。”毛泽东在这段话下面划了波线，并批有“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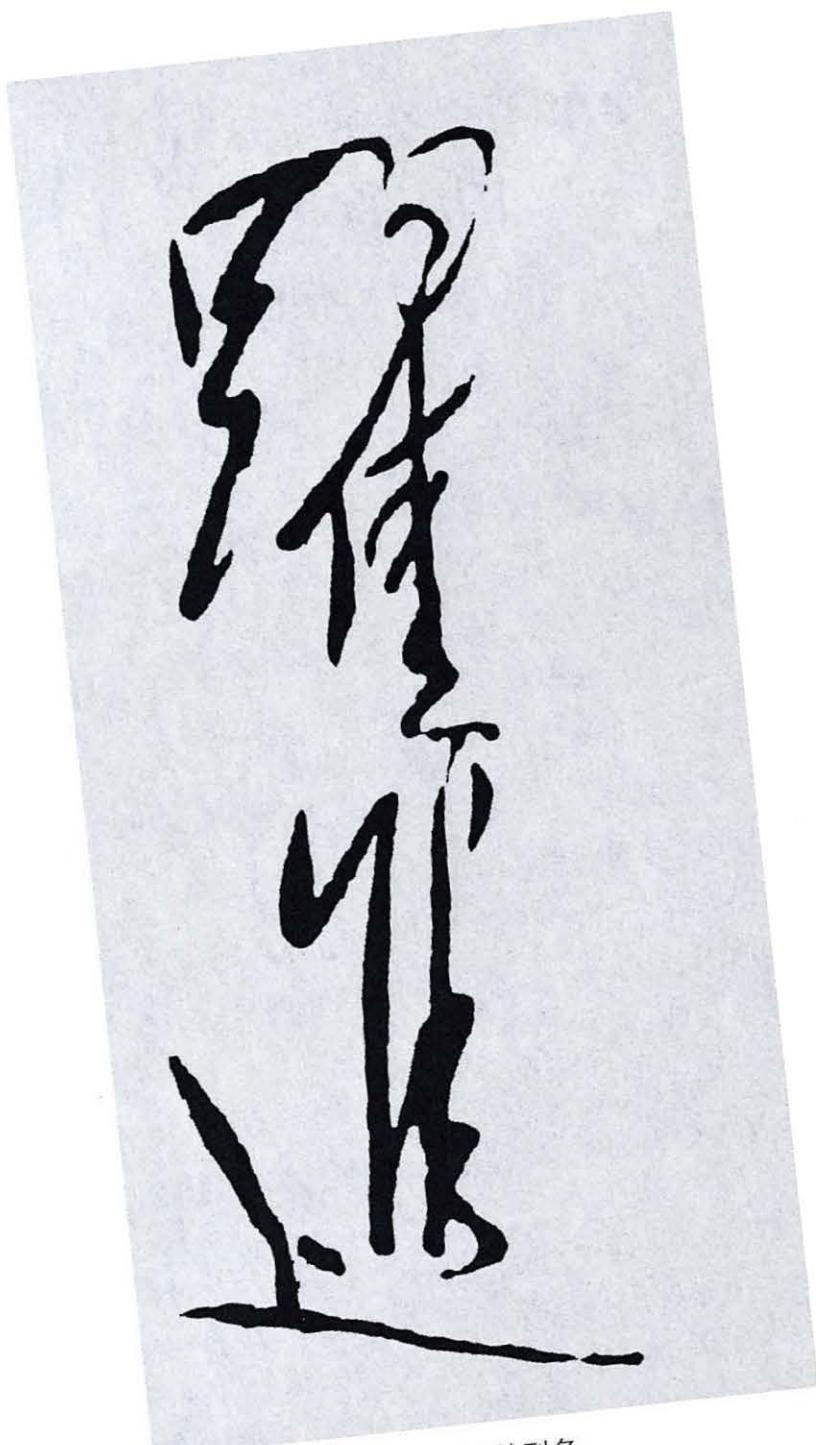
为《跃进》杂志题名^[1]

(1958年7月20日)

跃进

[1] 《跃进》杂志是中共江西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创刊于1958年7月1日。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提出让毛泽东为《跃进》题写刊名。毛泽东为《跃进》题写了刊名，随题字还附有一封信，内容是：“水静同志：遵嘱写了两个字，不知可用否？”

为《跃进》杂志题名



毛泽东为《跃进》题写的刊名。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 国庆的电报^[1]

(1958年7月21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欢欣的心情注视着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年来，中波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在各方面又获得了新的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加速我们两国的社会主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的电报。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四周年。

义建设，而且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关于延期报送各省第二个五年计划 和发展工农业规划的批语^[1]

(1958年7月22日)

小平^[2]同志：

通知各地七月一日限期取消，改为明年春季交来，较为有利。

毛泽东

七月廿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湖北省委1958年7月21日请示推迟报送湖北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规划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曾经规定，各省要在7月1日以前把本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的规划报送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情况变化很大，原订计划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需要修改与补充。因此，此项规划拟于10月份报送中央。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

(1958年7月22日)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

[1] 这是毛泽东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的一部分。1958年7月21日，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2] 1958年6月28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1]，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

[1] 租让制，是苏俄政府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讲到租让制时说：“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页）

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1]。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2]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

[1] 1950年3月和1951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分别签订有关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4个协定，在中国境内开办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这4个合营企业的建立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企业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苏方承诺于1955年1月1日前将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接收，其余3个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厂。

[2] 季诺维也夫（1883—1936），十月革命前夕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在“肃反”中被处决。

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1]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2]。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3]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4]。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

[1] 布尔加宁（1895—1975），1957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库西宁（1881—1964），1957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1902—1982），1957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3] 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4] 《莫斯科宣言》，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9条共同的规律。

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2]。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

[1] 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11月10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5条。

[2] 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1950年至1954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154项。1960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150项。

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2]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3]招待我，费德林^[4]当翻

[1]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2] 莫洛托夫（1890—1986），1949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49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3] 科瓦廖夫，1949年12月曾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是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4] 费德林，1912年生，苏联汉学家，长期在苏联外交部门担任中文翻译，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1]，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

[1] 彼得罗舍夫斯基，曾受苏联政府派遣在中国任军事总顾问。

[2] 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1956年8月至1957年10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1]，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合办的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1]，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1] 指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祝贺突尼斯共和国成立日的电报

(1958年7月25日)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布·布尔吉巴阁下：

值此突尼斯共和国成立日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突尼斯人民表示热诚的庆贺。祝突尼斯人民在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祝贵国繁荣、人民幸福。祝中、突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

(1958年7月27日)

德怀、克诚^[1]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2]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3]、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副部长。

[2] 指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驻金门岛国民党军进行的炮击。炮击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自10月6日以后，福建前线部队采取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停半打的方针，并在10月25日宣布，每逢双日不打炮，逢单日为炮击日。1961年12月中旬，停止对金门的实弹炮击，只在单日向金门打宣传弹。1979年1月1日，福建前线部队奉国防部部长徐向前的命令，自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3] 漳、汕，指福建漳州和广东汕头。

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

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1]，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

[1] 叶飞，当时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8年7月28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令人传颂的友谊。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自从中印两国分别赢得解放和独立，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这种传统的深厚友谊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获得了新的重大的发展。中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不仅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力量。

“中印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印度对于和平事业的努力和贡献一向受到中国人民很高的评价。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对西亚的侵略致使国际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我深信，中印两国必将更加高举五项原则的旗帜，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努力。

“大使先生，我热诚地欢迎你出任印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工作中，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将给予充分的协助和支持。”

给周谷城^[1]的信

(1958年7月28日)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2]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3]，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

顺颂教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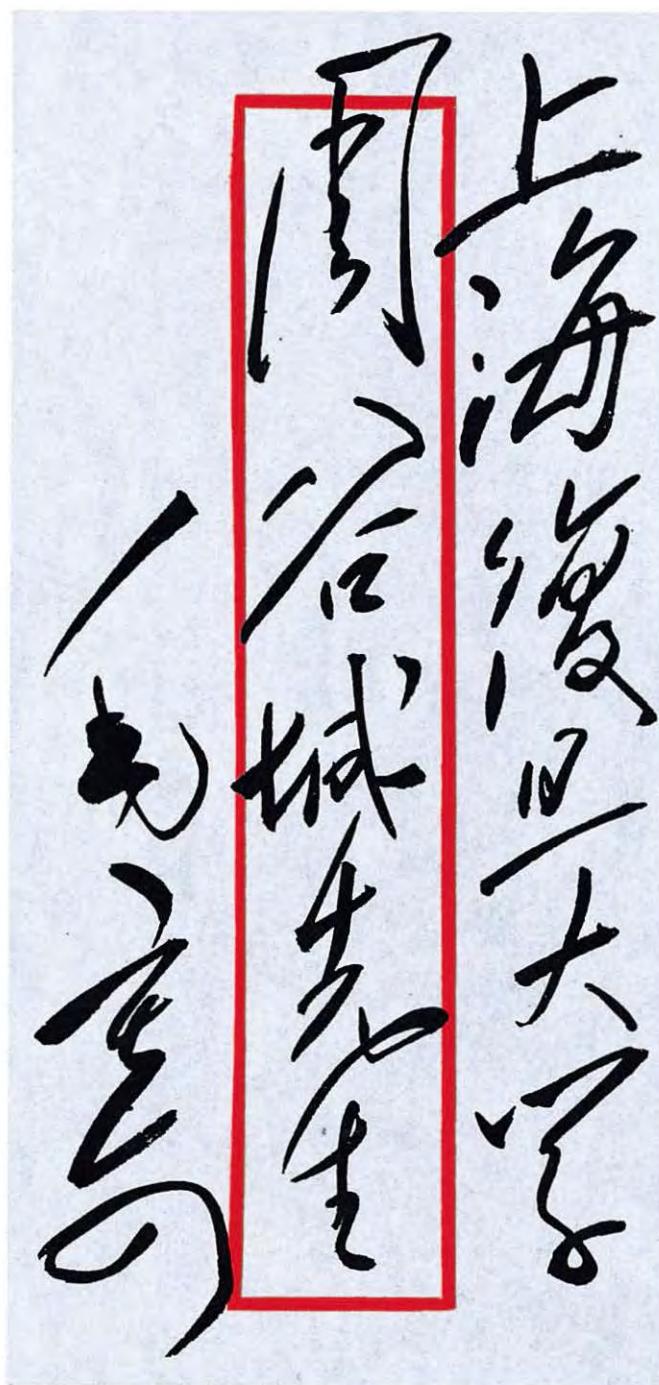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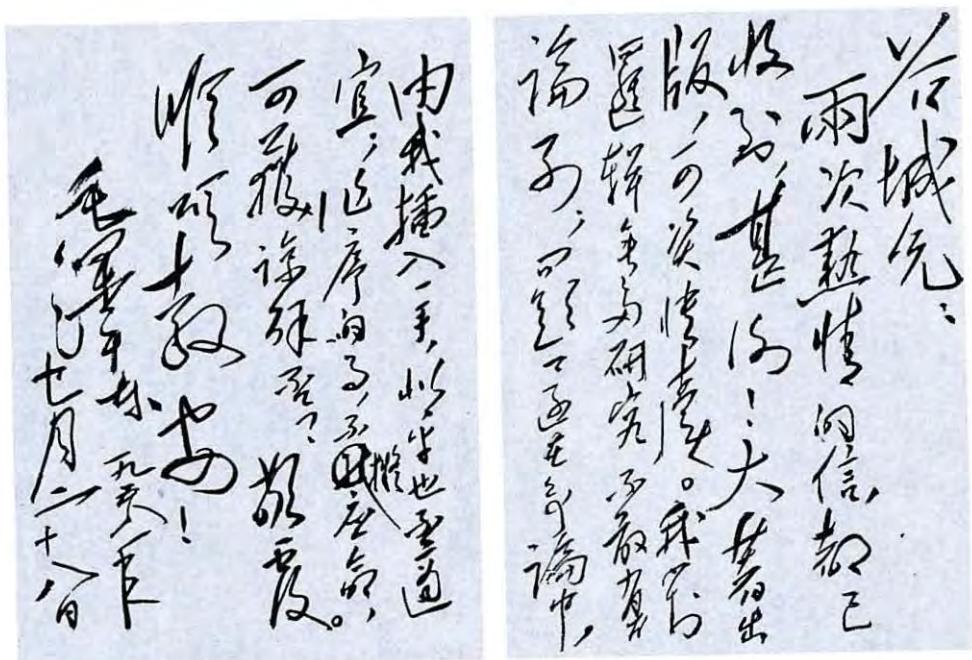
[1] 周谷城，当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 指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

[3] 指当时主要在马特和周谷城之间展开的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



毛泽东致周谷诚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周谷城信的手稿。

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 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的批语

(1958年7月28日)

江青：

此件^[1]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

毛

七月廿八日

[1] 指外交部新闻司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一四一号刊载的《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

关于相机透露毛泽东准备辞去 国家主席职务给宦乡^[1]的电报

(1958年7月31日)

—

发驻英使馆宦乡同志：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1] 宦乡，当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

—
—

刘、周、朱、林、陈、邓^[1]阅发。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黄镇^[1]关于印尼寻求贷款问题的 报告上的批语

(1958年7月31日)

陈毅^[2]同志：

此件^[3]第二页第二段所说向我贷款事，黄镇是否曾有报告？如有，请送一阅。此件阅后退毛。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1] 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指黄镇1958年7月27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其中第二页上说，根据印尼向苏联要求贷款的情况，以及印尼当前继续执行镇压颠覆活动的政策，要取得美国的贷款尚有许多困难，印尼既已向我政府迫切地提出了贷款的要求，我馆意见，我政府可酌量贷予一部分。这将和过去的米、布贷款一样，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要采取追击的战略^[1]

(1958年7月)

依靠我国有利的地形，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就可能把进攻的敌人主力歼灭在海岸和海上，不许敌人主力深入我国国土，并且还要在敌人发动进攻的基地上给以打击。我们将不但胜利地保卫祖国，而且要在歼灭了侵略的敌人主力之后，采取追击的战略，进而将敌人的出发根据地的侵略武装力量加以解除，借以根绝侵略后患，同时也解放敌国被压迫人民。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8年7月1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第三部分《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一段文字所作的修改。文中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

（1958年8月4日）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这妇女解放得很彻底哩！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祝你们丰收！秋收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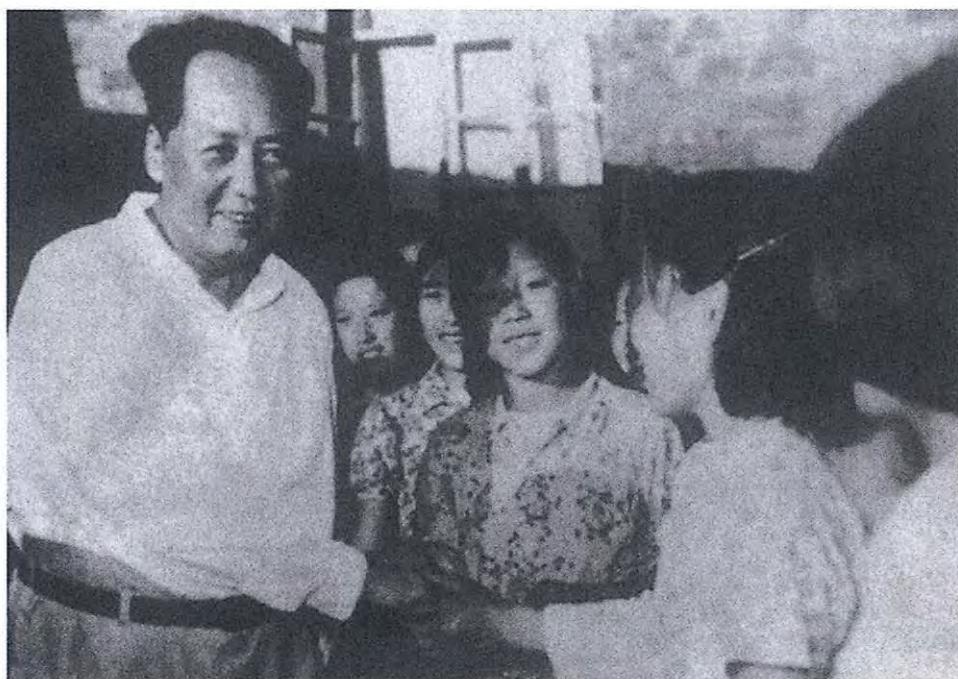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啊？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视查。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和农民亲切握手。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和县委领导及工作人员合影。



1958年8月5日，毛泽东视察安国县时，在玉米地和农民张同顺握手。

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

（1958年8月9日）

计划、指示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领导。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好嘛，我看群众的干劲太少！

好，你这个人（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主任李书成）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的。

你好，你（山东省农科所副所长秦杰）学的学问能用上了。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你们研究一下棉花为什么落桃，棉花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济南历城北园乡视察。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历城北园农业社稻田。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历城北园农业社田头和社负责人亲切交谈。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棉花试验田。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聊城农校。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山东时接见济南军区指战员。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济南西郊专线车站接见山东省部分劳动模范。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济南西郊专线车站接见山东省和济南军区负责人。



1958年8月，毛泽东和参加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一起。



1958年8月，毛泽东接见出席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8年8月，毛泽东接见藤县县委书记王吉德。



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观看黄河流域概况图。

和陈昌奉的谈话

(1958年8月9日)

山东地方很好，根据地很大，新解放了许多县城，很需要干部。到那里要尊重地方，尊重地方干部，尊重新单位的负责人，要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

学习也好，倒不是为当官，而是为人民多做些事。当然，学习中间也有很多困难，只要你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指导员也是革命工作嘛！非当上什么官才行吗？

想当官的人到共产党这里来就是走错门啦！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官不官啊！都是一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到我们这里发财当然不用说了，想升官也达不到目的。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济南和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交谈。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